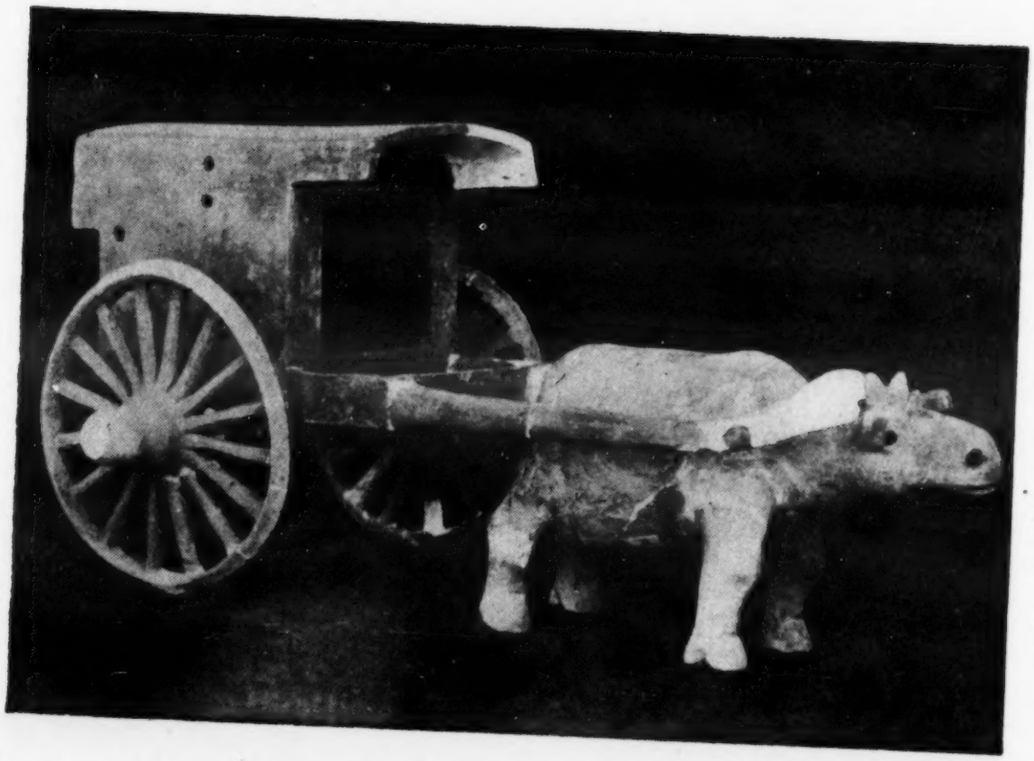
文物参攷資料

一九五六年 第三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60

陶　馬　長29.5、高28.5厘米　南京幕府山六朝墓出土



陶牛車
全長40.7厘米
通高21.5厘米
陶牛長24.6、
高14.5厘米
車箱長20、闊18、
高14.5厘米
車軸長32.8厘米
車輪直徑16厘米
南京石子岡六朝墓
出土

文物参考資料

一九五六年 第三期

文物参考資料編輯委員会編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出版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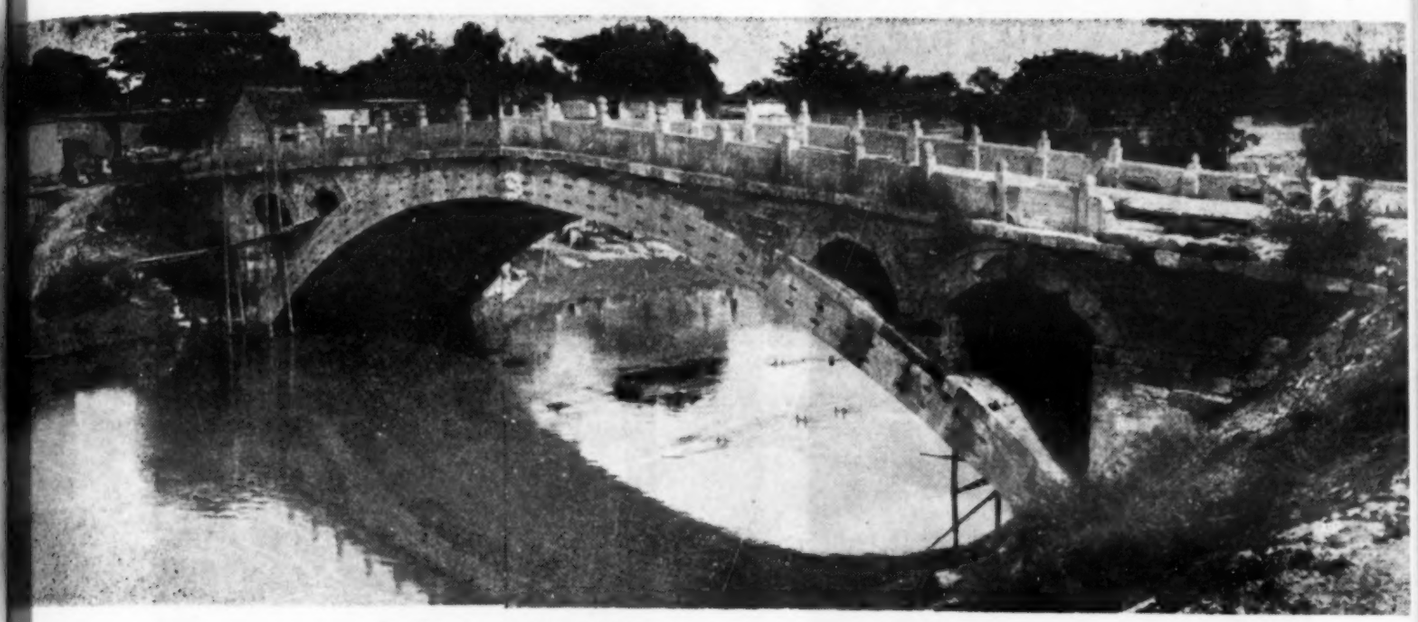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第三期（总第六七号）

交流經驗，提高考古工作的水平 ……郭沫若（1）
考古事業的成就和今后努力方向……鄭振鐸（4）
考古工作和人骨獸骨等遺存問題……楊鍾健（7）
讓考古科学在祖國社会主义建設高潮中壯大 ……李文信（11）
第一次全國考古工作会議决議……（13）
考古工作会議全体大会給全國青年突击隊員們的公开信 ……（14）
考古工作会議記要 ……（15）
趙州大石桥欄板的發現及修复的初步意見 ……余哲德（17）
鄭州碧沙崗發掘簡报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一隊（27）
太原市南坪头宋墓清理簡报……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会（41）
洛陽澗西16工区82号墓清理記略……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16工区發掘小組（45）
長沙近郊發現的宋代遺存堆積……張鑫如（47）
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会（58）
四川崇寧縣鉄砧山的古窖址 ……支沅洪（49）
丹陽六朝陵墓的石刻 ……朱　偰（51）
徐州云龍山石佛介紹 ……張寄菴（57）
关于济南近郊北魏隋唐造像的初步意見 ……荆三林（59）
論歷城四門塔的年代兼答荆三林先生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62）
介紹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古代音乐史料陈列室 ……王世襄（65）
博物館藏品的保管与修复（十二）……法尔馬考夫斯基（70）
文物工作报導（二十則）……（79）

插頁：趙州桥新發現的欄板及其他石刻

封里及底封里：南京附近六朝墓出土的陶馬、牛車及陶俑

趙州桥新發現的欄板及其他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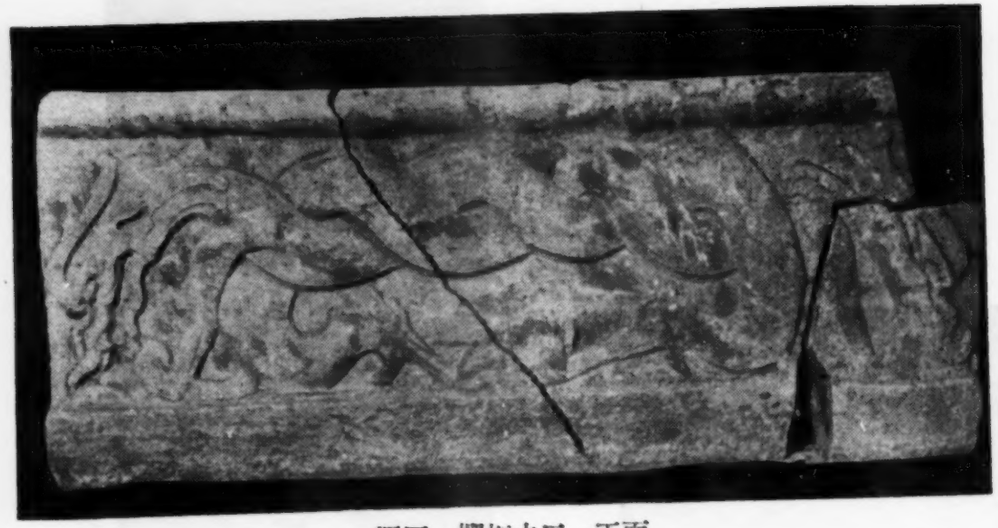


圖一　趙州桥西側全景（修理前存在的欄干情形）

圖二　趙州桥修复　工程中挖出的欄板之一　正面

圖三　欄板之一　背面

THE U . 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圖四　欄板之二　正面

圖六　欄板之三　正面

圖五　欄板之二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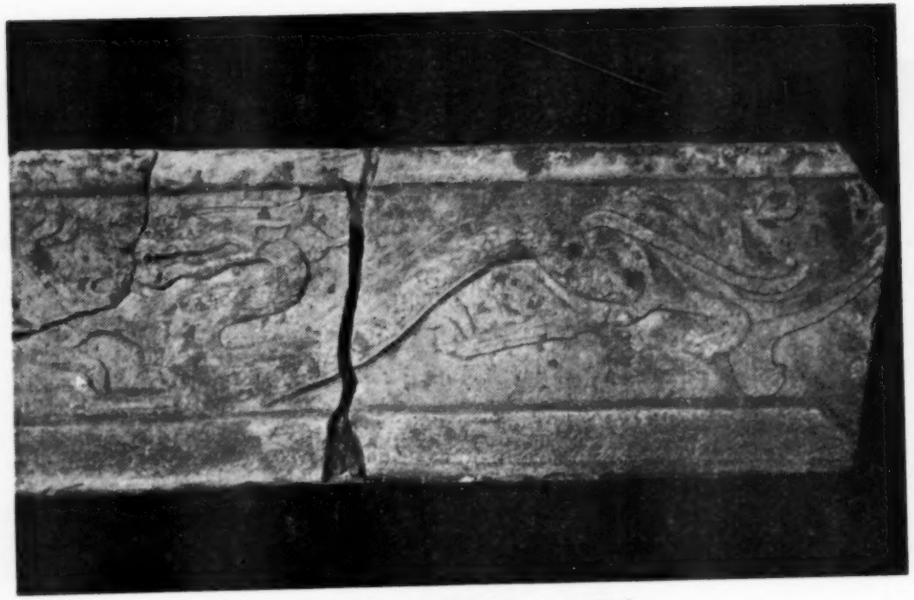
圖七　欄板之三　背面

圖五　欄板之二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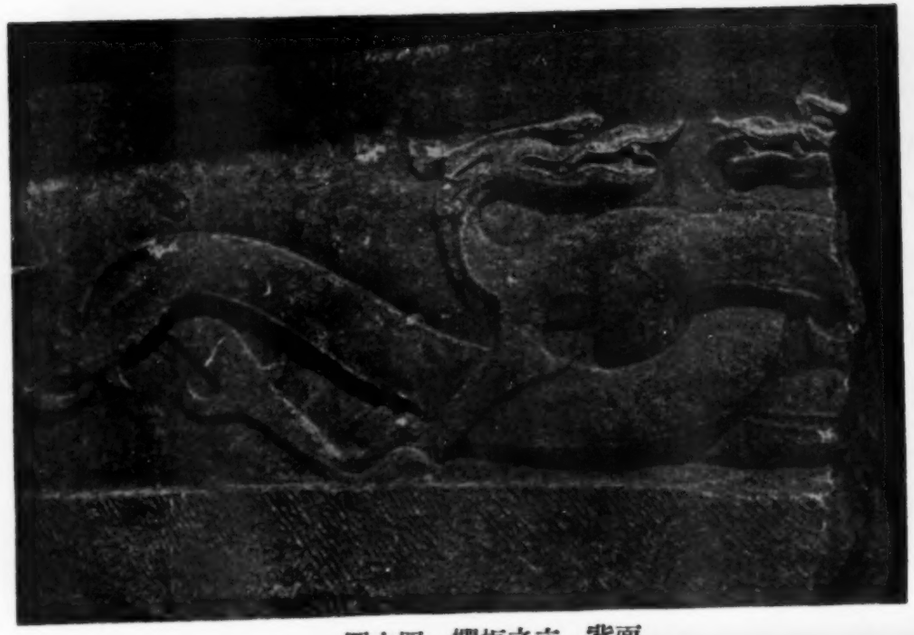
圖八　欄板之四　正面(左上)
圖九　欄板之四　背面(左下)
圖十　欄板之四　細部(右上)

圖十一　欄板之五　正面

圖十二　欄板之五　背面



圖十三　欄板之六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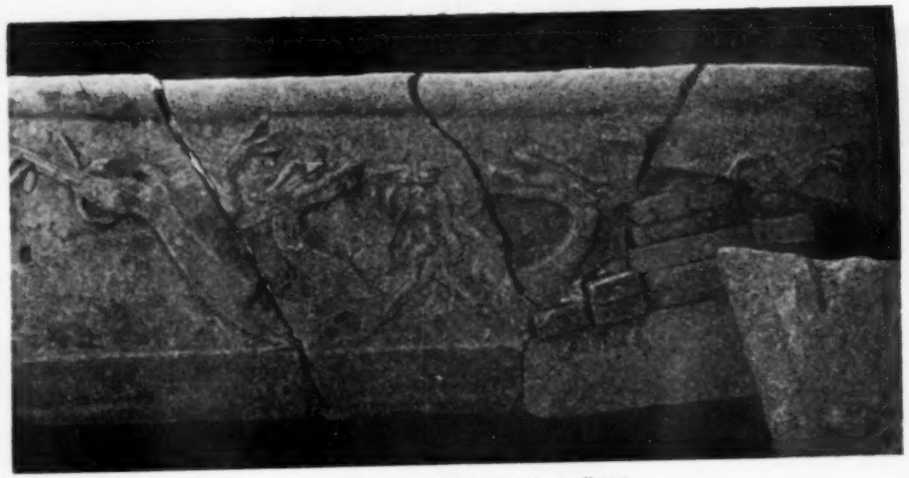


圖十四　欄板之六　背面

圖十二　欄板之五　背面

圖十四　欄板之六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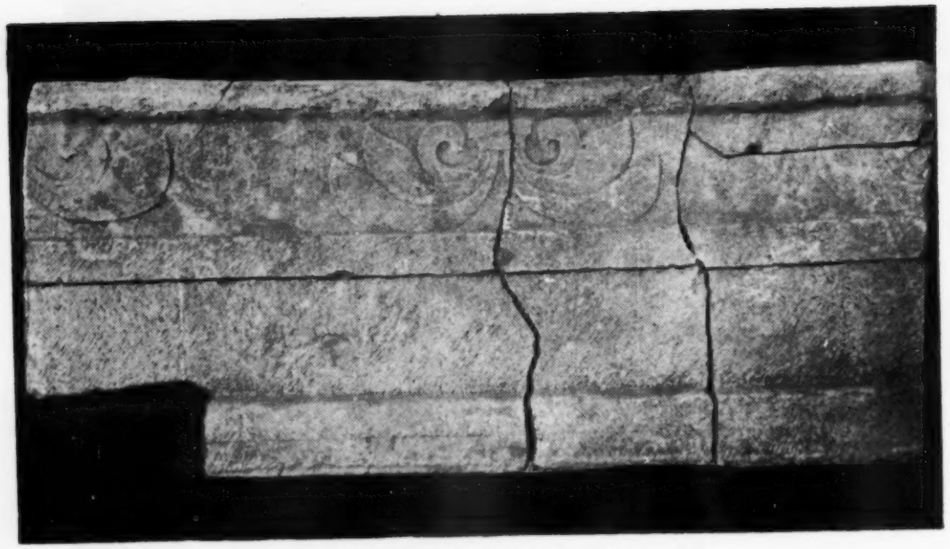
圖十五　欄板之七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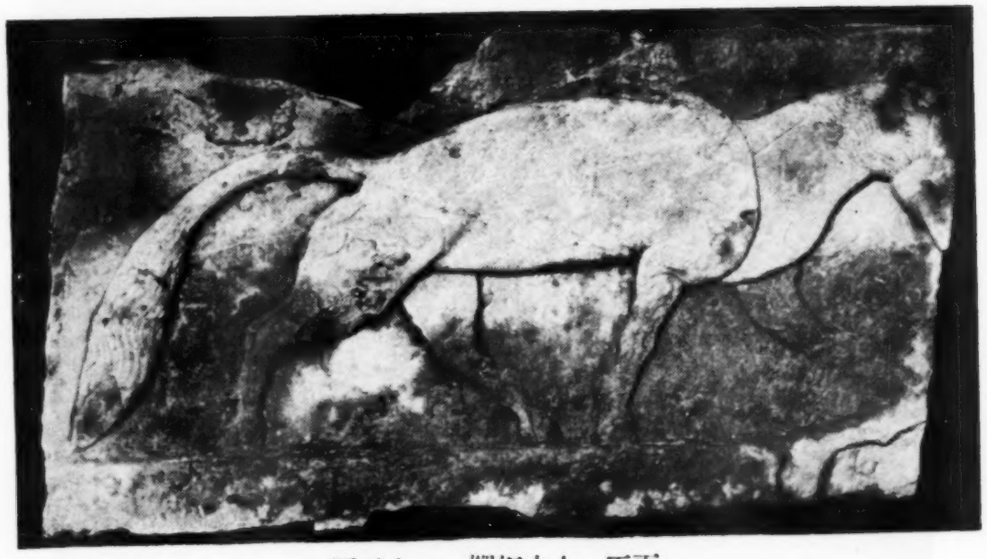
圖十七　欄板之七　背面

圖十六　欄板之七　正面細部

圖十八　欄板之七　背面細部



圖十九　欄板之八　正面



圖二十一　欄板之十　正面

圖二十　欄板之九

圖二十二　欄板之十　背面

圖二十三　欄板之十一　正面

圖二十四　欄板之十一　背面的刻字

圖二十五　欄板之十二　正面

圖二十　欄板之九

圖二十一　欄板之十　背面

圖二十六　望柱之一

圖二十七　望柱之一　正面

圖二十八　望柱之一　背面

圖二十九　望柱之二

圖三十　望柱之三　上端

圖三十一　望柱之三　下端

圖三十二　石獅之一（望柱头）

圖三十三　石獅之二（望柱头）正面

圖三十四　石獅之二（望柱头）側面

圖三十五　八角石柱头　上雕刻的唐貞元九年新修石桥記

圖三十六　仰天石(欄干脚石)側視

圖三十七　仰天石　側視(帶望柱榫眼)

圖三十八　仰天石　俯視

圖三十九　大券基脚三角形券石

交流經驗，提高考古工作的水平

——在考古工作会議上的講話——

郭　沫　若

郭沫若院長在开幕式上講話

考古工作会議开幕。这次会議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議。我們大家都非常振奋，有責任把这次会議开好，完成会議的任务。会議的性質，如名称所表示，是工作会議，但它是有关考古發掘的学術性的工作会議。

現在我想把我們所預定的会議的任务向大会說明一下。

考古工作在中國是有長远歷史的。从北宋呂大臨的"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看來，考古工作作为一种具有系統的独立的学問，至少已經有了將近一千年的歷史了。"考古圖"和"博古圖"所处的范圍虽然主要只限于青銅器，但它們对銅器的花紋、形式、度量、时代、銘文的考釋都作了比較有系統的考察，有时候联系到歷史地理，有时候联系到工藝技術，公平地說，是具备了一个相当嚴密的学術系統的。

那些古人的業績和近代考古学比較起來，不消說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我們要想到那是將近一千年前的工作了。我們要飲水思源，不应該數典忘祖。

北宋以后，关于这門学問的研究在我們却不幸不僅沒有發展，反而衰頹下去了。一直到了近代主要由于西方的考古学的輸入，对于这門学問的研究热情又才逐漸恢复了轉來。

特別是在解放以后六年多的期間，我們是做了不少的考古工作的。在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把丰富的地下博物館替我們开放了，無論是有史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或者是有史以來的殷周、秦漢、隋唐及其以后的时代，都有大量的遺物遺跡發現。据不完全的統計，各地出土的重要遺物已在20万件以上，丰富了并在某种程度上端正了我們的歷史知識。

由于需要的迫切，关于考古工作者的訓練，我們也做了一些工作。在这里应該特別感謝北京大学，它在歷史系里面开設了"考古專門化"，从1953年以來已經訓練出來了40多位畢業生；目前在校学習的也还有40多位。文化部、中國科学院、北大自1952年以來每年合办一次的短期訓練班已經举行了四次，訓練出了341位工作幹部。这些新生力量加上我們老一輩的專家，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已經是有五六百人的一个隊伍了。

我們的同志們是一面学習一面工作，同时也是一面工作一面学習的。我們的工作面很廣，遍于全中國。我們所处理的时代也很長，由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元、明、清。六年多來我們不容妄自菲薄，是積累了不少的經驗的。把这些經驗作一初步的总結，是很有必要的。各地的同志們聚集在一道，交流經驗，彼此观摩，

展开討論，相互学習；这在提高我們的学術水平和改進我們的工作方法上，是有絕对的好处的。这層就是我們召开这次学術性的工作会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我們已經收到了20多种各地的發掘工作报告，將在会上進行討論。希望同志們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尽"的精神，尽量交換意見，切磋琢磨，使既得的工作成就能够在錦上添花，使今后的工作能有更好更多的成就。我們要把既得的丰富經驗，最好能够提高到原則性的理論水平。

六年多來無論在訓練幹部方面或進行發掘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絲毫也不应該引起我們自滿的情緒。

我們所發現的遺迹遺物是有驚人的数量的，然而我們的整理研究工作却做的很少，甚至有好些發掘工作，我們連初步的工作报告都还沒有提供出來。机会太多，遺物、遺迹太多，問題太多，而人手却太少，再加上我們大多数同志的業务水平也还并不能說是太高，要应付解放以來突然增加的大量的工作，是有困难的。但是我們不能在困难面前畏縮，我們要想出种种有效的办法來，以最大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假使不这样，我們要知道困难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是还要大大的增加的，有加無已，而且愈來愈大。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已經呈現出了一个新形势。在今年內全國范圍內的半社会主义農業合作化的运动就要基本上完成；再隔三、四年，也就是說到1959年或者1960年，更可以進入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階段。手工業的合作化，私营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同样的速度在飛躍地進展。國家所進行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即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的提前完成也就促進社会主义工業化的过程，在規模上日益加大，在速度上日益加快。

各位請想想，農業合作化的結果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的机械化；再加上工業化的規模加大与速度加快，这必然的結果是怎样呢？这必然的結果就是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所說的"科学、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適当地擴大和加快"。

中共中央最近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会議，周恩來总理所作的一个具有歷史性的报告各位是看到了的，中共中央向全國的知識分子号召，要在全面規划、加强領導的方針之下，以最緊張的努力爭取在12年內使落后的中國科学文化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这在我們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是必須完成而且能够完成的任务。我們有党的坚强領導全面規划，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國家的無私的帮助，只要我們能以最緊張的努力進行工作，是一定能够实現党对于我們的号召的。

从考古工作方面來說，我們可以得到更具体的了解。六年多來規模宏大的基本建設已經使考古工作得到蓬蓬勃勃的空前未有的發展，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農業和工業的飛速進展、交通水利等工程的愈來愈大的規模，愈來愈快的速度，不是会把無尽藏的地下博物館更加大量地更加頻繁地为我們开放出來嗎？我們应該作怎样的准备來迎接这个波浪壯闊的新形势呢？

問題提到了我們的面前，答案也就提到了我們的面前。我們要想勝任地应付这个新形势，很明顯地我們就必須擴大我們的工作隊伍，提高我們的業务水平，促進我們的政治覺悟，發揮我們的潛在力量。这些都必須有全面的長远規划，有組織、有步驟、有領導地团結一切力量來進行，然后才能使問題得到滿意的解决。

响应着党的号召，目前有关各部門都正在集中力量來進行着12年远景計划的拟訂。我們的考古工作，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也应該有一个12年的远景計划。到底应該怎样來擴大我們的隊伍，怎样來提高我們的業务水平，怎样來促進我們的政治覺悟，怎样來發揮我們的潛在力量，我們希望到会的各位同志多多考慮一下，尽量提供意見。这在12年远景計划的制定上是有很好的帮助的。这層也就是我們召开这次学術性的工作会議的又一个主要目的。

不容諱言，我們的考古工作的隊伍还是小得很可憐的。我們大多数工作同志的業务水平离世界的先進水平相隔还很远。近代考古学这門科学所涉及的学術部門很多很廣，它不僅和許多人文科学有密切关联，和許多自然科学和技術科学也有密切的关联。特别到最近，这門科学也進入了原子能时代了。用X射綫來

透視塑像內部，用同位素 014 來測定古物年代，在別的國度里已經早在進行了；而我們自己呢？却連許多初步的發掘、整理、研究工作都还沒有做到可以滿意的程度。我們無論怎样，是必以最緊張的努力，急起直追的。沒有任何理由，可允許自己有絲毫的驕傲自滿。

还有一項初步的拟議須得向各位同志說明一下。那就是我們希望在不長的时間內召开“考古学術会議”，邀請些世界的学者來参加。我們需要在这次会議中取得經驗。

对于中國的考古事業，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学者是异常关心的，同时其他國家的進步学者也有深切的关心。这是因为中國的考古事業具有世界性的深刻意义。人类史和世界史还有很大一片空白，急切需要由地下埋藏極其丰富的中國來加以补填。

特别在目前我們要打破欧美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观和以白种人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地下發掘的遺址、遺物和对于它們的深入研究，在我們是極有效的鋒利武器。

我們自己的努力是責無旁貸的，但我們必須認眞地学習世界先進經驗，欢迎世界的進步学者來一同解决問題，同时也就是拜他們做我們的老师。

同志們，关于这次会議的意义和任务，我們的預定就是这样。

請允許我再概括地說一遍吧。

我們的会議是学術性的工作会議。

会議的任务：

（一）总結和交流六年多來考古工作的經驗，提高工作水平；

（二）就考古工作 12 年远景計划的制定，交換意見；

这三項任务事实上也可以归納成为一項，那就是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適应國家建設的新形势，从考古工作方面來進行全面規划、加强領導，以最緊張的努力，爭取在 12 年內使我們的考古工作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

我們希望全体同志集中我們的智慧，把这一次会議开好，使这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議能够得到輝煌的勝利。

（上接第 6 頁）同时，在全國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之下，挖井，开溝，修路，取肥，建屋，开荒等等建設事業，已到处展开。如何在这个全國范圍內的農業合作化运动里做好保护古墓葬、古文化遺址的工作，是全國考古工作者們所不能避免的重大責任。要想办法來迎接这个嶄新的空前的大局面！

（四）密切联系群众，运用群众的力量，做好考古工作。

在过去考古工作者慣于“孤軍作战”，不知道联系群众，运用群众力量，甚至还存在着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看不起群众。这是必須徹底改造过來的。我們应該密切地和群众联系，結合群众的力量，和群众在一道，做好考古工作。只靠着几百个人，甚至几千、几万个人的力量，如何能在全國范圍內做好工作呢？如果不結合六億的工農群众，工作一定做不好。只要群众掌握了保护文物的观念，那末考古工作必定会做好。不是有許多重要的發現是依靠工、農群众來报告的么？这是必須抓住的关鍵性的問題：依靠群众。

（五）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培养少数民族的考古工作幹部。

少数民族有这个要求，我們必須滿足这个要求。从今年就开始，計划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考古工作，并和中央民族学院联系，如何培养少数民族的考古工作幹部。

同志們，考古工作的陣地是廣濶的，是远大的。我們只要努力工作，依靠群众，运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武器，学習苏联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我們就会有光明燦爛的前途。“專家”的光荣称号，不是輕易能够得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为赶上世界学術水平而努力，方不愧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國專家”。

考古事業的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考古工作会議上的报告——

鄭振鐸

光明燦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繼承了人类所有的最好与值得存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而吸取融化，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的。远在第1、2次國內革命战爭时期和抗日战爭时期，中國共產党就做了不少保护中國古代文化、科学实物資料的工作。在某些敌后解放区里还建立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机構。八路軍怎样保护山西趙城縣的金刻藏經的事迹已經成为人民所熟知的故事。自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文化部里就設立了一个文物局，为中央一級的保护古代文物古迹的專責机关。在1950年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陸續頒布了一系列的保护革命的、歷史的、藝術的文物的法令。各个省、市，为了貫徹执行法令，都前后成立了好些文物管理机構，主要的是各省、市的文物管理委員会，做了不少保护、收集和鑒定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績。但領導关系不明确，組織和工作的范圍也不一致，影响了事業的進展。到了1951年5月之后，方才逐漸的統一起來，領導也加强了。同时，中國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也逐步的壯大起來，能够負起指導全國范圍的考古發掘工作和培养幹部的事業。北京大学歷史学系的考古專業成立了，文化部、中國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考古人員訓練班也从1952年起，每年举办一期，由各省、市抽調幹部参加学習。除了学習文物政策、法令之外，主要的課程为文物知識和田野考古工作。結業之后，就可以从事于一般的田野發掘工作了。第一期畢業71人，第二期100人，第三期101人，第四期69人，一共畢業了341人，除了考古研究所的研究、技術人員之外，这341人便是散布全國范圍的考古發掘工作的主要力量了。这341人絕大部分都在省、市文管会里工作，成为各省、市的主要的考古事業的業务幹部，少数在各省、市博物館或博物館筹备处工作，那些博物館也做着些考古發掘工作。

随着國家大規模的建設事業的發展，考古事業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地下博物館"的大門紛紛的被打开。所要發掘清理的古墓不是三兩个或十多个，而是数百个，数千个乃至数万个。所有考古幹部的力量都动員起來了。成績是大有可观。自从1951年夏季治淮工程开始，接三連四的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鉄路、公路工程乃至各項基本建設工程都在進行着。1952年在鄭州、長沙、洛陽等地的城市建設工程里，就發現了廣大的古代的文化遺址和大量的古墓葬，獲得了空前未有的收穫。1953年起的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偉大事業开始了，156項的重工業建設全面展开，我們的考古工作隊便走在工程隊的前面，配合着基建的需要，首先从事于地下的古墓葬、古文化遺址的清理工作。同年10月間，政务院頒布了"关于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护歷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明确地指示着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护文物的必要措施。文化部、中國科学院和各个工業部門共同負起了这个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証文物不遭受到破坏与損失的重要任务。这指示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由于中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所屬的各省、市的文化局、文管会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們的努力与各个工業部門的合作，每个重要的工程，在事前都做了鑽探和規划工作，所以，一般地都能够完成任务，沒有出过什么很大的偏差，古代的和革命的文物遭受到破坏和損失的也很少。但因为某些地方的工作幹部業务水平不高，旧的作風还遺留着，在發掘清理工作里，除收集一些重要文物外，發掘記錄做得十分不够，甚至完全缺少。因之，必須提高業务水平，保証工作質量。又因为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程开始之后，考古人員的力量感到远远地不能应付需要。任务和力量的距离一天天的大起來。1955年，文化部作出了"重点保护，重点發掘"的方針，决定保留不妨碍工程安全与工程進行中不致遭受破坏或損失的古墓葬、古文化遺址，暫时不加以發掘、清理。这是必要的措施，避免力量过于分散，同时，也不使發掘、清理工作，因赶工而粗制濫造，質量低落。

約略地統計了一下，根据已有的初步材料，这六年以來，从各省、市的古墓葬、古文化遺址里所獲得的出土物，共計219,201件（零星的陶片等一百几十万件未計算在內，沒有送报告來的也未計算在內），誠是洋洋大观。在这些出土物里，最可注意的重要發現，有：

（一）1951年在成渝鉄路工程中，于四川資陽縣黃鱔溪發現了第四紀更新統晚期的人头骨化石。这是对中國原人問題的研究上所增添的重要材料。1954年春天，山西汾襄縣丁村發現了一处廣大而遺存物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遺址，采獲打制石核器二千余件，經过我們初步調查研究，肯定这个丁村遺址乃是周口店和鄂尔多斯以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遺址。將來經过詳細的發掘后，必將会有更多的輝煌的收穫的。

（二）新石器时代的遺址更有大量的驚人的發現。在黃河流域几乎到处都可以發現这个时代的遺址。現在所已知的，就已經超过解放以前的数字百倍以上。在几种文化分布的看法上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少新的情况的發現，如陝西宝鷄發現的，和考古所在西安半坡發掘的仰韶文化遺存，有些彩陶罐的形狀和花紋，就是从前未曾見过的一种新类型。此外，值得注意的，有長江中游湖北天門、京山、陽新、鄂城等縣發現的相当复雜的类似龍山文化和印紋陶系的遺存，以及湖北陽新、鄂城、蘄春和湖南長沙發現的印紋陶器，都是研究新石器时代遺址的新園地。長江下游淮河区青蓮岡花廳村和南京陰陽营和秦淮河沿岸的龍山文化遺址的發現，閩建閩江流域疊石山印紋陶遺址的發現，都擴大了研究我國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范圍。

（三）鄭州遺址是解放以來遺址中最大的，而且是重要的發現。通过这个遺址的發掘，我們進一步的明确了龍山文化与商代文化的关系。由于骨器、銅器等制作工場遺址的發現，說明了殷商时代的生產力的如何突飛猛進地發展着。从鑄銅的設备來看，我們可以相信，商代使用这个合金青銅，已經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由于这个遺址的發掘，我們对商代文化的分期有了更明确的輪廓。我們是在安陽殷墟之外，又找到一个三千五百年前的商代的重要遺址。刻字骨的發現使我們对于这个遺址的發掘，有了更大的希望的收穫。

（四）西安、洛陽等地西周墓葬的發掘，江苏丹徒以及热河凌源西周銅器的出土，是对于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安徽寿縣和山西長治等地的大批春秋战國时代銅器的發現，是研究当时蔡、燕諸國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而同时，也証明了这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与中國詩歌和散文的高度成就的同时，生產技術和社会經济飛躍前進的情况。热河隆兴鉄范的發現和輝縣、長沙、鞍山各处战國鉄制農具的出土，說明了生產工具的改革，引起了生產力的發达，生產量的激增，因而，交通發达，商業繁荣，把中國的社会面貌引到了一个新的階段。这是最可供研究的珍貴的資料。長沙古墓葬發掘中丰富多彩的收穫，使我們知道离騷、九歌的时代，南中國的文化是有其特色和优良的傳統的。

（五）兩漢三國的墓葬在全國各地基建工程中普遍發現。在廣东、廣西、云南以及东北各地都發現了大量漢墓。这就說明了漢代的政治、經济势力所及的范圍的廣大，同时，也就說明了在物質文化方面，漢代繼承了战國和秦之后，有了怎样巨大的發展。鄭州的無盖空心磚墓，以及洛陽燒溝和其他各地的漢墓的發掘，对漢代的社会的物質文化的面貌有了更全面的認識。而遼陽、望都、梁山等漢墓壁画的發現，四川漢墓的画象磚、山东沂南漢墓的画象石的出土，不僅使我們对漢代社会生活更为熟悉，而且在中國美術史上增添多少美丽动人的新篇頁。而四川的馬俑、輝縣的獸俑、文登的漆器与廣州的房屋模型、洛陽的彩画陶器都是十分生动、优秀的作品，代表了漢代建筑与工藝美術的進步的具体例証。

（六）河北曲陽和四川成都發掘出來大批的北朝和南朝的造象，特別是南朝造象的大量出現，为研究中國彫刻史的專家們提供了大量的未之前有的重要資料。洛陽、廣州許多晋墓的發現，反映了东西晋的兩个社会情况的对比。南京、宜兴、杭州墓葬中出土的許多瓷器，表現了中國陶瓷工業在这时代正是欣欣向荣地飛躍前進。

（七）西安、洛陽的隋、唐墓中出土的壁画和陶俑，使已經十分丰富的隋唐文物，更为輝煌燦爛。西安唐墓的壁画，在中國繪画史上將是一种無比重要的研究对象。

（八）經过南唐二主陵和白沙宋墓的發掘，首先是在建筑藝術上，丰富了我們对五代到宋这一时代仿木結構及彩画方式等知識。同时，那些陶俑，使我們和僅存于世的周昉的仕女对照起來，有了新的認識。

河南、山西、陕西、浙江、江西、廣东、福建等数十处古代窑址的發現，和所獲得的遺存的丰富与多样性，說明了宋代瓷器的生產技術是如何的進步，其生產量是如何的大量激增。在沿海地区的古窑址和其遺存物的出現，还証明了許多各式各样的宋瓷在东南亞和印度各地被發掘出來的來源所自。中國陶瓷史有了太大的收穫，是不能不全部改寫的了。

（九）鞍山陶官屯金元村落遺址，發現了比較完整的遺存，成为研究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东北農民生活的最有意义的材料。西安湖廣区圍元墓和山东济南市祝店鳳凰崗元墓出土的陶俑，又为我們的美術史供应了最好实物例証。北京董四墓村的明代妃嬪墓与南京西善村內官金英墓的發掘，在大量的明墓里是比較有顯著的收穫的。最不容易保存的日用品和首飾的出土，說明了那个时代工藝美術的發展情况的一斑。

（十）在云南晋寧出土的漢代一个女酋長墓的遺物，貴州盤縣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遺存物，以及我們在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的調查所得，內蒙自治区的許多發現，也都証明了在很古老的时候，我們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正像漢民族一样地在發着燦爛的金光。

在这里不能一一的叙述所有一切的在各地的重要發現。通过那些發現，可以証明，在所有那二十多万件古代遺存的文物，一百多万件的陶片，在对中國歷代的物質文化史和歷史、藝術、科学的研究上，提供出來的是多末重要的和多末丰富的材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研究的源泉。大量的地下博物館的大門既然被打开了，就得充分地利用他們。但这些还只是一个开端，一个令人兴奋的偉大的开端。不知道將还会有多少驚人的、动人的收穫在等待着我們去取得呢！

为了要更好地做我們的工作，为了要和全國人民、全國学術界一同努力地進行社会主义的建設事業，我們今后必須：

（一）純潔我們的隊伍，加强自我改造，徹底地批判存在于考古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

在考古工作隊伍里，不可怀疑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是純潔的。但如果說，沒有極少数的坏份子暗藏在里面，那是不可容忍的麻痺大意。所以，純潔我們的隊伍是有必要的。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更是必要的。知識份子和工農联盟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幹。如果知識份子还是一腦子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如何能够和工、農階級在一道从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呢？在考古工作人員里，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不能說已經徹底肅清，而且，还应該說，是嚴重地存在着。內部鬧不团結，有宗派主义，和群众关系搞不好，在工作中有挖宝思想，把持材料，自己不研究，也不讓別人研究，濃厚地存在着分散主义，地方主义，要一举成名，要名利双收，功臣自居，驕傲自滿，却沒有研究如何把中央的政策、法令如何貫徹执行。这些，不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在作怪是什么！要知道，發現了重要的古墓葬、古文化遺址，乃是应該感謝我們老祖宗們遺留下來的好財產，如何能够自己居功。还有，我們的考古学，除了繼承了宋代以來的金石学傳統之外，主要是从欧美搬过來的資產階級的考古学。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嚴重的。在工作上就充分的随时随地的表現出这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我們必須徹底的批判并肅清它，才能做好工作。如何才能够批判并肅清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呢？当然是只有加緊学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条路。考古学是研究人类物質文化的科学，更必須以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为基礎。方向偏差了一点，效果就会大为不同。

（二）加强学術研究工作，为在十二年內赶上世界考古学水平的目标而努力。大量培养新生力量。

不可否認，我們的考古工作人員在学術研究上是落后的。大批的考古工作人員距离"專家"的称号还很远。必須加緊学習，学習苏联和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学習世界上最新的科学。随着原子学的發展，考古学上应用同位素的时代也到來了。我們必須在这十二年之內赶上世界水平。而大量地培养新生力量更是关鍵性的問題，必須抓緊地办到、办好。

（三）做好配合國家社会主义工、農業建設的文物清理工作。

我們考古工作在这几年來配合基本建設工程中，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了相当好的經驗。但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还很多。首先是，应該走在工程隊之前的，却常常落在后边，不能好好地配合工程的進度，陷于被动，在文物保护工作上打了很大的折扣。現在，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到來了，考古工作的責任是更大，更重了。我們必須擴大隊伍，学習工人階級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來配合工業建設的發展。（下接第3頁）

考古工作和人骨獸骨等遺存問題

楊鍾健

这次考古工作会議，我能有机会同各位同志見面，看到許多丰富的报告和資料，学習了不少考古方面的知識，感到十分荣幸。我对于考古工作，完全是外行，但由于工作上的接近，对于考古工作，富有兴趣。所以我想就考古工作和人骨獸骨等遺存的研究这一問題上，提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解放以來，我國的考古工作，有了空前的發展，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不在此重述。在各种規模不同的發掘过程中，獲得了大量的科学資料，包括很多人的骨骼，獸的遺骨，乃至魚或介殼类遺存等等。

这些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不成問題是整个考古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些遺存，我們可以了解各有关墓葬或遺址的文化情况，以及許多意想不到的科学收獲。解放以前，在河南安陽殷墟所發見的獸类遺存，已加以研究，就使我們对于那时期的动物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趣的待解决的問題。譬如說，在殷墟的獸骨中，我們找到現在只在陝西、太白山一定高度的山上生存的轉角羚，証明在三千多年前，或者是由人工搬去，或者是在动物分布上，和現在的有很大的不同。

这多年來，我們由考古工作而所獲得的人骨，与其他骨骼等，固然不少，但是很顯然，对这一方面的注意，以及采集的方法，与整理的方法，顯然还不很够；更不用說進一步把这些宝貴的材料加以研究了。这顯然是一种損失。

在古代文化遺址中，几乎無例外的都有許多人和獸等的骨骼遺存。这些正是研究古代文化的最宝貴的材料，和古生物学家根据古生物化石認識地球歷史，有同等的价值。例如河南安陽殷墟，以及近几年來在其他各地所發見的同时代遺址中，有大量的獸骨被用作工業原料，四不像鹿角等，均被切作一段一段的，以便進一步制成成品。有些骨头簡直当作紙來使用，上边刻了古代最可宝貴的甲骨文字。这就說明当初人的活动，是和他們那时的动物环境，及其他自然环境密切的联系着而不可分隔的。

至于墓葬中，除了人本身以及陶器等殉葬物品外，也大多数还有殉葬的獸骨，或祭祀用的肉等所含的碎骨等。这些东西的科学价值，也不在文化遺址中的遺存以下，通过对于这些实物的了解，不但可以解决当时人种学上許多問題，而且对于民俗学來說，也起很大的作用，而不用說那些獸骨本身的科学价值了。

因此我們的考古工作者，有責任把这些科学材料好好地收集起來，加以保管，加以研究。有責任使这些材料不至被輕視，或者散失，造成科学上不可弥补的損失。

必須指出，这些材料的整理与研究，不是古生物学家或是古人类学家的事。旧石器时代的發掘与采集工作，还可以說用的是地質学和古生物学的方法，而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人骨与獸骨的采集与研究，完全可以用研究現代人与动物的方法去做的。

我們知道猿人的歷史，就現在所知为五十万年左右，古人的歷史，約十万年左右，而过去几千年，乃至兩三万年的歷史，完全是眞人的歷史。換句話說，这时期的人，都是 Homo sapiens 一种。在古生物系統上來說，这已是最小的分类單位了，他們不可能再進一步区分。進一步的区分，就有待另一門科学——体質人类学了。

至于說到哺乳动物，和其它动物的遺存，当然更完全是現代的种类。安陽殷墟的动物群，虽然也有几个新种，但这只說明我國动物学上，关于現代动物的調查做得还不够，或者那些所謂新种，只是一种变种。無論如何，那时的高等动物群，和現代的是十分相近的。至于魚以及無脊椎动物，当然更相近了。所以新石器时代的所有的动物（当然应当包括植物在內），都是要用研究現代生物的方法去研究的。因此我今天來

談談这个問題，不是以一个古生物工作者的見地來談的，而是根据一般的科学研究情况來談的。但是并不等于說古生物工作者，就不能，或不应当，做这些工作。如果需要的話，他們还是可以参加的。

以上既然說到無論新石器时代的人，或是动物或其他生物遺存，都和現代的相同，那么是不是就沒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必要了呢？是不是这些遺存就可以听其散失，或者根本不必用精力去采集呢？完全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話，我們今天就沒有談这一問題的必要了。

最近在我政府英明的領導下，爭取我們的科学事業要在第三个五年計划以前，达到或至少接近國际水平。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們要把科学上的空白点、或空白面填充起來，要把根基比較薄弱的部門充实起來，要把已有根基但仍然人数很少的方面，也要更为提高。总之，我們要建立一个能为國家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完整的，坚强的科学隊伍。在这个号召下，看一看我國各門科学的工作，都还存在着很多的問題無人研究，还存在着大量的空白点或空白面，或至少有些方面还是十分薄弱。我想我們考古方面的工作，恐怕也不能例外。單就今天所要討論的，从人和动物的遺存來說，就是一个很大的空白面。过去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做的几乎沒有，而現在也完全在停止狀态，不能想像要达到國际水平的，考古工作始終停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現在姑且就在考古工作中，所發見人骨獸骨等有关的一些研究，提出以下不成熟的意見。个人的想法，以为这些問題的進一步認識与研究，將意味着或者补充我們研究工作的某些空白科学或空白点，或者將有助解答一向在学術爭論上，以及人民大众所最关心的某些問題。

一、人类形态学的研究問題——我國現在是个多民族的國家，过去也是个多民族的國家。在歷史的記錄中，民族迁移的情况，很为复雜，与隣近民族交往的情况，也十分繁多。漢族的來源，与形成的歷史，依然还是待解决的一个重要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固然有待于歷史方面的研究，但从考古所得的人骨的研究，相信一定可以得到相当滿意的結果。

人类学中，除了人类的起源問題，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甚至以前的研究，至于人类形态学与人种学兩部門，則依靠更新的，以及近代的材料去解决。在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还是很大的空白点。当然光研究文化遺址，和墓葬中的人骨，只是解决这些問題的一方面，还有其他許多要建立的部門，但毫無疑問，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而且可以肯定的說，如果对这方面的材料不予以重視，那就在整个科学中造成很嚴重的損失。

所遺憾的，过去一部分这一类工作，大多都是國外人做的，而且所有的工作都是孤立的研究，从來沒有全盤考慮問題，研究的方法，也常存在着若干的缺点，往往只就一部分的观察，就想得出很突出的結論，更不用說內中还摻雜有唯心的成分很多了。

我个人相信我們在考古工作中，关于人的材料的研究，乃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尤其是越是較为丰富的遺址，其需要研究的程度極为迫切。已得的材料固然需要研究，即將來的發掘，对于这一方面的，尤当加倍注意。这些工作，將同現代体質人类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成为我國人类形态学与人种学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家畜的問題——上边說过在墓葬中，和文化遺址中的獸骨，和别的动物的遺存，很多都是重要的科学材料。这些材料的進一步的研究，可提供新的事实，或理論的推判，乃是不容置疑之事。首先是家畜問題。我國歷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又有很多的遺址，所以有条件对于人与动物作斗爭，如何把一些动物馴化成为家畜，有的当作动力，如馬牛驢騾，有的当作鐘表或警衛，如鷄狗，有的当作食料或原料，如牛猪羊等。但是这些动物，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家畜，变成的过程又是如何？可以說到現在还是学術上待解决的問題？

这个問題的研究，更有其实踐的意义，对于新品种的培养，起相当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國在農業方面有几千年的丰富經驗，就是沒有加以科学的整理。关于家畜的育成，也一样有丰富的經驗，除了用歷史方法外，考古方面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問題的研究分为三方面：

（1）現代家畜标本的搜集与研究。

（2）歷史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各种动物标本的搜集与研究。

（3）旧石器时代各种动物标本的搜集与研究。

就目前我們的情况來說，（3）做的很少，（1）和（2）几乎沒有人做，豈不是大大的空白点嗎？

举例來說，我們在殷墟所研究的动物群來講，猪的遺骨非常之多，但和現代猪有很大区别（另一种），究竟这些猪是野的还是家的，尚不得而知，但由有乳牙的很多看起來，可能已开始被馴化。为当时用作工業原料的，以四不像鹿为最多，但四不像鹿，是到現在还是野性很厉害的一种动物。所有这些事实，都說明我們对于这些有兴趣的科学問題，几乎还是一無所知。

是不是我們就不能知道呢？我想我們不是不可知論者。我們拥有大量的文化遺址和墓葬的材料。只要把这些材料加以小心的搜集，縝密的修理，適当的研究，就可以解决許多問題，甚至全部解决。譬如苏联对于古生物的研究，物質文化的研究，非常注意原來在野外埋藏的情况，他們甚至創立一新科学叫埋藏学。由野外埋藏的情形，可以推知当时各生物彼此的关系，所以对于动物馴化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由于大量标本的研究，可以从牙齒的情况断定是否已被馴化。柏林有一个家畜博物館，采集了大量的家畜标本，这些标本与眞正的野生的标本，有根本上的区别的。甚至四肢骨也可以提供不少綫索。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通过我們对于这些由墓葬和文化遺址的各种骨骼的研究，將給我們解决許多以前認为不能解决的問題。以前河南濬縣發掘了大量的馬骨遺存，我們曾希望知道內中到底有驢騾骨沒有？因而就可对此問題提供一些知識。不幸这些材料以后被弄得遺失了。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重發生。

三、关于新石器时代以來动物的迁移分布等問題——除了家畜問題以外，把所獲得的獸骨等研究結果，还可以帮助解决生物学上許多問題，从我們的歷史記載上，可以看出自有歷史以來，有許多动物如象等，原來在北方有的，以后沒有了。就是說过去的分布与目下有許多不同。有些动物还經过人工的迁移。这些情况的实际記錄之一，就是靠那些獸骨等遺存。不用說这些材料的研究，对歷史时代以及稍古一些时代的气候有無变化，也可提供一些資料。

拿已研究过的殷墟獸骨來說，对于以上所述三个問題可以說都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資料。如也有象的骨骼，水牛的骨骼等，甚至还有竹鼠鯨魚等骨骼，大量的鹿与猪更不用說了。总的說來，动物群的組成情况，和現在的大不相同。不过很顯然殷墟的动物群，是受了人工迁移的影响的，如象鯨魚等。但有些动物絕对不会被人工移殖，如竹鼠等，这些动物甚至連同水牛，就都可以說是动物分布与目前不同的証据，当然那时的气候和現在，也就有所不同了。

这不过只是举了一个例子，相信其他遺址与所有墓葬的遺獸的研究，一定可以提供我們許多更新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用在这些問題上，还往往不能执一而論，而是要多方比較。当然材料越丰富，越能用統計方法研究，可靠性就越大。

把新石器时代与歷史时期的文化遺址，与墓葬的各种动物遺骨加以研究，还可以起另外一种副作用，解决我國歷史上到現在还未能解决的問題，那就是龍、鳳、麒麟即所謂"三灵"的問題。

原來我國从很早的傳說，以及眞正記載中，就把龍、鳳和麒麟当作了不起的奇异动物，尤其是龍和鳳被封建統治者当作他們統治的象征，麒麟虽沒有那么厉害，但一經孔子看到，也弄得深入人心。直到現在，由人民來信中可以看到，一般群众对于这三种动物，还是將信將疑，不知道到底还是有沒有，尽管一些研究过动物的人，覚得这三种动物，只是傳說，未必眞有其物，但总是說服力不大。我想如果从大規模的發掘中能証明沒有这些东西，必然可以解决些問題。

实际上据我們所知，不但自安陽殷墟动物群起，以后的动物与現在大多数都是習見的动物，并沒有什么奇特之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已知的动物群，乃至旧石器时代的动物群，都和現在的动物群，只有分布或种别上的小小差别，絕沒有什么奇特的动物，如龍、鳳、麒麟三者。但是如能有更多的新的所得材料，那就可以确切無疑的知道眞是傳說，而不是实际有那些动物了。

总而言之，通过这些看來好象無大用处与实际意义的动物遺存，我們可希望解决許多科学上的有兴趣的問題。

四、人与动物的关系問題——最后还要指出的，就是不成問題，自有人类以來，人与它所处的自然界作斗爭而相互影响。自然愈是距現代愈近，这种关系自然愈为密切而重要。总的發展过程是愈距近代愈近，人克服自然能力的程度也愈大，到現在人在大体上說，完全可以控制自然了。当新石器时代以及歷史时期的初期，人征服自然能力，比起，譬如說，中國猿人时代已不知大了若干倍。在周口店中國猿人地点，我們只看到燒过的一些獸骨，但从未見有一塊像在殷墟所看到用动物骨骼作工具，作記事的記錄簿等等。不成問題，我們可以从各文化遺址与墓葬中人与獸骨的关系，得到無数的啓示，帮助我們了解那时代的歷史的一部份甚至生活狀况，一直細微到風俗習慣等等。

这些研究，如單是研究个別的一个或几个，或者一个时期或少数时期，虽然也有效果，不过不如有系統研究所有各时代，各地区，來得更有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一方面可以彼此比較，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时代的發展情况，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也須要一个全面規划。我們必須要認識这与近代动物很相似的动物群的研究，是一种特別細致的工作。要与近代的相比，也要与更古的相比，更要同时代彼此相比，更要能用精密的統計方法等等。

由以上所述，我們看出我們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遺址，与歷史时期的遺址，与墓葬中所發見的各种动物遺存，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科学材料，由这些材料我們可以得到远古的，各方面所需要的知識。毫無疑問，应当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至少可采取以下的一些措施：

1. 今后在發掘中应当特別重視这一类材料的搜集，尤其应当注意到原來在野外埋藏的情况，加强关于埋藏学的研究，使每一遺址每一墓的野外实况均有詳細的記錄。

2. 开辟適当地点把这些材料集中在一起或按区域，或按时代加以排列。認眞的加以初步鑒定。

这种鑒定工作要培养一批幹部，大凡近代人骨獸骨最常見的不过十种左右，多的不过三十种左右，作初步区分并不困难。

3. 或独立的或与有关畜牧机構合作，設立一家畜博物館，把我國現在的家畜骨骼大量搜集，加以整理，并研究其間变异的程度。

4. 在考古机構中設立人体骨骼与獸骨研究組織，試做上述的一些工作，此項工作并可与有关單位取得密切合作。

相信在这些措施之后，材料可以保存，不但可進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当然这項研究并不是沒有困难的，比如材料破碎，性質差不多，不易找出区別來，近代的种类还沒有搞清楚，比較上有困难等等，但这些困难可以逐步克服的。我相信这些材料本身的比較，如成年与幼体的比例，牙齒的变异等，就可以解决一些問題，或对進一步的研究有所啓示。換句話說也就可逐步的减少困难。

当然，这一类研究，除了材料本身外，还有必要的圖書与其他必要輔助用的設备。这些更不是很难解决的問題。

至于从一个对考古工作完全是外行的人來談，这一类工用是不是合適，还得請教。这些工作究竟应当不应当由考古工作者做，或另設其他机構，我也沒成熟的意見。我所要提的只是在考古工作中所已獲得或將要獲得这些人与獸的遺存是应当加以好好的保存与研究的。我个人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覚，就是認为科学的發展，往往在边界科学方面。一个边界科学的胚成与發展，不但在科学領域中，添了一只生力軍，往往可以反轉过來推动其他有关的边界科学。不成問題，上边說的新石器时代及歷史时代人骨与獸骨的研究，似乎是樹立，譬如說：人种發展与家畜進化的先声。

1956年2月9日

讓考古科学在祖國社会主义建設高潮中壯大

——祝考古工作会議——

李文信

2月21——28日中國科学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國考古工作会議，大会上將檢查过去的工作缺点和收穫，也將討論关于考古工作和文物事業的十二年規划远景及今后工作任务和施行步驟；宣讀1955年度的主要發掘工作的專題报告。討論大学歷史系考古学通論教学大綱和培养新生力量的計划。并号召考古界全体成員，主动的進行自我改造，批判唯心主义观点，加强馬列主义理論学習，提高政治覺悟和業务水平，緊密团結在党的周圍，擴大隊伍，發揮最大積極性和創造性，把考古工作作的更好。这次大会的召开，可說是：动員全國考古工作者为完成在十二年內接近世界先進科学水平而努力的進軍号角，是迎接文化高潮即將到來的序曲，是考古学在祖國偉大社会主义建設中鍛練壯大的标志，也是中國考古界史無前例的一件大喜事。

考古学在旧社会得不到正常發展，有一点点工作和材料，又多被少数人所把持，有的甚至違反人民利益，破坏盜竇或变成帝國主义掠夺我國文化遺產的助手。有的又是为考古而考古，使它脫离了歷史研究，削弱了根据实物史料恢复人类社会的歷史过去的面貌的積極作用。事实証明，只有中國共產党和毛主席領導着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然后古代文化遺產和考古科学、歷史研究、文物工作、歷史教学等歷史科学工作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視。也才有可能运用考古材料和一切文化遺產对人民群众進行愛國主义教育，达到毛主席教導我們的"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崇高目的。党和毛主席是一貫重視民族文化遺產的。远在抗日战爭的艰苦年月里，排除万难，保护了山西趙城縣古版大藏經的安全；解放战爭中，蒐集保存了大批由北京故宮盜运到东北的歷代名貴書画；这是人所周知的兩个顯明事例。开國以來，先后頒布了各种保护文物、古建、圖書、稀有生物及古文化遺址和古墓葬的調查發掘法令，对避免文物外流和史迹破坏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又有計划有步驟的進行了各地重要史迹和文物的保护工程。各省市縣对古建和文物的修繕管理、移建保存的工作，更多到不能說完。

几年來在祖國大規模开展的基本建設工程中，無論是筑路掘渠，或是建厂开鑛，地下总有古代的文化遺址和墓葬被發現，而且分布的面積很廣，包括的时代很全，出土的文物数量也很多。几年的考古收穫，已超过过去几十年間收穫的总和了。如像洛陽西郊一所中学建校地基，在二百五十畝的面積上，就發現了五百三十多座漢墓。鞍山市东地一个机甎厂的厂地上，也清理發掘了四百多座漢墓。長沙市几年來的發現只战國和兩漢的墓葬就在千座以上。鄭州全市是建筑在殷商早期的包含文物極为丰富的一个廣大遺址上面。这种盛况是北由內蒙，南到廣州，东由遼寧，西达甘肅和新疆，全國都是一样的。正因为是这样，在今后工農業的飛躍發展中，文物、史迹、古建筑物等保护工作的要求，也就越發感到迫切。我們建議：全國考古工作者、歷史研究者、文物工作人員、大中小学校的歷史教师和同学們，以及热爱祖國的廣大人民，我們大家动員起來，自动自覺的采取一切愛國的有效行动，保护地上地下的一切古代文化遺物，免受損坏。使古代光輝燦爛的文化，为我們今天壯濶宏偉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

考古学是歷史科学的一个組成部分，它不但对沒有文字記載时期的原始社会史提供唯一的歷史資料，就是对文字記載丰富的歷史时期，也有訂正史書的錯誤，补充史書記載不足的作用。

我們这几年考古学上的收穫是驚人的，对歷史学上的貢献也是很大的。

在原始社会史方面有：山西襄汾丁村古人类化石和多量旧石器的發現，四川資陽古人类头骨化石和骨制

品的發現；最近廣西來宾麒麟山洞古人类头骨上顎骨化石和过去所謂南方巨人的牙齒化石的發現；安徽泗洪下草灣，吉林榆樹周油坊也有零星古人骨的發現：这些不平凡的發現，說明祖國大地上远在四五十万年前就不止周口店等几处，而是各处都有人类在生活着、劳动着，創造着文化，給人类原史社会史增加了內容。南方巨人化石的出現，又給人类由猿到人的發展史中，增加了一个有力的鏈环。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遺存發現更多。西安市半坡遺址發現了長方大屋址和很多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充实了氏族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知識。浙江、福建、兩廣的几何形印紋硬陶和鉞形石器的發現，在仰韶龍山兩文化外，又提出了东南沿海的一个新文化。黑龍江依蘭倭肯哈达洞穴發現了多种玉佩和篦紋陶，它表明古代中原文化和西伯利亞文化在松花江下游的混合。江苏新沂發現的一种含有新成分的龍山文化，給山东城子崖和浙江良渚鎮兩文化之間找到了联系桥梁。吉林西团山大群墓葬中都發現了猪头骨，証实了史書說挹婁人喜养猪，食肉衣皮的眞实。吉林騷达溝大石墓的出土，証实了山东半島和遼寧分布的石棚（巨石建筑）的墓葬性質。

殷商歷史，可以說是近几十年來从安陽的考古材料上重新建立起來的。近年又發現了鄭州二里崗和輝縣琉璃閣殷代早期遺址，琉璃閣晚期墓葬群。在安徽、陕西、山东也有殷商文化遺存的出現。这些材料，使我們不僅僅知道殷商社会的晚期情况，也了解了一些早期情况；不僅僅知道安陽一处，也知道了其他很多地方的文化。这样就有可能逐步把殷商歷史發展，特別是生產力与生產关系情况，以及藝術科学的成就，描画出一个更为精确細致的圖面。

关于周代文化遺存的發現就更多了，只就銅器一項說，有江苏丹徒宜侯銅器群的發現；有安徽寿縣大群蔡侯銅器的出土；热河省凌源銅器群，山西有永济大批銅器的出土；河南鄭縣也發現了一群青銅器。少的几十件，多的一二百件，有的帶有較長的銘文。这样就对西周、春秋和战國的歷史，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在文化分布地域上也有了新的开展。

机軸、关捩、齒輪等机械的發明应用，在我國是很早的。漢史說張衡能使三輪自飛，之后不久就有人用齒輪傳动作用原理制出了指南車。近年关于这类机械零件的發現是不少的。山西永济縣薛家崖出土大批战國到漢的銅器中，出現了銅制軸承三件，它是一种环狀槽子，內分四格或八格，每格中都有鉄珠的殘遺。齒輪五种：有正齒輪、棘齒輪，有片狀三角形一側有三齒的，有五个長齒或短齒的，也更有圓管的一头或兩头有齒的。类似这种机械的銅件，在長沙等地也有过不少發現。这就有力的証明祖國远在二千年前机械科学的成就已經很高了。这可以粉碎了机器都是西方人發明的謬說。

鉄農具是研究封建时期農業生產力發展的物質材料，也是冶鉄技術高低的尺度。河南輝縣战國墓出土了將及百件鉄農具；热河兴隆战國遺址出土了七十余件農具范；甘肅古浪，湖南長沙，遼寧鞍山和遼陽，河南洛陽和白沙，四川廣漢和綿陽，都有一定数量的發現。少則三五件，多則几十件以至百余件。时代是多由战國到西漢，內容有：鑺、鋤、鏟、耡、鍬、鐮、三齒耙、鏃、鐏、銍、犁壁等十几类。它們給当时農業生產發展作了有力說明，給兩漢剝削農民的農具官賣制度作了見証。

此外有几項發現，对祖國藝術文化史方面的貢献也是極大的：第一、遼寧遼陽壁画漢墓群，河北望都壁画漢墓，山东梁山壁画漢墓的先后出土，給中國上古繪画史增添了光荣篇幅。第二、河北曲陽古修德寺址，一次出土了佛教石像及殘件二千六百余件，刻有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年款的就有二百三十七件。四川成都万佛寺址，一次也出土了石彫佛像百余件，有南梁、北周、唐代年款的四十五件。这些年款明确，朝代銜接而又成群出現的雕像，为我們研究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雕刻藝術，提供了大批新材料。第三、河南鄭州二里崗高溫硬質褐綠釉陶尊和大批釉陶片的出土；河南洛陽合作社周墓，江苏丹徒宜侯矢毀出土墓，西安斗門鎮西周墓，都出土了青釉陶豆；河北石家庄战國遺址中出土了不少灰綠釉陶器片：这些資料給中國兩漢魏晋以來大發展的陶瓷器，找出了源远流長的新根据，把祖國造瓷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这僅僅是新發現的一些考古材料，丰富祖國歷史文化的几个淺顯事例。今后随着祖國基本建設的日益擴大，農田水利的大力开發，地下保藏的文物也將源源不断的被發現出來，我們只要加意保护它，研究它，利用它，它就会对祖國过去的歷史，对祖國今天的建設，作出極大的貢献。

第一次全國考古工作会議决議

中國科学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國考古工作会議，于1956年2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議的有北京和21个省市的考古工作者、文物工作者，歷史研究人員和大学的考古学教师，共180人。会議上分别听取了中國科学院郭沫若院長和文化部鄭振鐸副部長所作的关于考古工作的报告，宣讀了考古發掘專題报告26篇，交流了工作經驗，对今后的任务和努力方向，有了明确認識。大家一致認为这次会議的召开，是適时的，对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是有積極推动作用的。

建國六年以來我國的考古文物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領導关怀下，有了空前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由于專業的考古工作者的隊伍較小，科学水平不高，我們的工作还远远地落后于实际需要，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發展。为了把考古工作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我們必須發掘潜在力量，大力培养幹部，掌握先進科学方法，提高業务水平，加强文物保护和普查工作。我們建議科学院和有关部門，按照"全面規划、加强領導"的方針，制定出有关考古工作的全面規划，对上述各項，作出統一的具体安排，規定進行步驟，來保証我國考古学在一定时間內，接近和赶上國际先進水平；解决歷史研究上的迫切問題。

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正在一日千里的發展，大規模基本建設在全國進行，保护文物是目前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建議：文化部制定出有关古墓葬、古遺址等全面的文物保护条例，以及普查登記，發执照等具体的保护管理办法。希望我們考古工作者和其他崗位上的工作人員，積極宣傳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和方法，發揮廣大人民所素有的愛护鄉土文物的热情和積極性，协助政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全國厂礦、鉄路、公路、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都在动土施工，黃河長江及各水系根治利用的綜合規划，正在有步驟的進行，"地下博物館"的大量开放，給考古工作开辟了廣闊前途。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要与基本建設的有关部門，緊密合作，在既利于工程進行，又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則下，把文化遺產保护工作做好。希望各部門的工程人員在設計、施工过程中，給我們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会議号召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要積極的学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加强团結，端正学風，掌握先進技術和方法，提高思想覺悟和業务能力，为爭取考古学在12年內接近和赶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努力。

为了進一步学習先進經驗和方法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更廣泛的交流工作經驗，大会决定于1957年召开一次考古学術会議。

我們深深相信，全國考古工作者，經过这次会議，將更加緊密的团結在党的周圍，在科学院和文化部的指導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發揮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做好考古工作；在学術研究工作上、在对人民群众普及愛國主义教育上作出貢献。我們一定用自己的行动來迎接祖國文化建設的高潮，完成党和政府交給我們的光荣任务。

考古工作会議全体大会

給全國青年突击隊員們的公开信

在各个社会主义建設的战綫上的，特别是在農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战綫上的青年突击隊員們：

我們寫这封信的时候，外边正在飄飛着大雪，但就在这个大雪天里，我們相信，你們还在辛勤地为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突击地工作着。我們是多么的欣羡你們，欽佩你們啊！就在我們当中，也有青年突击隊員，他們也是緊緊地跟随着整个國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展开而辛勤地展开着考古發掘工作的。我們的第一次全國考古工作会議，今天宣告閉幕了。在整个一星期的开会过程里，我們討論到全國考古事業的过去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对于考古工作者如何为工農業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談得特别多。我們一致地感到，祖國的建設事業正在一日千里地發展着，無数地下博物館——古墓葬，古文化遺址——正在紛紛地开放。已經埋藏了几百年几千年乃至几十万年的古代遺物，現在得以重見天日，为我們現代人民所利用了——利用來作为歷史、科学研究之用，利用來作为文化、藝術的推陈出新之用等等——我們的对于古代的知識也因之更为丰富了。还有，我們过去所不曾發現的深藏在荒山孤村里的許多名勝古迹和紀念建筑物，現在因为全國規模的農業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來，也紛紛地被發現了。所有这一切，在建厂筑路，挖溝打井，造水庫，積肥料等等工作中所發現的古物和歷史的、革命的、藝術的紀念物（例如古庙和其中的神佛像就是屬于藝術性的紀念物）很容易在無意中受到毀坏或損失，那些損失或毀坏是永久無法弥补的，因为古代的东西，往往是"只此一件，無法新制"的。失去了就永远地再也不能为我們所見了！親愛的青年突击隊員們，你們是產業战綫上的先鋒隊，同时，也是文化战綫上的先鋒隊。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中國人是应該懂得怎样愛护祖國的文化、藝術遺產和歷史的、革命的藝術的紀念物的。我們現在有几个簡單的保护这些珍貴的优秀的古代文化遺產和紀念物的意見，向你們提出。

（一）要在工地上和農村里宣傳：凡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像銅器、玉器、磁碗、陶、瓦器、金銀首飾等等，和散在偏僻村落的古庙、古墳、名勝古迹等等，都是屬于國家的財產，任何人不得加以侵占或破坏。如果有侵占或破坏的行为，那就是違反憲法第三章第一〇一条了。你們要說服任何一个企圖侵占或破坏國家財產者。你們遇到这种事，必須为維护憲法，为維护國家財產而坚决斗爭。

（二）在發現古墓葬、古文化遺址时要及时地和各級文化部門取得联系，最要緊的是向他們及时报告，以便作出最好的最及时的处理办法。十分重要的古墓葬，古文化遺址，名勝古迹和紀念物等是不能允許加以任何破坏的。否則，对于國家的文化遺產，对于科学、歷史研究就有很不利的影响了。

（三）散在各鄉村、各区鎮的，还有从地主那里交出的綫裝的古書，从古庙里發現的銅鉄鑄的佛像、大鐘、香爐等等，不能作为廢銅廢鉄处理，应立即报告各級文化部門加以集中、鑒别，处理。

还有很多应該注意的事，但以上的三点，是特别重要的。宣傳、教育的責任就在你們身上。某一个鄉、某一个村、某一个区鎮、某一个縣，如果有著名的名勝古迹存在，有重要的古墓葬，古文化遺址發現，那就是那个地方的光荣！你們做好了保护的工作，那也就是你們完成了你們的光荣任务之一！

祝你們身体健康，工作勝利！

考古工作会議全体大会

1956年2月27日

考古工作会議記要

正当我國热火朝天地進行着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尤其是当全國范圍內的社会主义農業合作化运动迅速發展的时候，中國科学院和中國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学術性的考古工作会議。会議于1956年2月21日在北京举行，2月27日勝利閉幕，歷时7天。参加这次会議的有北京和21个省市的考古工作者、文物工作者、歷史研究人員和大学的考古学教师，共180人。

在21日早上的开幕式上，中國科学院院長郭沫若講了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中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做了題为"考古事業的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的报告。下午，会議还听取了北京大学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关于培养考古幹部的工作問題"的报告、中國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楊鍾健的"考古工作和人骨獸骨等遺存的問題"的报告，以及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長費孝通"关于考古学同民族学关系問題"的报告。水利部副部長馮仲云在会上也講了話。

郭沫若院長首先兴奋地指出，建國六年以來，我們的考古工作已獲得了空前的成就，据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出土的遺物在20万件以上。这种新穎而大量的考古材料的發現，大大地丰富了并在某种程度上端正了我們的歷史知識。关于这次会議的主要任务，郭沫若院長簡短而明确地指出：1. 总結和交流六年多來考古工作的經驗，提高工作水平；2. 就考古工作12年远景計划的制定交換意見。他接着說，实际上这兩項任务归納起來就是：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適应國家建設的新形势，从考古工作方面來進行全國規划、加强領導，以最緊張的努力，爭取在12年內使我們的考古工作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他在最后指出，希望全体同志集中智慧，使这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議能够得到輝煌的勝利。

文化部副部長兼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在报告中着重地报告了六年來重要的考古發現及其意义。他最后說，为了更好地做好我們的考古工作，我們今后必須：1. 純潔我們的隊伍，加强自我改造，徹底地批判存在于考古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2. 加强学術研究工作，为在12年內赶上世界考古学水平的目标而努力，大量培养新生力量；3. 做好配合國家社会主义工、農業建設的文物清理工作；4. 密切联系群众，运用群众的力量做好考古工作；5. 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培养少数民族的考古工作幹部。

翦伯贊在他的报告中介紹了过去培养考古幹部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問題供会議研究，对今后培养考古幹部也提出了建議。在楊鍾健的报告中，他着重地指出，希望考古工作者在發掘中要时刻注意人骨和獸骨的遺存，加以保护和研究。費孝通在报告中說，希望在做考古工作时要注意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歷史有关的地区的工作，而且这項工作应当和民族学、語言学、人类学一起密切配合，最好能做出一定区域內綜合性的歷史研究規划。

2月22日上午，会議举行全体大会，由中國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秘書刘大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分别作了关于社会科学12年規划的报告和傳达报告。刘大年在报告中首先指出这次做哲学社会科学規划的重要性，然后談及在規划时会碰到的問題，最后又談到了規划的步驟和內容。他对怎样做考古科学的12年規划提供了初步建議。的确，科学家們应当有責任認眞、嚴肅、負責把全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12年規划制定出來，我們相信在党和政府領導之下，一定可以完成此項任务，爭取在12年內，把我國的科学水平接近或赶上世界的先進水平。下午分組討論大会的各个报告。在各分組会上，代表們一致認为这次大会的召开是適时的，各位首長和專家的报告对大家的啓發很大。代表們紛紛提出具体的建議。年老的專家們提出保証，要在12年內帶出若干名徒弟來。年青的考古工作者誠恳地表示应老老实实地向年老的一輩学習，必須向科学的堡壘進攻。同时，他們还批評了自己过去同老科学家鬧不团結的錯誤。代表們在討論中一致認为，应迅速擴大考古隊伍，改变目前考古水平低下的情况。今天的会議充滿了热情、信心和希望。

23日的会議上，开始宣讀和討論26篇各地的考古發掘專題报告。上午是全体会議。东北博物館李文信宣讀了"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宣讀了"西安半坡遺址第二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接着，与会者对上述兩篇报告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展开了学術性的自由討論。其他24篇报告分别在23日下午至26日上午的分組会上宣讀和討論。分組会有：1. 石器时代組；2. 殷周組；3. 漢唐組；4. 考古通論組。在石器时代組上宣讀和討論的有："南京市北陰陽营新石器时代末期遺址和葬地發掘报告"、"安徽新石器时代遺址調查报告"、"內蒙古自治区近年來發現的細石器文化"，等等。在殷周組上宣讀和討論的有："長沙的战國木槨墓"、"鄭州商代遺址發掘簡报"、"普渡村西周墓發掘报告"、"寿縣蔡侯墓發掘报告"，等等。在漢唐組上宣讀和討論的有："山东文登縣的漢代木槨墓和漆器"、"赤峯遼墓發掘报告"、"南京六朝墓葬清理报告"，等等。考古学通論組是討論考古学通論教学大綱。

2月25日下午和27上午会議進行大会發言。70多歲高齡的徐森玉代表說，他能参加这盛大的考古工作会議，心里感到無比的兴奋。他說，他学考古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的考古界是万分的沉寂。他看到今天的考古事業格外有所感想，像这次会議上的那种学術自由爭論，尤其是年青的一輩那种蓬勃求眞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他說，

只有新中國的青年才具有这种品質。有的代表在發言中指出，为了適应目前社会主义農業合作化运动迅速發展的新形势，建議应該利用如电影放映隊这种宣傳工具，作擴大保护文化古蹟的宣傳。大会發言虽然有兩个半天，但代表們尚覺要說的話还很多。总之，代表們的各項建議对今后的考古工作是極有益处的。

会議在 27 日下午閉幕。中國科学院院長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和考古学、歷史学等方面的專家出席了閉幕式。在閉幕式上，中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分別作了有关考古学術問題和考古工作安排方面的总結报告。夏鼐在总結时指出，六年來的考古工作是有收穫的，如工作大規模的展开、調查發掘工作方面的改進以及思想方法的改進，但也指出目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明顯缺点。他說，在田野工作方面的缺点是：尚有不科学的地方；不注意地層，有些墓葬不够注意遺物共存的关系；技術不高，沒有充分地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在編寫报告和研究方面的缺点是：速度太慢，而且还常常將不同性質的材料混在一起，使利用材料时覺得混淆不清；还有，往往根据一点一滴的材料，更加以無边际的比較和推論；研究工作还沒有很好的展开，理論学習也不够，尤其是学習苏联先進經驗不够。他在講到考古通論教学大綱的时候指出，希望能通过这次討論，逐漸使各綜合大学的教学大綱統一起來。最后，他說这次会議，不僅是中國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議，并且也是中國考古学界第一次展开批評与自我批評，这样做是有利于考古事業的。王冶秋在总結中批評了在文物工作中的保守思想，并且批評了某些考古工作者脫离政治、現实的傾向。他說，某些人对考古工作的現实意义是認識不足的。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物質文化，在鑽不進去的时候，認为考古工作無現实意义；鑽了進去时，頌古非今，又可能認为現实沒有意义。他强調說应該讓大家弄清楚，考古工作是为了今天，为了提高我國人民的文化水平、学術水平，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社会發展規律，以指導今天的行动，是为了丰富当前世界文化。王冶秋繼續指出，在目前工業建設和農業合作化大規模开展的新形势下，我們要坚决反对脫离群众的傾向。坚决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綫，大力進行宣傳，發揮群众所固有的爱护鄉土文物的热情，使成为群众性的文物保护工作。他还說，考古工作的作風必須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作風，以歷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好工作，批評那些虛伪庸俗的自欺欺人的不良作風。对今后文物工作的方針、政策問題，也作了重要指示。培养幹部問題，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見。最后总結这次会議的缺点，总的說來，报告的学術水平一般还不高；典型經驗介紹得少；会議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

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項会議决議。

决議指出，为了做好考古工作，必須發掘潛在力量，大力培养幹部，掌握先進科学方法，提高業务水平，加强文物保护和普查工作。决議还指出，会議号召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要積極学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和業务，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强团結，端正学風，提高工作質量，为接近和赶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努力；要同各基本建設部門緊密合作，在既利于工程進行，又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則下，和工程人員共同把文化遺產保护工作做好。决議又指出，全國考古工作者，經过这次会議，將更加緊密的团結在党的周圍，在科学院和文化部的指導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發揮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做好考古工作。

会議还致函給在各个社会主义建設的战綫上的，特別是在農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战綫上的青年突击隊員們，向他們提出保护歷史文物的要求。

來自各省的青年們代表向会議主席团提出了保証，他們保証：

一、加强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学習，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思想，逐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与理論水平，使自己不愧为一个紅色的考古工作者。

二、正确执行党的文物政策法令、加强文物政策法令的宣傳，使这項工作形成为群众性的工作，从而緊密依靠群众，把文物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三、嚴格执行科学發掘操作方法，学習运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研究發掘材料編寫簡报，及时报導出來，供專家們研究利用。

四、虛心向專家們学習、向群众学習來丰富自己的知識，使業务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五、嚴格遵守劳动紀律、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風，我們一定以战斗的姿态，出現在文物保护工作的战綫上，做到勤跑、勤做、勤学、勤寫，來勝利完成党所交給我們的这項光荣的任务。

通过这次会議对今后考古工作的規划、方針和任务的周密討論，使考古工作者对今后的任务和努力方向，有了明确認識。

会議期間，各代表們还参观了中國猿人產地——周口店及各博物館。考古通訊和文物参考資料編輯部还特意召开了一次座談会，邀請各地代表参加。

代表們一致反映，这次会議开得又緊張又愉快，最好每年一次。

（華　平）

趙州大石桥石欄的發現及修复的初步意見

余哲德

大石桥西面撞拱石彫刻

一、"玉石欄干"的發現

在流傳的"小放牛"中，有一段唱詞：

"趙州桥魯班爺修，
玉石欄干是聖人留；
張果老騎驢桥上走，
柴王爺推車压了一道溝。"

歌詞中所說的"玉石欄干"，在唐代張嘉貞的安济桥（即大石桥）銘里也說："……其欄檻鄣柱，鎚斲龍獸之狀，蟠繞拏踞，哇盱翕欻，若飛若动……"，但是很久以來大石桥的欄干，早非原來面目。1934年梁思成先生关于大石桥一文中提到欄干的問題，就說"……則已改变。現在桥的西面，有石欄板，正中几片刻有'龍獸之狀'，刀法布局，都不見得出奇，当为清代补葺。东面南端尚存有旧欄兩版，或者就是小放牛里的'玉石欄干'，但这旧欄也無非明代重修时遺物而已。"的确，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只是桥西一排彫刻平庸的欄板（参見圖1），东面更只剩一道磚筑水泥塗面的欄干，与这样一座古代名桥相配，極不相称，不免使人怀疑大石桥究竟是否眞的有过"玉石欄干"？

1953年我們开始找到了这个問題的回答。在勘察大石桥准备修复工作中，在桥下首先掘出一塊雕刻"天馬"的欄板，接着又挖出鳳凰欄板和龍头欄板各一塊，另有刻八瓣花形飾物的仰天石数塊（即在桥面边上安裝欄板的石头）。这三塊欄板風格不同，石質也不一样，可以看出是屬于三个时代的作品。其中龍头欄板埋在河底較深，刻法雄健，風格較古；再証之以張嘉貞桥銘的描寫，初步鑒定它，可能为隋代原物。后來因天冻停工了。到1954年接着又挖出斗子卷叶式欄板二塊，斗子竹節式望柱（即間隔兩塊欄板中的石柱）一根，惜又遇洪水停止。1955年大石桥修理工作正式進行，發掘所得就比較丰富。因为不能妨碍工程進行，所以在桥基附近二米內及桥身十二三米以外尚未搜集干淨，准备今年再來补挖。

三年來，总計在河床中挖出大小桥石一千二百余塊，从其中揀出來拼成較完整、有彫刻和銘記的石头，計有：（一）欄板二十余塊，其中較精較古的有各式彫龍欄板七塊，天馬一塊，斗子卷叶九塊，刻鳳凰一塊。（二）石刻獅子二个。（三）仰天石二十七塊（其中二十一塊刻有八瓣花形飾物）。（四）唐修桥記銘刻一塊，明修桥記石碑二塊，有題刻的殘石六塊。（五）印有仙迹的桥面石一塊。另外又在拆除桥面时，在桥身砌石內發現故事欄板三塊，金代小欄板三塊，刻十六瓣花形飾物仰天石二塊。

以上發現，对于大石桥歷史和修繕过程的研究很有帮助。特別对于我們現在要設計修复桥上"若飛若动"的"玉石欄干"，提供了一部份極可宝貴的实物資料，現在把其中經过初步鑒定認为歷史藝術价值較高的欄板、望柱等介紹出來，并提出几种修复欄干的初步意見，目的是为了提供大家討論。小放牛歌詞中說"玉石欄干"是"聖人留"，今天只有"众人是聖人"，因此悬切希望大家多提意見，以便早日作出設計，以恢复歷史的偉大藝術遺迹。

二、"龍獸之狀"的欄板

欄板、望柱、獅子头、仰天石等，本來都是組成欄干的構件，因为發掘出來的时候，是一小塊、一小段或是一小部份的，它們之間已經失去了联系，所以在叙述时分別叙述，在提出設計意見时，才根据研究的意見，把它們連在一起。

我們發掘出來的欄板大都是打破了的，加以拼配的結果，計有整塊龍头欄板一塊，1/2以上的彫刻各种姿态的龍欄板五塊，1/3以上的彫龍欄板一塊，1/3以下的殘缺欄板一小塊，彫馬欄板一塊，彫鳳及

斗子卷叶（有題字）欄板一塊，彫刻斗子卷叶的整欄板二塊，2/3 以上的二塊，1/2以上的二塊，其他殘破小塊九塊。这些欄板所用石質不一样，但都是石灰石，色帶青潤或灰白，与我們原來所想大概是汗白玉石的"玉石欄干"不一样。茲分叙如次：

（一）第二、三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一，是最完整的一塊，正、背二面均彫作龍头，形似饕餮，兩旁并彫刻波濤花叶，断面無收分。与望柱接榫处的輪廓綫垂直，欄板正面上下約有1厘米的傾側度。在尋丈的兩端，距离望柱16厘米处，向下圓收2厘米。

（二）第四、五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二，正面彫兩条龍相交，龍头相背，后脚着地，好像奋力向前奔走之狀。尾細長，从后脚間繞出。右边一龍口中吐出卷花，有如波浪的形狀。背面刻兩龍相絞，相背而馳，成一"絞索"形狀，兩龍的臀部蹲在地上，兩腿相撐于地，与唐張嘉貞大石桥銘中所描寫"蟠繞拏踞"恰相吻合。

（三）第六、七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三，正面刻兩龍鑽穿欄板，構思巧妙，乍看去好像已經鑽过去了（見封面）。龍头相背，前脚互相推拏，后尾緊貼板上，好像在奋力鑽穿的形狀。兩龍全身都刻鱗甲，背面刻兩龍相絞，形狀与第二号圖片所示相同，但龍身少絞了一圈。最妙的是兩条尾巴与兩只腿相交，組成了像獸面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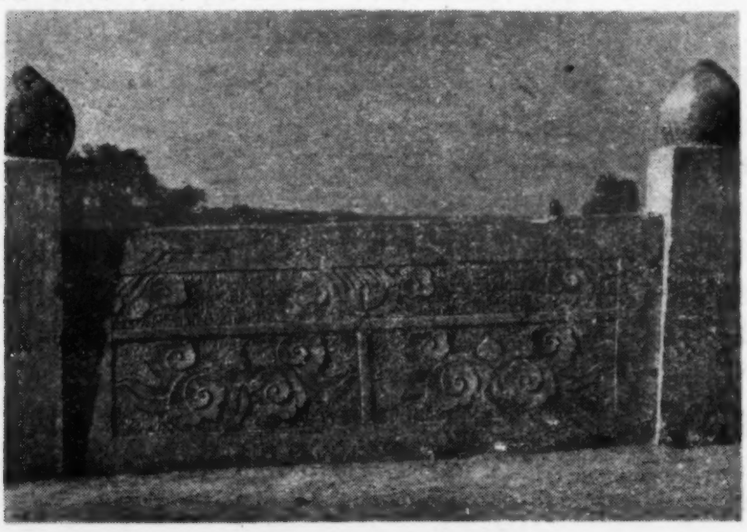
（四）第八、九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四，正面刻兩龍相向，右边一龍前脚托着一个宝珠，左边一龍前脚持着一朵大花，宝珠和花叶的風格与响堂山石窟中所彫刻的宝珠、花叶非常相似。插圖二、三）背面亦是刻兩龍相向，前后腿及身子都鑽入了欄板內，正背二面兩龍相向，互相注視的神情，与張嘉貞大石桥銘中所描寫的"趕盱翕欻"恰相符合。此欄板已断为七塊，尚缺一小塊。

（五）第十一、十二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五，只存了三分之一，正面刻一龍从欄板內鑽出，头轉向中心，虽然只賸下一条龍，但可以看出，整塊欄板是兩龍头相向的，与第二号欄板的龍头相背不同。背面亦是兩龍相絞，姿态与第一、第二兩号欄板相同。欄板正面的龍身刻有鱗甲，背面未刻鱗甲，与望柱接榫处約有5厘米的傾側度。

（六）第十三、十四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六，正面刻一条向前奔跑的龍，头部忽然向后弯曲，好像正在向前奔跑时，忽然遇到有什么东西似的，头往后曲，前爪張持着，身上滿刻鱗甲，水波，前胸着地，后尾騰空，姿态雄勁，尚保存有漢代四神之中"青龍"的意味。背面刻兩龍相交，轉头相向，怒目凝視，是張嘉貞大石桥銘所描寫'趕盱翕欻'的又一实物。与望柱接榫处有5厘米的傾側度。

（七）第十五——十八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七，正面刻兩龍相向凝視，前胸着地，后尾騰空，各伸前腿捧一龍头，另一腿互相抓握，其下有一个宝珠。背面亦刻兩龍相向，姿态与正面相似，各用一前腿捧一宝珠，互相凝視，有似后來"二龍戲珠"的意味。与望柱接榫处約有6厘米的傾側度。

（八）第十九号圖片所示挖出的欄板之八，为一正中刻斗子卷叶的欄板，共發現兩塊，正背兩面



插圖一　桥上近代石欄板

插圖二　北响堂山第3号窟

均同样彫刻。即在尋杖之下刻一大斗，大斗之下刻人字形栱，但把人字形加以变化，使成为三瓣卷叶，卷叶之下，刻出枋子一根，即宋营造法式勾欄所称的"盆唇"，盆唇以上打磨光潔，盆唇以下則打斜格鉆文，与大券石及此桥其他桥石鉆文相同。与望柱相接处約3厘米的傾側度。

（九）第二十号圖片所示欄板之九与第十九号圖片所示同一类型，尋杖之下正中刻斗，斗下刻人字卷叶，卷叶下刻"盆唇"，盆唇以下滿打斜格鉆文。但斗子卷叶板的高度較前者低6厘米，鉆文板的厚度亦較前者厚3厘米，人字形卷叶四瓣，較前者多一瓣，卷叶形式細長，最下一瓣往回反卷，由斗中心至兩端的距离，为92厘米，若加倍計算則为1.84米，較第十九号圖片斗子卷叶欄板相差了29厘米。与望柱相接处約有3厘米的傾側度。此类斗子卷叶欄板無完整的，存一半以上的有兩塊，半塊的有兩塊，殘破小塊有八塊。

（十）第二十一、二十二号圖片所示欄板之十，正面刻一走馬，神情溫馴，彫刻綫条柔和圓潤，已与前面所述的彫龍欄板，在表情和彫刻手法上，有很大的差别，顯然是兩个时代的作品。唯馬头已缺，在馬头的断面上，有小石榫兩个，看去是拼接的榫头，不是与望柱相接的。背面一飛馬，飛騰半空，兩前腿向前急扑，后腿拉成水平，尾巴平直，馬腹下托着浮云三朵，表現出飛騰凌空的姿态，浮云云头还帶唐代的風格。与望柱接榫处約有6厘米的傾側度。

（十一）第二十三、二十四号圖片所示欄板之十，正面正中刻一斗子卷叶栱，在人字卷叶下刻"盆唇"盆唇下面刻一飛的鳳凰，鳳凰后面刻山石，好像是鳳凰由山間飛起。鳳凰彫刻的綫条柔和圓潤，与馬的風格相似。山石的形式还保存着"如斧劈，如冰裂"的手法。背面正中刻斗子卷叶，卷叶下刻盆唇，盆唇下部無其他彫刻。在斗子卷叶的左面刻有一行文字，字迹清晰，題为："在州南城廂，故通引高貴妻王氏，施此勾欄一簡，合家同增福寿"。通引为官名，只見于五代史，五代以后未見此官名。字的筆法亦为唐末的風格（据1953年馬衡先生考証）。此欄板亦缺去一部分，現在所存的全長1.52米，但若以斗子为中心，則原物应長1.14米。

（十二）第二十五号圖片所示欄板之十二，正面刻一柳樹，樹下站一人。此种欄板与以前的各种欄板尺寸，大小不相同，形式也兩样，只有50厘米多高，背面也無彫刻，平置地上，有似一凹字形，亦沒有欄板与望柱相接的痕迹，可能是無望柱的低欄。此种欄板共發現有三塊，其中一塊有"本州西关刘阜等众開店雜那，另施拘欄二間，大定二年四月，黃山石匠楊志造"等字样。查大定年号有三：一是南北朝后梁宣帝年号；二是南北朝北周靜定年号；三是金世宗年号；前二种年号在大石桥修建之前，則必是金代年号（公元1164年）無疑。

此外在桥面下还發現了一些与現在桥上的欄板相同的最近添补的欄板，極为粗糙、簡陋，歷史、藝術及設計參考价值不大，故在此不加介紹。

从發掘出的欄板中可分作四类：第一类为龍头及各种形式的奔龍、交龍、絞龍等（自圖片第1号至第十八号）。此类欄板，石質青白，龍的形态非常生动有勁，与六朝时期玉器彫龍形象極为相似，与漢

插圖三　北响堂山第7号窟壁上雕飾

插圖四　天龍山石窟第九窟中的斗子卷叶彫飾（隋）

代壁画所画青龍和漢画象石上所刻的青龍的風格相去不远。兩龍所捧火珠与隋代佛像装飾和响堂山石窟中所彫刻的火珠風格相似。最足以說明唐代張嘉貞大石桥銘中所描寫的"其欄檻擎柱，鏟斲龍獸之狀，蟠繞拏踞，眭盱翕欻，若飛若动"的神情。因此这七塊彫龍欄板应是隋代原物。

第二类欄板（圖片十九、二十）石質与第一类彫龍欄板極相似，兩面均彫刻成斗子卷叶栱，即在欄板正中彫一个斗，斗下刻人字形栱，但把人字形彫刻成为卷叶形式。人字形栱在木結構上本來是有支持上面的力量作用的，但在此石欄上已成了純装飾，所以把它美化一下，也是合乎情理的。人字栱自唐朝以后已不得見，如此形式刻在石上的还有天龍山第九窟下小洞門的上枋正中，亦是正中一个斗，斗下人字栱，栱端亦反卷，此窟为隋代窟（插圖四）。因此这种斗子卷叶欄板亦应是隋代原物。

另外圖片第十一的斗子卷叶栱与第一类斗子卷叶欄板形式基本相同，只人字栱卷叶細長，卷叶四瓣，石料亦青白。按此人字形栱的形式宋代已不發現，因此縱是仿配，亦不能晚过北宋以后，故疑为唐五代之物。

第三类为彫刻馬和鳳凰的欄板，以及斗子細長卷叶的欄板，計有刻馬欄板一塊，刻鳳凰、山石、上刻斗子卷叶的欄板一塊（圖片第二十一、二十二），按飛馬腹下的云头和天馬的火燄紋的手法看，已較隋唐时代風格稍遜，石質灰白，与前述彫龍欄板兩样，但雕刻手法亦甚流暢有力。从一塊彫刻鳳凰欄板背面銘記中"通引"官名，及字的筆法，均可推为五代之物。而此塊欄板与飛馬欄板的石質相同，高低、厚薄尺寸一致，因此，此二塊欄板应同是五代或宋初之物。

第四类欄板的形式与年代已見前述，并且有年代題字，为金代遺物，沒有問題。至于这种欄板为什么在尺寸与形式上有如此大的差别，第一个推測即是在金代的时候，此桥欄干可能已全部無存，不然决不会作成相差一倍高的欄板的。金代在趙縣西門外又仿照此桥修了一个小石桥，可能对此桥亦有过較大的修理。这种小欄板都是从桥面拆出，沒有从河床中挖出者，因此另外一种推測，这是配在桥的兩端桥台引道上的欄板，故高度改得很小。

綜上所說，發掘出來和現存的欄板，一共可分作五种类型和五个时代，一是圖片一至九号的彫龍欄板及斗子卷叶欄板可能屬于隋代原物或唐代补配。二是圖片十、十一的彫馬、鳳凰及斗子卷叶的欄板为五代或宋补配遺物。三是圖片十二的金代欄板。四是明清欄板。五是民國后所砌青磚水泥欄牆。

三"望柱"和石獅子

此次共挖出望柱殘件33段，其中有整的，有大半段的，有小半段的，有望柱头。可把它們分作四类，其中有一类，年代較早，彫刻制作精美，歷史及藝術价值較高。有一类很粗陋，年代亦晚，歷史藝術价值低。

（一）圖片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所示望柱之一，正面刻出复盆，复盆正中有榫眼，可能是安獅子的。在复盆下，刻一大斗，斗的右側刻出三道向右伸延的曲綫，大斗之下刻一蟠繞的坐龍，龍身刻鱗甲，彫工極为精細，手法与一至七号彫龍欄版一致，在龍的头部下面横列着一条枋子似的东西，大斗下面所刻的曲綫，可能是延伸与欄板相接的。背面与正面相同，但龍身未刻鱗甲。在望柱的側面鑿出凹入的卯，以嵌入欄板的榫头，在卯的周圍隱刻出与欄板接触的輪廓綫，此条輪廓綫上下垂直，厚11厘米，与第一号彫龍欄板的側面恰相吻合。坐龍的下面有地伏一層，与欄板地伏相接。柱下有圓榫，徑22厘米，恰好可安入仰天石圓卯內。与正定隆兴寺佛香閣大佛須弥座上的間柱形式相似，但在姿态的彫刻手法上較此一龍柱則相差很远。按正定隆兴寺大佛須弥座为宋代遺物，与此柱比較相去已晚，在彫刻風格上自然是有不少变化的。下寬32厘米，每側有1厘米收分，与第一号龍头欄板的傾側適相吻合。

（二）圖片二十九所示望柱之二，柱頂为一半圓复盆，上有断去痕迹，其上可能即是宝珠头，复盆之下刻一大斗，斗的右边亦有曲綫紋，斗底兩旁各刻斜曲綫，分向左右，与横枋相交，成为喇叭狀，如宋营造法式勾欄中所說的"撮項"横枋，亦与欄板盆唇相接，横枋之下刻短促的竹節紋兩節，其下即是与地伏相接的横枋。柱脚亦有榫头一个高12厘米，徑16厘米。背面亦与正面相同。但無与欄板盆唇相接的横枋，竹節增为三節，其高等于正面兩竹節加横枋之高。柱的兩側刻榫卯槽，为嵌欄板榫头之分位，卯槽周圍刻出与欄板側面相接的輪廓綫，上端寬10厘米，下端寬16厘米，上小下大，与一般

彫龍欄板的側面相符合，(柱头正面上頂寬25厘米，下端寬3.05厘米) 上小下大，每面有2.75厘米的斜收。

(三) 第三十、三十一号圖片所示望柱之三，为一折断了的望柱，但'断綫'还能拼凑，尙是一根比較完整的望柱。此望柱上端为一宝珠头，宝珠下有圈一層，圈下为半圓形复盆，复盆下刻出大斗，斗下斜殺如喇叭狀，喇叭口以下至地伏皆打为平面，正背兩面皆相同，柱的兩側鑿出卯槽，与欄板相銜接。(正面上端寬26厘米，下端寬20厘米，每边有1厘米收分。)此一望柱，甚是簡潔，打磨亦甚細致。

其余一类，打制粗糙，形式比例都不規則，無可取者，故不介紹。

以上三种望柱的年代，大約可分作兩个时期：一是彫龍望柱，其彫刻手法与彫龍欄板相同，尤其是側面接榫的輪廓，恰好是与第一号龍头欄板相吻合的，应該是与彫龍欄板屬同时代物。二为竹節望柱，其側面接榫处亦能与彫龍欄板的側面接榫符合，且其大斗及竹節的彫作均甚工整精細，張嘉貞大石桥銘中的"欄檻蠆柱"，蠆柱当即指此。三是斗子蜀柱形式的望柱，斗子蜀柱的欄干屢見于唐、五代、遼、宋欄干中，但皆非整个望柱，依此望柱的形式与制作手法看应是五代宋初遺物。

獅子本來是望柱头上的裝飾，虽然沒有很早的实物，但在宋營造法式石欄干的望柱头上，即有獅子柱头。宋"營造法式"一書中所規定的各种制度、尺度、作法大多是当时或从前流傳下來的作法。因此，在宋以前即已流行着在欄干望柱上彫石獅子的作法了。又根据"趙州志""朝野僉載"所記"趙州石桥其工磨礱密致如削，望之如初月出云，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并为石獅子，龍朔中高麗諜者盜二石獅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按龍朔为唐高宗年号，距隋代建桥相距不过五六十年，所說与原建时不致有多大出入的，又以現在發掘出的隋代彫龍望柱之上有安柱头的榫眼來看，趙州桥当时欄干上裝有獅子柱头的可能是極大的。

此次我們从桥下挖出了兩个獅子，一个是缺了前腿，自臂部以下已殘缺（見圖片三十二），此獅子，石質青色，与彫龍欄板石質相似，前胸挺出，背部斜直，平刻出髮卷，嘴角刻一彎月形，彫刻手法亦与彫龍欄板望柱等相近。另一石獅子圖片三十三、三十四，石質青紫光潤，座子有仰蓮座一層，獅子的嘴已缺一部，髮卷凸起，脚下踏一圓球，球上刻古錢文，彫刻手法較前一獅子較拙，但其座子蓮瓣尙是早期風格。前一个石獅，可能是唐、宋遺物，后一个石獅可能是金、元遺物。

四、仰天石上的几个問題

仰天石，即是安置欄板望柱的脚石，在挖出的27塊中，其中21塊上皮面及前側面有八瓣蓮花形彫飾（圖片三十六——三十八），6塊沒有彫飾。每塊仰天石的上面，刻出承裝欄板的仰槽，并有承裝望柱的方榫坑(有7塊)，方框之中有圓孔，以安望柱的圓榫，在仰槽的內側(即欄干以內)是人行桥面，所以大多被踩踏光滑了。在仰槽之外(即欄干外)，又有夾槽一道，夾槽之外上皮面和側面隔不多远，有刻八瓣蓮花的圓形彫飾，此种圓飾，应是从木結構上的帽釘及帽釘之下的墊板模仿而來，并加以裝飾美化的。把帽釘和蓮瓣形的墊板結合起來，好似一朵落地蓮花，此种花形，在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中的地板上有类似的裝飾(見插圖五)。在仰天石外端下部缺進一部份，缺進深度自31厘米到37厘米。

插圖五 天龍山石窟第三窟(唐)

仰天石的寬度自47厘米至91厘米，長度自109厘米至167.5厘米，石質青白，彫刻打磨亦極精細古朴，与彫龍板应同为原物。

这一批仰天石与桥上現存（只西面有，东面拆去）仰天石相較，是截然不同的，給我們修复設計提供了重要資料。但是未能全部發現，因此有許多問題現在就难予确定，茲提出于后，希望大家研究：

（一）花形飾物上面与側面是位置相对的，但兩个飾物之間的尺寸，無法决定。現在27塊中間有6塊無此飾物，而每塊寬度不一，有飾物之石，所刻的地位亦不固定。此飾物与望柱榫眼的距离亦是不一定，有的远，有的近，因此与欄板的排列間隔，有什么关系，一时無法确定。

（二）在欄板仰槽之外，尚有一道夾槽，槽內面沒有加工鉆文，極粗糙，决非外露面，因此可能是按裝护欄的石条之用，但河下沒有發現类此石条，并且欄板地伏表面鉆成交互斜文，应为露明，不宜被他物掩盖，如何处理确当是一問題。

（三）仰天石外端，下面缺進，且有較細鉆文，似乎是挑出桥身部分，形成"飛边"。但其"下顎"面上鉆文却相当粗糙。且每塊仰天石的"下顎"厚度不一，一塊特厚至28.8厘米，还有二塊是沒有下顎，下面是全平的，其他石的下顎厚度在0.7—9厘米之間，高低不一，当初是如何按裝在桥面的，頗成問題，因此也有意見說仰天石并不挑出桥身，但缺進部份的下面有較整齐的鉆文，也不好解釋。

以上問題还不能得到較全面較妥善的結論，所以我們希望能吸取更多的意見，以便求得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五、恢复石欄的几种方案

目前大石桥修理工作，桥身工程部份已經進行了大半，桥面和四个小券已經折除，东面兩道有危險的大券，也已折除准备重砌，全部桥身工程在今年准备完成。

石欄干也是組成大石桥不可分离的一部份，它不但可以襯托出大石桥的美观，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行人的安全，因此修复大石桥石欄干的問題，也随着桥身工程的進行提到工作日程上來了。

从上面所挖出來的欄板、望柱、獅子、仰天石等的实物資料中，面对着这些具有重大歷史藝術价值的实物，一方面使我們为獲得这些宝貴資料而欢欣，而同时也向我們提出了更为重大的任务——如何能更好的恢复这座偉大古桥的欄干。

我們对这些資料虽然研究得很不周密，桥底也許可能还有少数石欄的殘件可以挖出，但是我們想尽早把这些宝貴的資料發表出來，供大家研究，商討，必然能有关于恢复这座古桥石欄的宝貴意見提出，对我們的工作，定会有重大裨益的。

下面几个方案是我們征求了部份專家的意見和参預工作人員研究后初步提出的：

方案之一（見附圖）：

这个方案的中心設計思想將現在所挖出的歷史藝術价值較高的欄板、望柱全部用上，使其能表現这桥在歷次修理中的"痕迹"，其中如天馬欄板，虽然年代已顯著的較彫龍欄板为晚，但为了保存桥的修理歷史中的階段，而这塊欄板也具有相当的藝術价值，因此也用上了。排列的方法是把时代較早、彫刻較精的彫龍欄板放在中部，其中龍头一塊在断面寸尺和彫刻題材上顯然的是正中一塊無疑，其余的排列虽然有側面傾側度的不同，但是原來桥面綫已不可考，已难于找出絕对根据，因此只作了適当的排列。又由于挖出的欄板数目較少，故每塊作了重复一式四塊，东西、南北兩相对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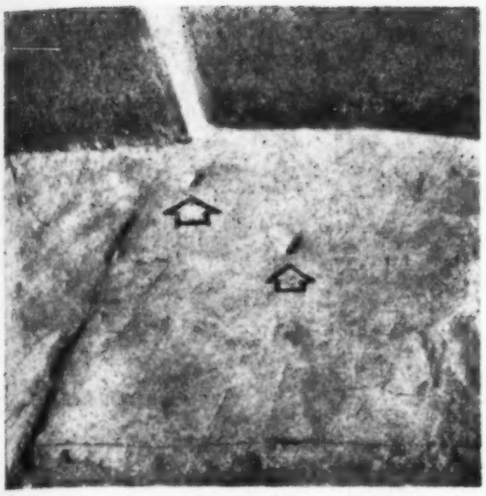
望柱則基本上用竹節宝珠头望柱，而在中間龍头欄板兩側及桥兩端用獅子柱头龍望柱，正中獅子用無座的，兩端獅子用有蓮座的。这个方案經过研究又有一些修正，因区别尚不大，故未附圖，茲說明如下：即將兩端的天馬欄板移在龍欄板及斗子卷叶欄板之間，似乎看起來要比現在的調和一些，另外有鳳凰之斗子卷叶欄板（圖片二十三）替換現在接着龍欄板的斗子卷叶欄板，这样处理是更加丰富了欄板的圖案。此外欄干兩端的抱鼓石取消不用，即用龍望柱收住，因抱鼓石这一形式出現在桥的欄干組成上时間可能是較晚的，并且也不一定美观。

方案之二（見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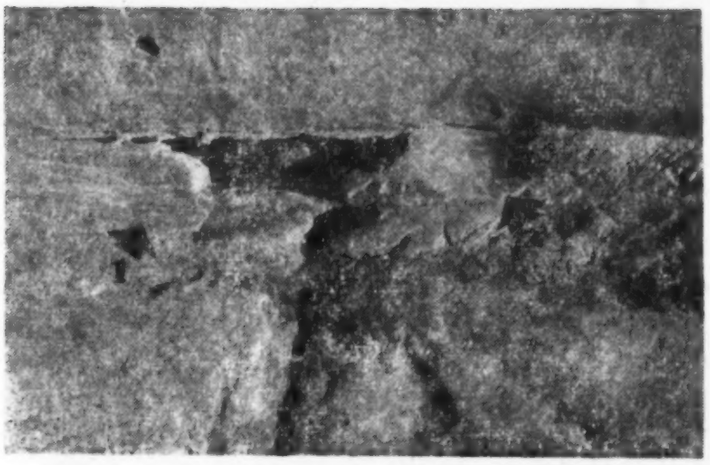
这一方案是全部采用彫龍欄板和龍柱为恢复的依据，这样做，風格比較統一。但是由于發掘出來的实物較少，不免要有更多的重复。是一缺憾。

方案之三（見附圖）：

这一方案是采用彫龍欄板与斗子卷叶欄板相間隔使用，在圖案組合上，可使彫刻繁密的彫龍欄板分布疏朗，并且可使望柱上的單面下弯曲綫与卷叶根結合，望柱中段刻出的横枋与一面斗子卷叶欄板



插圖六　大石桥"仙跡"之一：張果老驢蹄印



插圖七　大石桥"仙跡"之二：柴王爺的車蓆印(1)和膝盖印(2)

的"盆唇"相吻合。其余望柱的排列与总長度均与方案之一同。

其他还有一些意見，但基本上与前三方案出入不大，就不一一提出了。

方案之四（見附圖）：

这一方案我們称之为过渡的臨时处理方法，即是全部欄板望柱均不加彫刻，將來再行深入研究，或許还可多找出一些根据，再行彫制。但是有似这座古桥穿上了未加剪裁的衣服，好像修理工作沒有完成，不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上面这些意見都不成熟，因此希望大家多提意見。（請寄交"文参"編委会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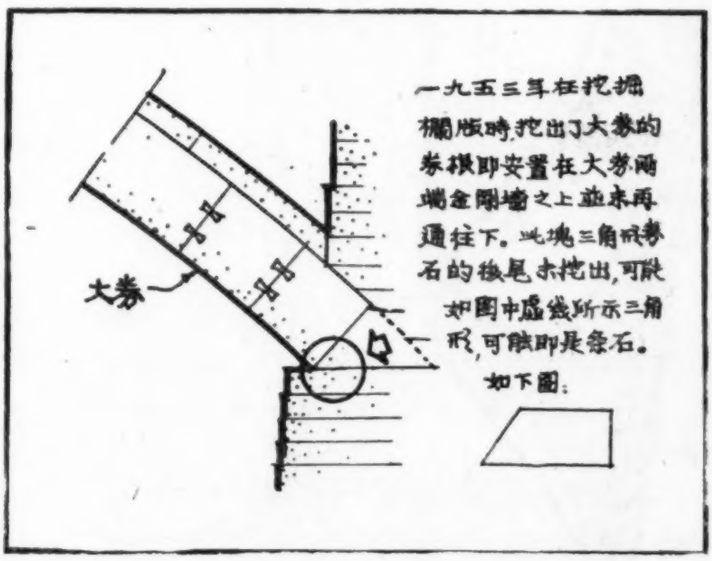
六、歷史与傳說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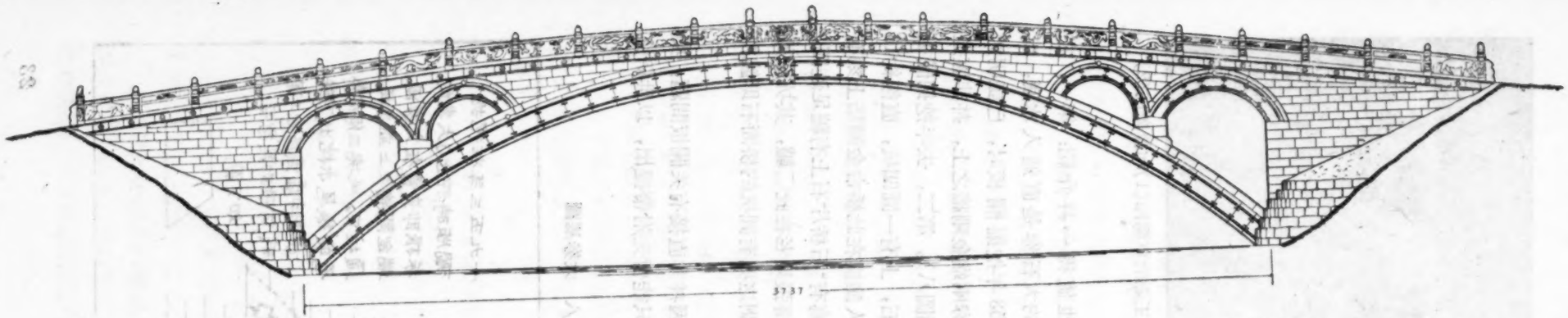
此次除發掘出以上介紹的欄板、望柱、仰天石等桥上有彫刻的建筑材料之外，还挖出八角石柱头一，上刻唐貞元九年(公元 793 年)新修石桥記（見圖三十五），及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 1563 年)重修大石桥碑一塊，明嘉靖甲子重修大石仙桥記碑一塊（公元 1564 年）。此外有題刻殘塊三十余塊，初步判断自隋唐至元明均有；其中有詠桥詩句，修桥記，修桥主題名等。而有一塊修桥主題名殘石中有"修桥主驍騎尉苏祖卿"。按驍騎尉此一职名，始創于漢，廢除于唐，因此这一殘碑很可能是建桥时所立。这一批材料是可以补充前所未知一些歷史資料的，正請有关專家們整理研究。

此外还有二件事也值得一并介紹：第一，在过去民間傳說大石桥的大石券是直通入水底，成一个整圓洞。但在 1953 年挖掘欄板时，已証明大券的券根即安置在大券兩端金剛牆之上，并非直通河底(見圖三十九及插圖八)。第二，去年挖掘欄板时桥下出現一塊桥面石，上有一圓凹坑，直徑約13厘米，很光滑。依明人鮑捷在此桥台金剛牆上刻有"驢迹辨"一文，开头寫有"石桥片石上有驢足迹四，前有石坑凹一处，世傳張果老在此□驢，其坑凹处蓋其笠迹也……。"推測这塊有圓坑的桥面石即鮑捷当时所辨仙迹之一。

上述一些材料，因并非直接有关欄板問題，要詳細考証尚需时日，只能暫先附帶提出，以供研究者的參考。

插圖八　大券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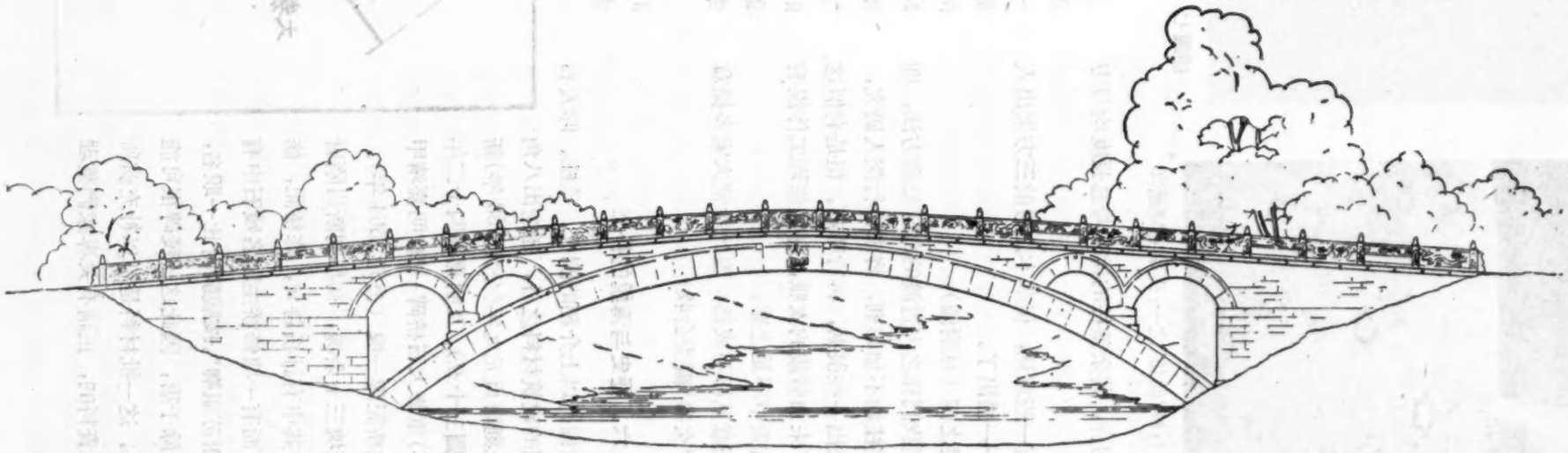


趙縣安濟橋復原方案圖(東面)

比例尺

百分之一　單位:公分

一之案方



趙縣安濟橋欄板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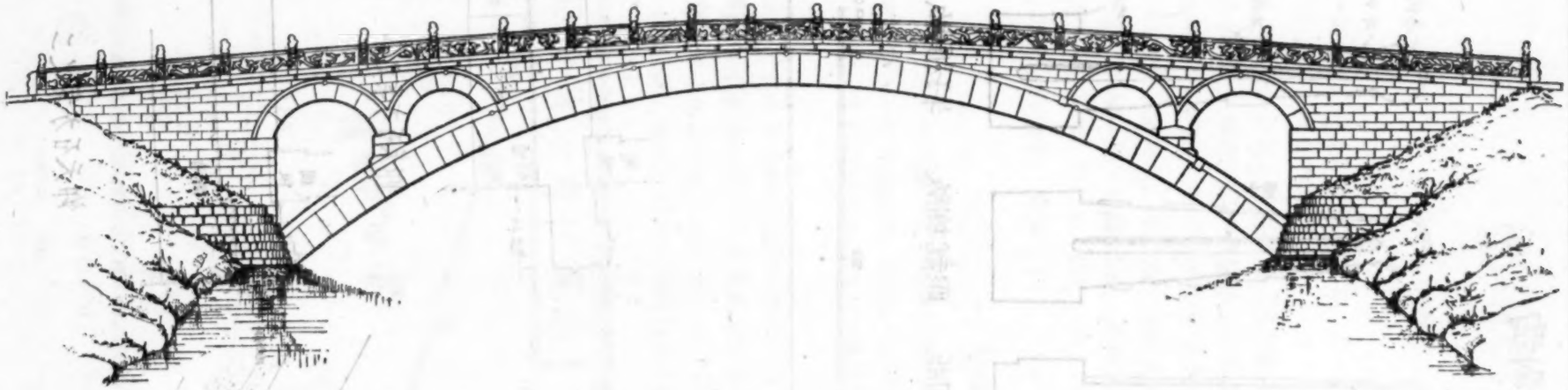
比尺　1:100

二之案方

赵州安济桥栏板配置图

比 尺 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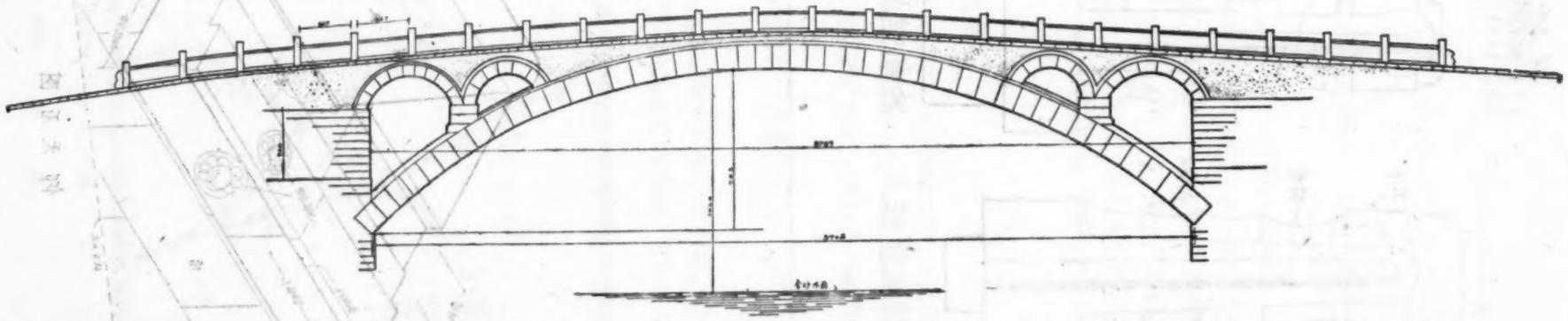
方 案 之 二



赵州安济桥栏板配置图

比尺 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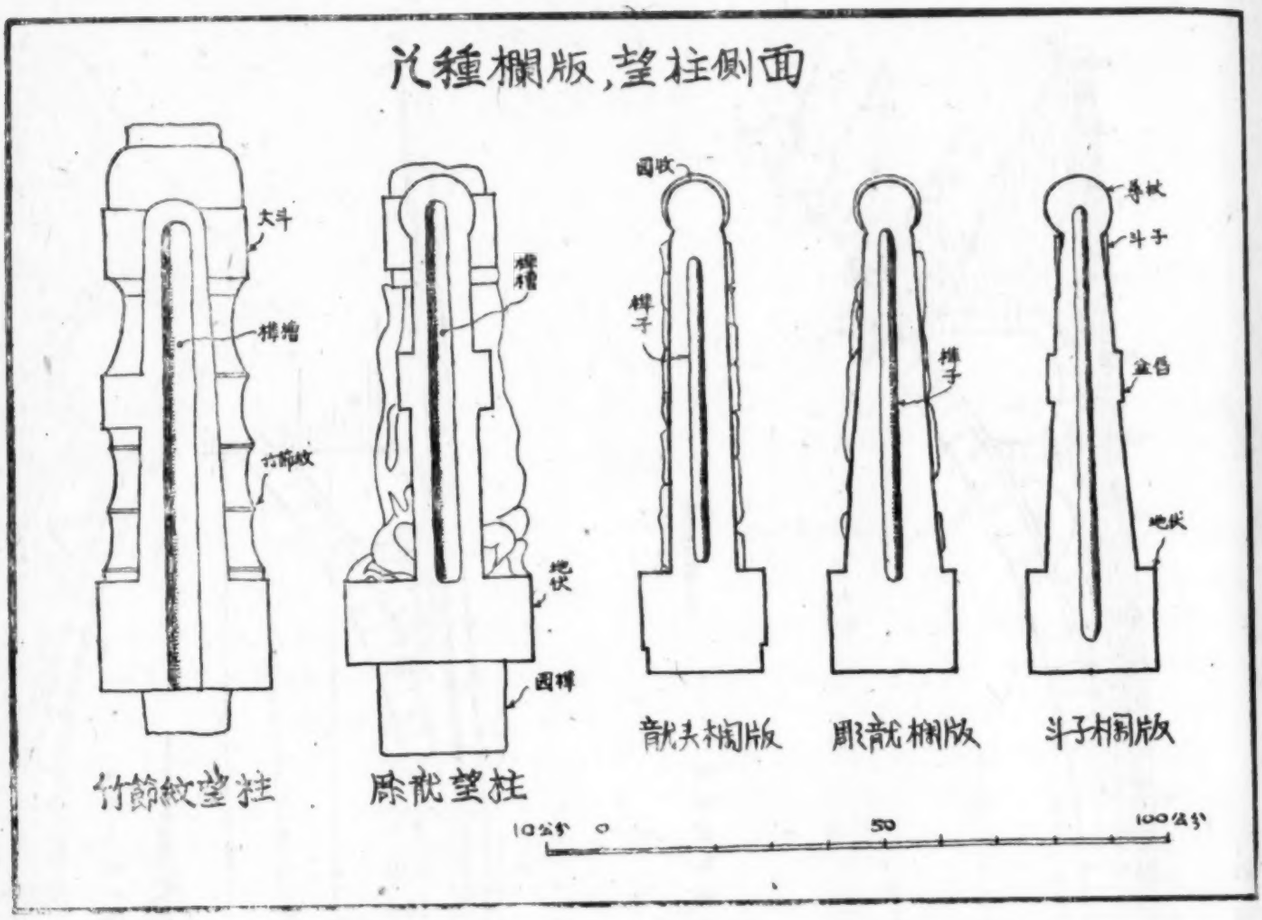
方 案 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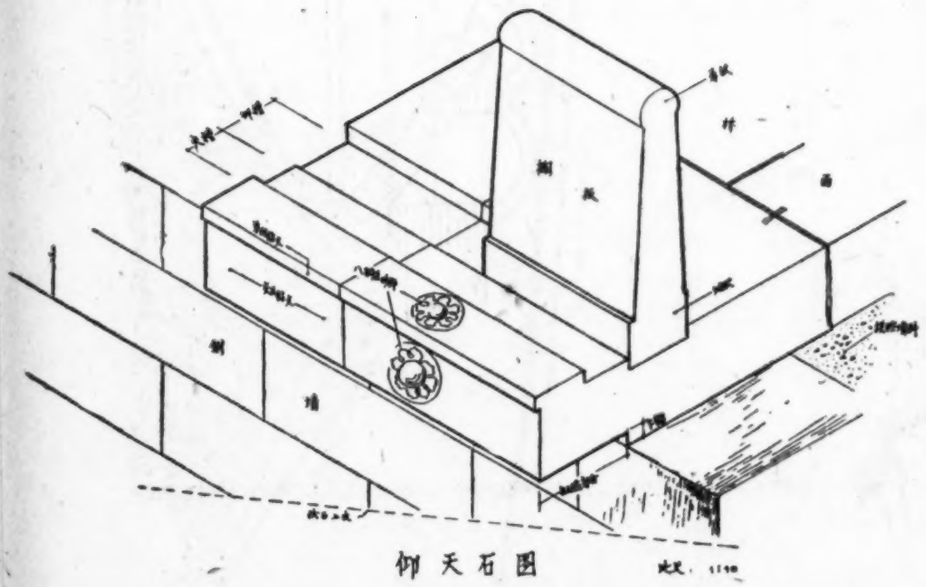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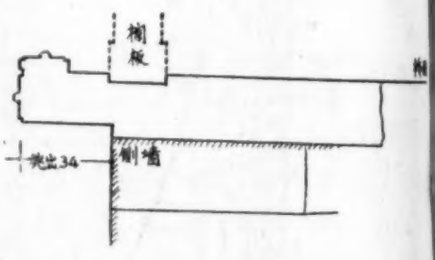
安济桥栏板配置图——(纵断)

比尺 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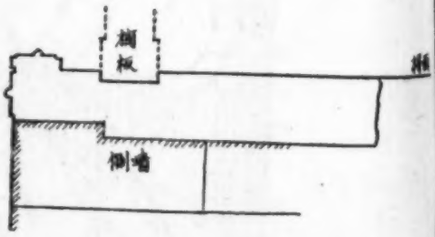
方 案 之 四







仰天石方案之一



仰天石方案之二

鄭州碧沙崗發掘簡报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一隊

碧沙崗在鄭州西十里鋪村的西南，是一个东西長約500米、南北寬約400米、高約5米的土崗。鄭縣志上称"黃土崗"，又称"猴崗"。

1954年冬，我隊派人前往勘探，發現崗上有古代的文化遺存。为了進一步了解，同年12月13日又派發掘人員在崗上开探溝三条。試掘結果，發現墓葬兩座：一座出随葬穿孔貝三个，另一座出紅陶矮足鬲和灰陶罐各一件；灰坑五个，都出有蚌制的刀、鋸，和紅陶矮足鬲、灰陶豆的殘片等。这样的發現在鄭州还是第一次，因此我隊非常重視，即組織工作組于1955年2月1日至4月8日及5月25日至6月8日兩次進行勘探和發掘，結果，共开探溝54条，清理灰坑45个，墓葬149座，其余尚有已探出未清理的墓25座。在已清理的149座墓中，除180、139、152、195等号为唐、宋墓以外，其余145座墓葬与遺址同屬春秋战國时代。現經初步整理，簡报于下：

一、地形和遺址、墓葬的分布情况

碧沙崗的崗已不完整，它被兩条道路交叉穿过（圖1），南部由东到西被行駛汽車的公路通过，中部从北向南貫穿着一条大車路溝，这样，崗就被分成四塊。我們發掘的地点就在公路以北的兩塊崗地上面。为了便于說明，我們將發掘地点在大車路溝以东的地方叫"东崗"，以西叫"西崗"，这里是全崗的最高处（插圖1）。

遺址的分布主要是在东崗的北部靠近西十里鋪村，和西崗南部靠近大路溝的地方。这兩处灰坑分布都很密，特别是在西崗，有八个灰坑互相打破在一起。

墓葬的分布也很密集（最密处在10×10平方米內有墓13座），在西崗分成南、北兩群，东崗南部也形成一群（插圖2）。而在东崗北部却只發現1座，这座墓（編号102）緊靠遺址的北緣，且被一个灰坑（編

插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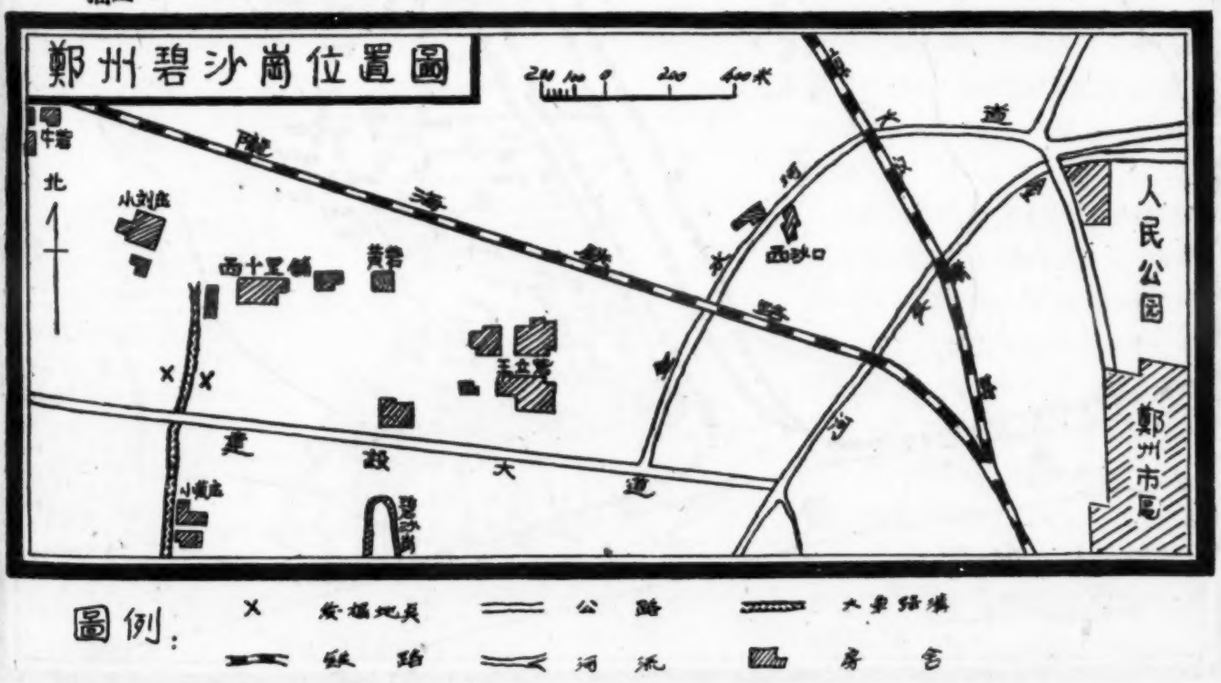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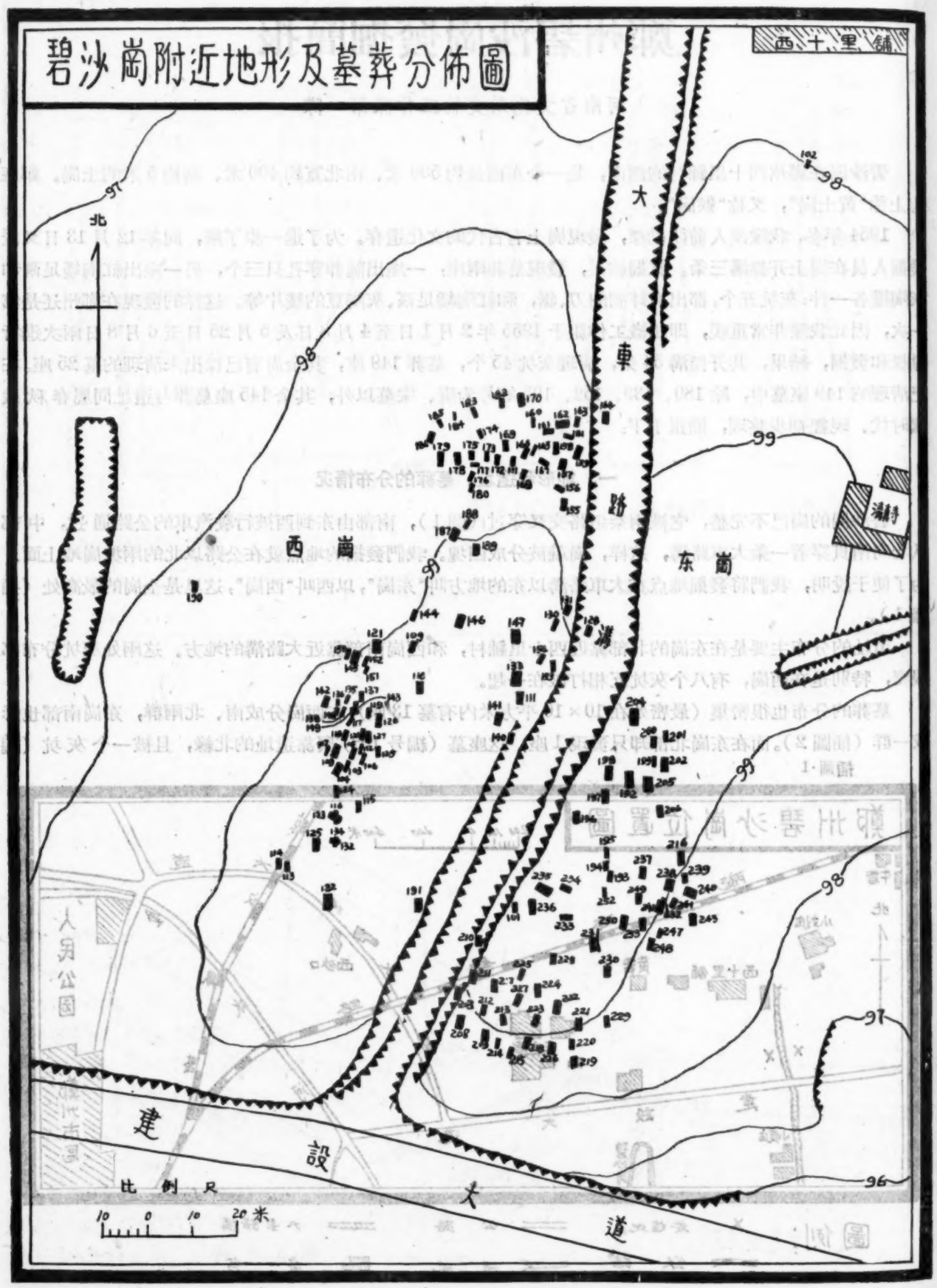


插圖 2



号102）打破一角（圖54）。这与其它墓葬都是打破遺址和灰坑的情形正相反。

二、遺址和包含物

（一）遺址的灰層多在耕土下面就發現。灰層堆積厚約0.1—0.3米，含物不多，分布也不普遍。土色多呈黃褐色，近似生土，与二里崗商代遺址的灰層呈深黑色大不相同。

（二）灰坑多在灰層下面發現。灰坑的形狀基本上是圓形的或近于圓形的，口徑多在1—2米長，深度多在1米以下；長方形的灰坑只有3个，深度都在3米以上。灰坑內的灰土顏色虽有深淺不同，但是所出遺物均相同。

（三）灰坑打破灰坑的情形很多。如西崗南部在5×6平方米內有107、108、109、110、116、117、118和119等八个圓形灰坑互相打破（插圖4）。这些灰坑所出遺物虽有多有少，但形式上是相同的。

（四）遺物。綜合灰層和灰坑出土的遺物如下表：

类別	石器	蚌器	骨器	銅器	陶器	其它	备注
名称	石刀（鐮）、石斧（鐮）、石鏃	蚌刀（鐮）、蚌鋸	骨笄、骨針、骨錐	銅鏃	陶片、陶紡輪、陶拍、陶墜子、陶豆、陶盂、陶盤、陶圓片	獸骨、獸牙、蚌殼、螺殼、鹿角、燒土塊	1. 陶片多半是鬲的殘片，其余是盆、盂、簋、豆、甕、罐、甑、甗、壺、缽等殘片。 2. 獸骨、獸牙包括豬、羊、狗、牛、馬等，其中以豬骨为最多。 3. 參看圖2—7。 4. 參看插圖3。
数量	二三件、四二件、三五塊	一一七六件、件	五件、一一件、三件	三件	五、〇八七片、九件、一四件、四一件、一一件、一五件	七六塊、四一塊、六三个、五三个、三六塊、二九塊	

插圖 3　遺址出土的陶片紋飾

三、墓葬及随葬品

（一）墓的形制：墓的發現多在耕土下面，不少墓口已被耕土擾乱。墓的形狀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最大的墓穴長3.9米，深5.3米；最小的只有1.2米長，0.38米深。一般的墓穴長2—3米，深1.5—3米。墓穴的大小，可能与崗的土質軟硬有关。如西崗的土質堅硬，多料礓（土中一种石灰質結核），东崗南部土質松軟，多沙，因此墓穴西崗多較小，东崗就多比較大。

在145座墓中有10座發現"腰坑"（人骨架腰部下面的小坑），坑內都有一只小狗殉葬。腰坑的形狀不規則，大小只够埋下一只小狗的样子（插圖5）。有一只狗骨架被压在人骨架的下面，好像把狗放在棺下似的。

墓的方向：南北向的占90%，东西向的占10%。

（二）葬具和葬式：各墓墓底大都發現棺或槨腐朽后的"板灰"，从板灰的大小、形狀，可以看出：有棺有

槨的墓很少，有棺無槨的墓最多；还有少数沒有棺槨的。棺槨的構造，因無完整的实物發現，不能全知，但从發現的一些遺迹上还可以看出一些。如在編号109、110和123三座墓的棺灰下面，普遍地發現紅色硃砂，可能是塗在棺上用的；在133号墓底人骨架下面發現清晰的木痕，像一排樹幹似的平鋪着，可能是槨底；在120和144兩号墓底棺痕的四角都發現突出長約30厘米，寬約8厘米的"把子"，可能是"棺座"。

棺槨的大小，从板灰來看：棺長1.63—2.4、寬0.4—1.2、高0.4—0.5米。槨長2.0—2.52、寬1.2—1.6、高0.6—0.7米。

各墓都是單身葬，葬式有直肢葬和屈肢葬兩种（圖8、9，插圖6）。其中直肢葬110座，屈肢葬25座，因人架腐朽葬式不明的10座。人架的头向北方的128座，向南方的4座，向东方的4座，向西方的7座，因人骨腐朽無遺，头向不明的2座。

（三）随葬品：在145座墓中，有随葬品的103座，無随葬品的40座，因被别的墓葬打破，不能确知有無随葬品的2座。

随葬品的放置，从棺灰的范圍可以看出：多数是放在棺的头前，少数放在棺的兩側和后面，也有放在棺的上面或底下的。此外有8座墓是放在墓穴北壁靠近墓口的"土台"上的（圖10—13）。

在有随葬品的103座墓葬中，以用陶器随葬的最多，計有89座；分别用貝幣、銅帶鈎、銅帶圈、刻花骨牌（圖14—16）、玉帶紐等实用品或裝飾品随葬的有45座；沒有器物只有祭肉随葬的10座；在有器物随葬的墓中也常有祭肉發現。从祭肉的骨头可分猪、羊、牛三种，其中以用猪的最多，用牛或羊的很少。

綜合各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如下表：

类别	陶器													銅器				骨貝			玉石			
名称	鬲	豆	盂	罐	尊	匜	盤	杯	鼎	壺	簋	舟（？）	碗	其它	小計	飄	帶鈎	帶圈	管	小計	刻花骨牌	貝幣	小計	八楞条形石飾	殘玉条	玉帶紐	小計
数量	卄五件	八件	十五件	四四件	三件	七件	四件	四件	六件	六件	四件	二件	二件	一件	三三件	一件	二件	二件	一件	六件	一件	三件	四件	一件	二件	二件	五件

（参看圖17—33，37—38）

（四）随葬陶器的几种組合：各种随葬的陶器，無論从器形上和数量上比較，都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归納起來，大致可以分出以下三种不同的組合：

甲組：以鬲、盂、豆、罐四种为一組（圖34—36、39，插圖7之3—6），用这一組器物随葬的墓最多；其次是用这一組陶器中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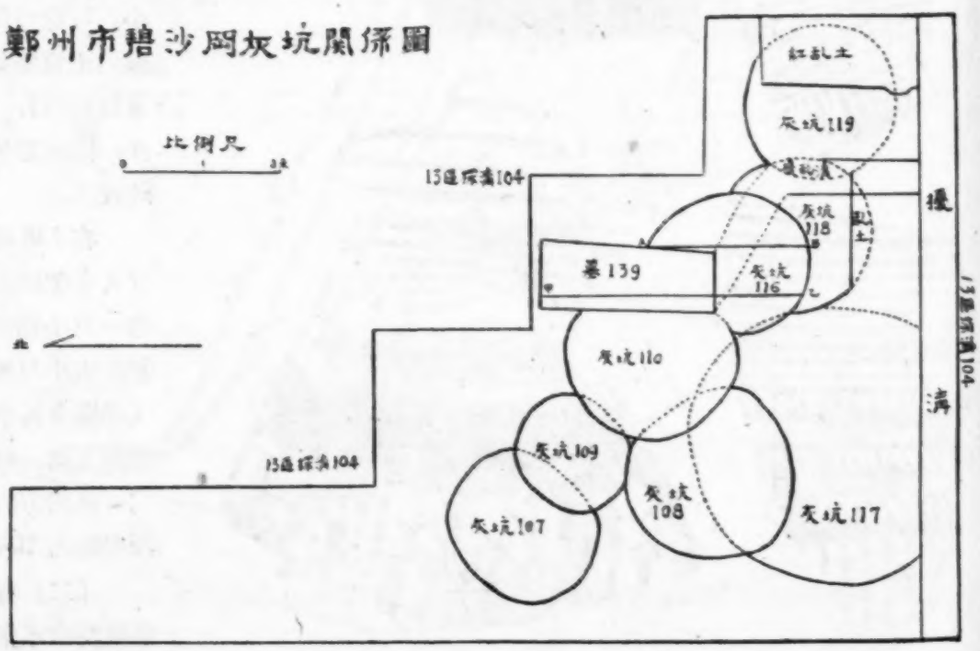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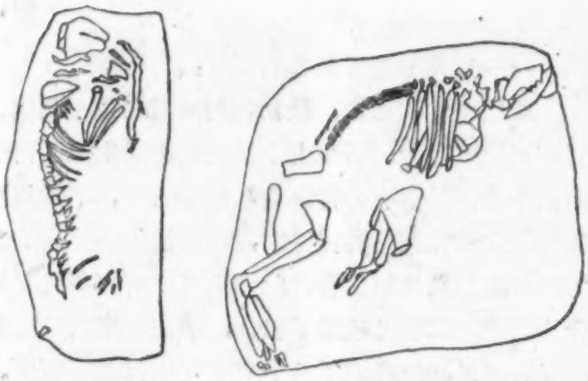


插圖4

种、兩种或三种器物來随葬的墓也很多。四种陶器的形狀与河南禹縣白沙战國墓出土的相同（注一）。从器形上看，一类較大可以实用，其中在鬲的底部有的还帶着黑色的燒痕，說明它是炊具，里面也常常發現有祭肉的骨头。另一类較小，是專供随葬用的"明器"。从数量上看，其中鬲、盂、罐各墓都是随葬一件的，只有豆往往有用兩件随葬的，并且有一个墓中用四件豆來随葬的，这是比較特别的。此外，在豆盤上常常划着类似文字的記号（插圖 8）。

插圖 5



墓 129 腰坑　　墓 105 腰坑

乙組：以双簋、一鼎、一盤、一匜、一舟(？)、一杯为一組。器形均仿銅器（上塗一層淡綠釉），与"新鄭出土古器圖志"（注二）上的同类銅器作風相似。其中簋、杯、盤与河南禹縣白沙战國墓葬出土的（注三）完全一样（圖 40—45、47）。这类墓只發現兩座。

丙組：沒有一定的組合，基本上与甲組相同。不同的是逐漸以鼎代鬲，以簋或壺代罐，豆上附有盖，并有盤、匜出現了。这一类墓的数量虽不多，但是变化却很大，好像正在从甲組中脫变出來。其中鼎、豆、壺的形狀都是仿銅器的。155 号墓出土的鼎、盂、罐上还部分地保存有白地墨繪的菱角牙紋、廻紋等仿銅器上的紋飾（圖 46，插圖 7 之 1、2）。并出現以鼎、豆、壺、匜为一組的墓（編号 235）（圖 48—51），这与鄭州二里崗、崗杜等处的战國墓所出的陶器組合相同（注四）。

（五）墓打破墓的情形共發現四起，它們的几种比較如下：

打破右边的墓				被左边的墓打破			
墓号	方向	葬式	随葬器物	墓号	方向	葬式	随葬器物
123	东西	屈肢	鬲、豆、盂、罐	116	南北	直肢	沒有
132	东西	屈肢	沒有	134	南北	直肢	鬲、盂、豆
247	南北	屈肢	壺	248	南北	直肢	鬲、盂、豆、豆
232	南北	直肢	沒有	242	南北	直肢	沒有

插圖 6

墓 131 屈肢　墓 231 屈肢　墓 181 直肢　墓 186 屈肢　墓 219 屈肢

四、初步推断

（一）关于遺址灰坑的用途：

遺址灰坑的用途，最初我們知道的很不明确。特別是八个圓形灰坑互相打破的現象，因其所出遺物相同，更使人費解。后來由于我們去洛陽参观了科学院考古所的發掘工作，看到他們在發掘漢代的遺址中發現很多倉，其中有一种倉就是圓形的坑，不过規模比碧沙崗的大一些，同时在坑底發現粮食窩朽后的綠色痕迹，这給我們的啓發很大，我們推想碧沙崗的圓形灰坑也是做"倉"（囤帶壳的粮食）用的。这与"方倉""圓囤"的意义也相脗合。此外也可以解釋灰坑互相打破的原因，由于当时"倉"中的囤粮用完了，就被廢弃为垃圾坑，以后又收穫了粮食，就在原來的地方重筑一个新"倉"，不久，新倉又被廢弃了，这样不断筑造、廢弃的結果，便形成了八个灰坑互相打破的現象。

（二）关于时代的推断：

1. 从墓打破墓的現象看，可知一般是南北向、直肢葬的墓早于东西向、屈肢葬的墓；出鬲、盂、豆（二件）的——即出甲組陶器的墓，早于出壺的——即出丙組陶器的墓。

2. 从随葬陶器的形制看，可知乙組陶器系仿春秋时代的銅器形式（注五），丙組陶器系仿战國时代的銅器形式，因此乙組陶器墓应早于丙組陶器墓。

3. 从墓与遺址的关系看，可知甲組陶器墓的陶器与遺址所出的陶器相同，因此它們的时代也应相同。自然，遺址的具体时間应早于墓葬的时間，因为有些墓葬打破了遺址。至于乙組陶器墓，也打破了遺址，因此它的时代也应晚于遺址。

4. 根据前边1、2、3項的比較，可以排出遺址和墓葬的先后时代順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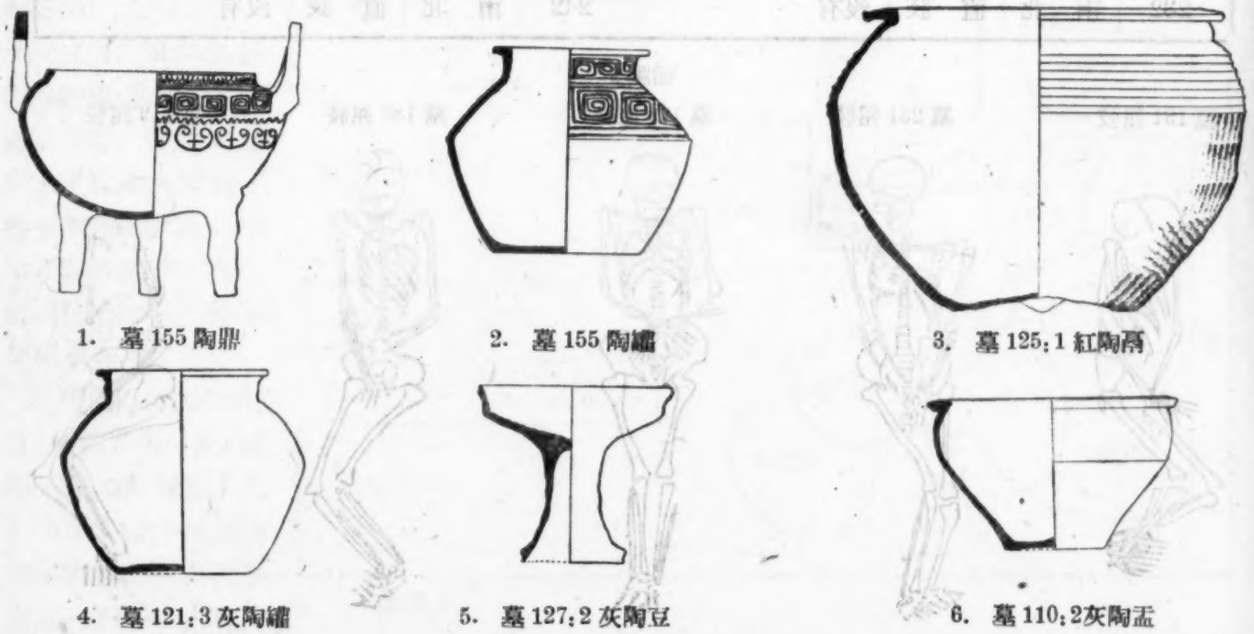
遺址→"甲組"陶器墓→"乙組"陶器墓→"丙組"陶器墓

这样的順序只能是大概情形，不是絕对的。因为有些同一組的墓葬可能是跨着前后兩个时期的。

此外，由于102号墓是被灰坑102所打破的，同时它的随葬品又是与殷代的貝幣相同（圖14），因此它的时代应比遺址早些。

5. 与河南禹縣白沙的战國墓及鄭州二里崗、崗杜的战國墓比較，可知同于白沙，而早于崗杜、二里崗的战國墓。崗杜曾發現一座出有鬲、盂、豆的墓，可与碧沙崗甲組陶器墓相当（注六），碧沙崗235号墓出土的鼎、豆、壺、匜和崗杜、二里崗的战國墓相当，它的下限时代正好連接了崗杜和二里崗的战國墓。由于

插圖7



1. 墓155陶鼎　2. 墓155陶罐　3. 墓125:1紅陶鬲

4. 墓121:3灰陶罐　5. 墓127:2灰陶豆　6. 墓110:2灰陶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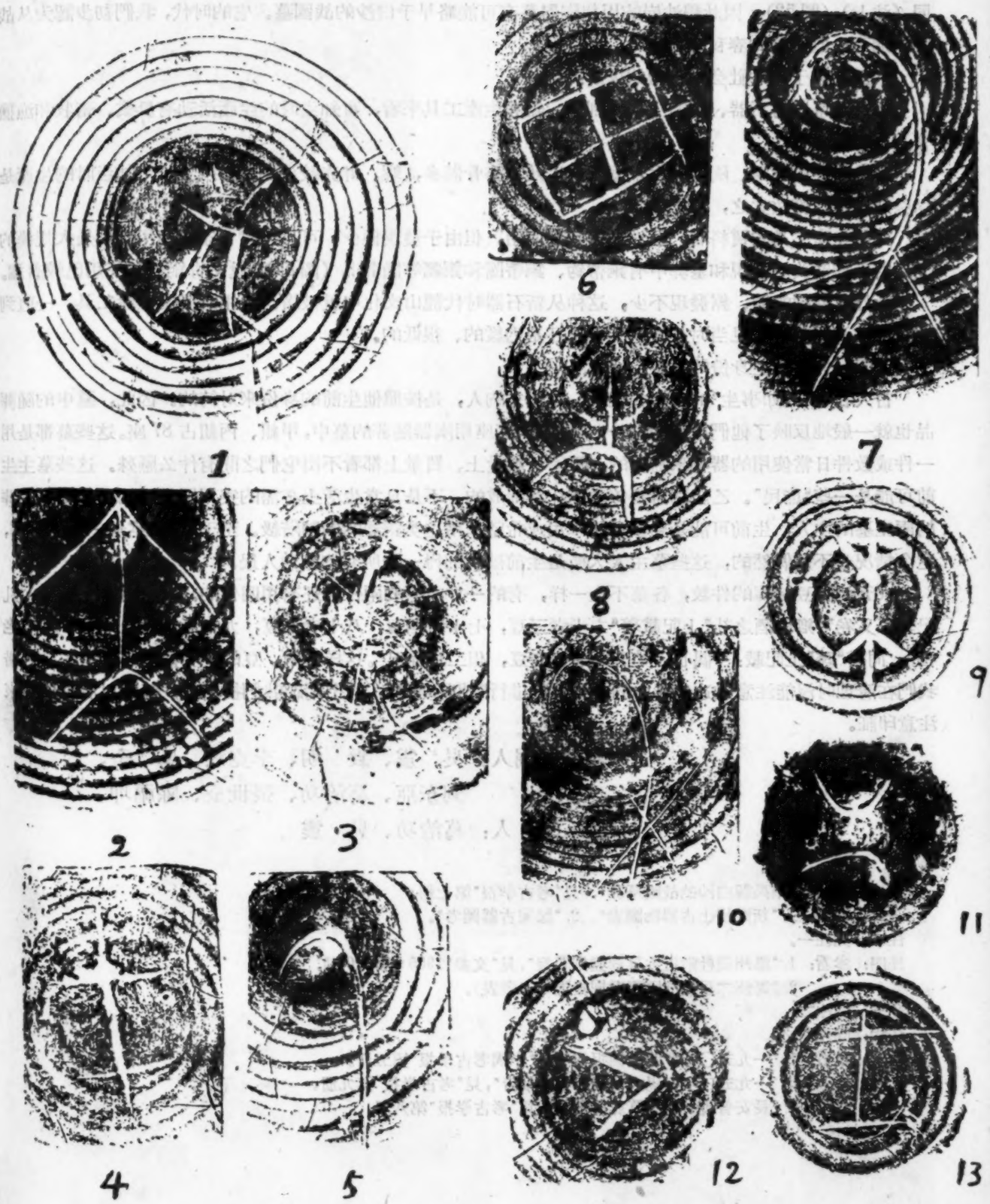


插圖 8　豆盤上划的記号：

1. 墓 226 陶豆記号　4. 墓 161 陶豆記号　7. 墓 142 陶豆記号　10. 墓 208 陶豆記号
2. 墓 162 陶豆記号　5. 墓 127 陶豆記号　8. 墓 138 陶豆記号　11. 墓 167 陶豆記号
3. 墓 217 陶豆記号　6,13. 墓 166 陶豆記号　9. 墓 157 陶豆記号　12. 墓 138 陶豆記号

碧沙崗"甲組"陶器墓还部分地保留着"腰坑"的遺制，这与安陽一帶的殷代墓葬和長安普渡村的西周墓葬相同（注七）（圖53）。因此碧沙崗的甲組陶器墓有可能略早于白沙的战國墓。它的时代，我們初步認为从战國早期可一直上溯到春秋时代。

（三）关于当时社会生產力的推断：

1. 从遺址中有石器、銅箭头和蚌制刀、鋸等生產工具來看，可知当时的生產活动有農業、畜牧和漁獵等。

2. 从遺址中陶鬲、陶盂的大量發現，以及家畜骨骸多，螺、蚌壳較少的情形來看，可知当时的生產是以農業为主，畜牧次之，漁獵又次之。

3. 从生產工具的質料看，虽然石器还在使用，但由于發現極少，可見当时石器的使用已不是大規模的了。由于銅箭头的發現和墓葬中有銅帶鈎、銅帶圈和銅瓢等随葬品（圖52），說明青銅器的使用已較普遍。

此外，蚌制的鐮、鋸發現不少，这种从新石器时代龍山文化中就被廣泛采用的農業生產工具，一直到这时还被沿用着，可見当时生產力的發展还是迟緩的、很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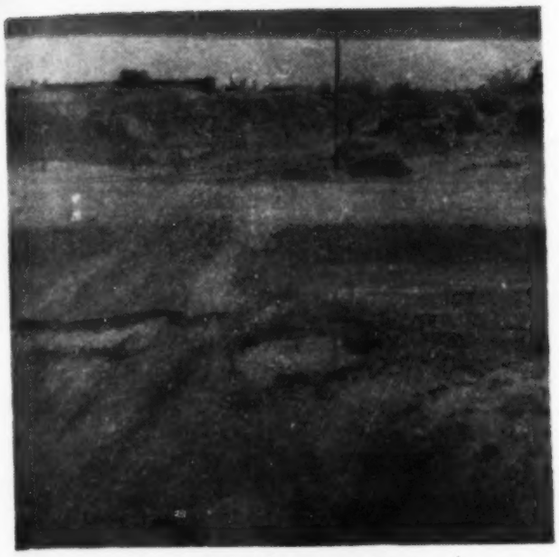
（四）关于墓主身份的推断：

古人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支配下，对死去的人，是按照他生前的身份來对待的。因此，墓中的随葬品也就一般地反映了他們生前的身份。碧沙崗89座用陶器随葬的墓中，甲組、丙組占87座。这些墓都是用一件或数件日常使用的器物來随葬的，不論从数量上、質量上都看不出它們之間有什么懸殊。这些墓主生前可能是一些"庶民"。乙組陶器是仿青銅礼器制成的，不是日常生活上必需的实用器物。用这組陶器随葬的兩座墓的主人，生前可能是屬于曾經享用或希望享用这类銅器的剝削階級。至于40座空無一物的墓葬，这个情况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墓主人大概是生前被剝削得一無所有的劳动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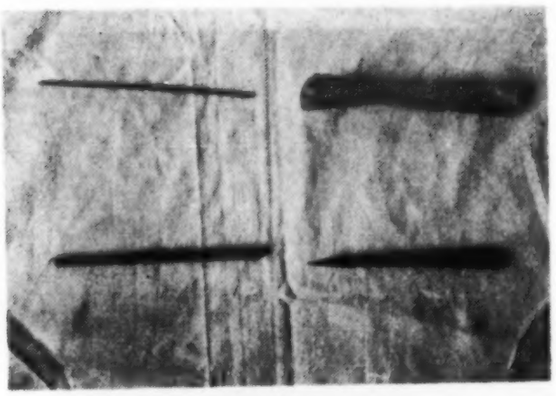
（五）陶豆随葬的件数，各墓不全一样，有的一件，有的兩件，还有用四件的。"十三經注疏"中"礼記""正义卷""鄉飲酒之礼"上記載着"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同書"疏"上記載："偶也，其五十者也有豆，但二豆而已"。这样看來，豆的多少似与年齡有关。可惜我們在清理时沒能注意对这些墓中的人骨年齡進行鑒别和記載，这个問題我們提出來，等待以后工作中來注意印証。

参加發掘人：吳　震、袁　明、李克敏、馬　全、
刘东亞、葛治功、張世全、陈福坤、
执　筆　人：葛治功、吳　震

注一：参看"河南禹縣白沙的战國墓葬"，見"考古学报"第七册。
注二：参看：1."新鄭出土古器物圖志"，2."鄭冢古器圖考"。
注三：同注一。
注四：参看：1."鄭州崗杜附近古墓葬發掘簡报"，見"文参"1955年第10期。
2."鄭州二里崗战國墓發掘报告"（未發表）。
注五：同注二。
注六：同注四之1。
注七：参看：1."一九五〇年殷墟發掘报告"，見"中國考古学报"第五册。
2."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报告"，見"考古学报"第九册。
3."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發掘記"，見"考古学报"第八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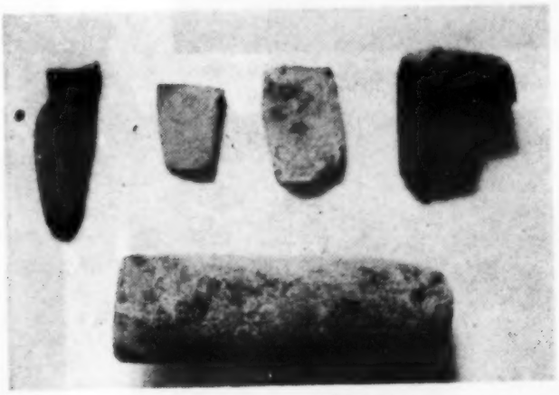


圖一　碧沙崗被兩条道路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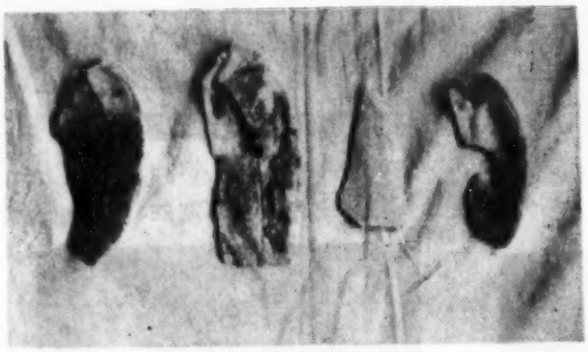


圖二　碧沙崗遺址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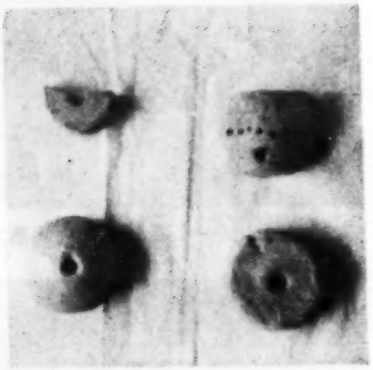
圖三　碧沙崗遺址銅鏃



圖四　碧沙崗遺址骨器



圖五　碧沙崗遺址蚌器



圖六　碧沙崗遺址陶紡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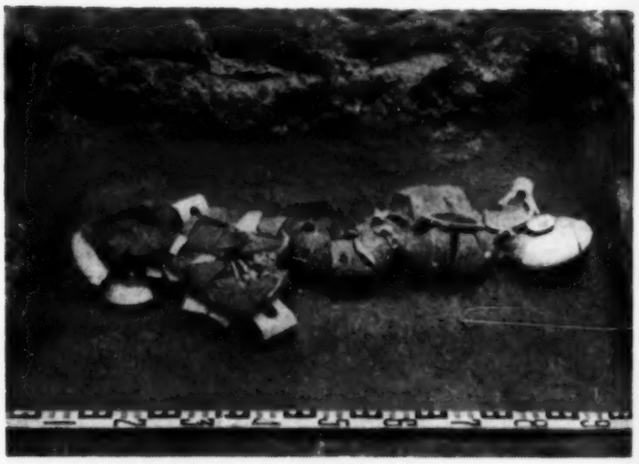
圖七　碧沙崗遺址陶拍子

圖八　墓 160 直肢葬(右圖)

圖九　墓 114 屈肢葬

圖十　墓 231 隨葬陶器、祭肉放在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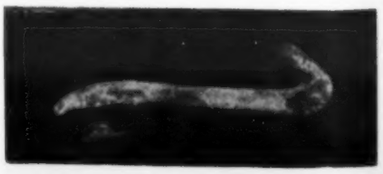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墓 151 隨葬陶器放在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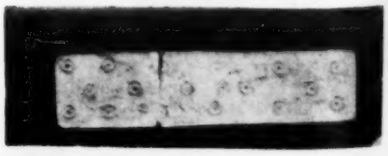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墓 224 隨葬陶器放在棺前

圖十三　墓 106 隨葬陶器放在棺口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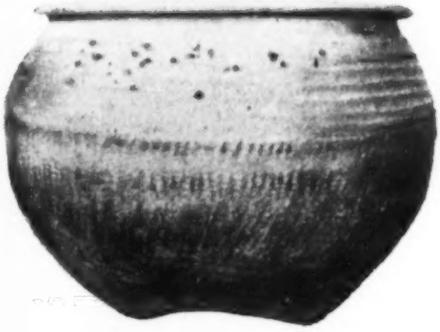
圖十四　墓 102 隨葬的貝幣



圖十五　墓 184 隨葬的銅帶鈎



圖十六　墓 153 隨葬的刻花骨牌



圖十七　墓125:1紅陶鬲

圖十八　墓115:1紅陶鬲

圖十九　墓134:2灰陶鬲

圖二十　墓133:1紅陶鬲

圖二十一　墓208:4灰陶鬲

圖二十二　墓115:3灰陶盂

圖二十三　墓161:4灰陶罐

圖二十四　墓148:1灰陶罐

圖二十五　墓134:2灰陶豆

圖二十六　墓144:1灰陶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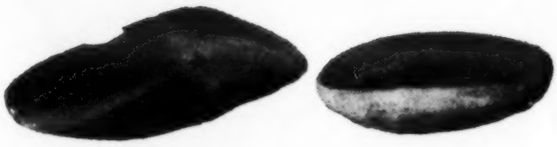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七　墓133:3灰陶壺

圖二十八　墓204:2灰陶鼎

圖二十九　墓 204:3 灰陶壺

圖三十　墓 234:6 灰陶豆

圖三十一　墓 224:7 灰陶盤



圖三十二　左墓 204:5，右墓 230:1 灰陶匜

圖三十三　左墓 225:2，右墓 234:5 灰陶杯

圖三十四　墓 121:1 紅陶鬲

圖三十五　墓 110:2 灰陶盂

圖三十六　墓 127:2 灰陶豆

圖三十七　左墓　241:1 灰陶罐
右墓　237:3 灰陶杯

圖三十八　墓 200:5、207:3
灰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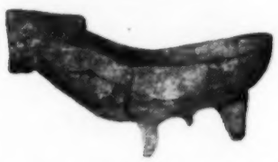
圖三十九　墓 121:3 灰陶罐

圖四十　墓 224:4 陶罍

圖四十一　墓 224:3 陶罍

圖四十二　墓 224:5 陶鼎

圖四十三　墓 227:1 陶盤



圖四十四　墓 224:2 陶匜

圖四十五　墓 224:1 陶舟(?)

圖四十六　墓 155:1 陶鼎

圖四十七　墓 224:6 陶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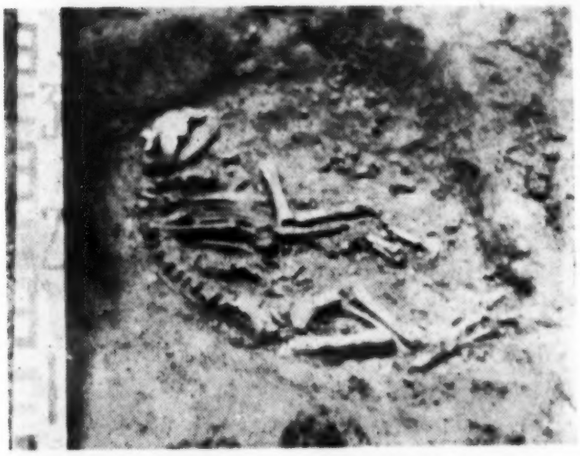
圖四十八　墓 235:1 灰陶鼎

圖四十九　墓 235:2 灰陶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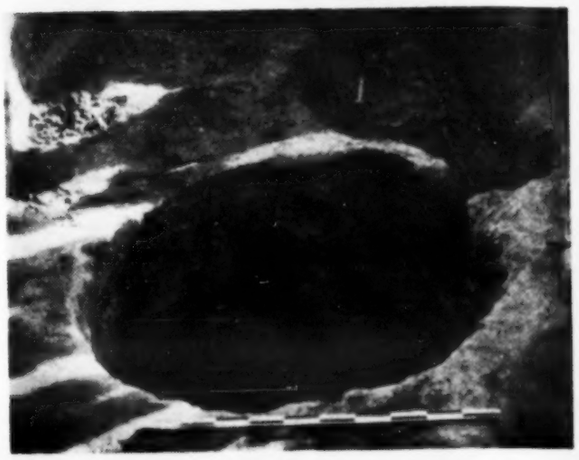
圖五十　墓 235:4 灰陶壺

圖五十一　墓 235:3 灰陶瓿

圖五十二　墓 226:1 銅鼎



圖五十三　墓 105 之腰坑



圖五十四　灰坑 102 与墓 102 的关系

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出土的甲骨(文見第 5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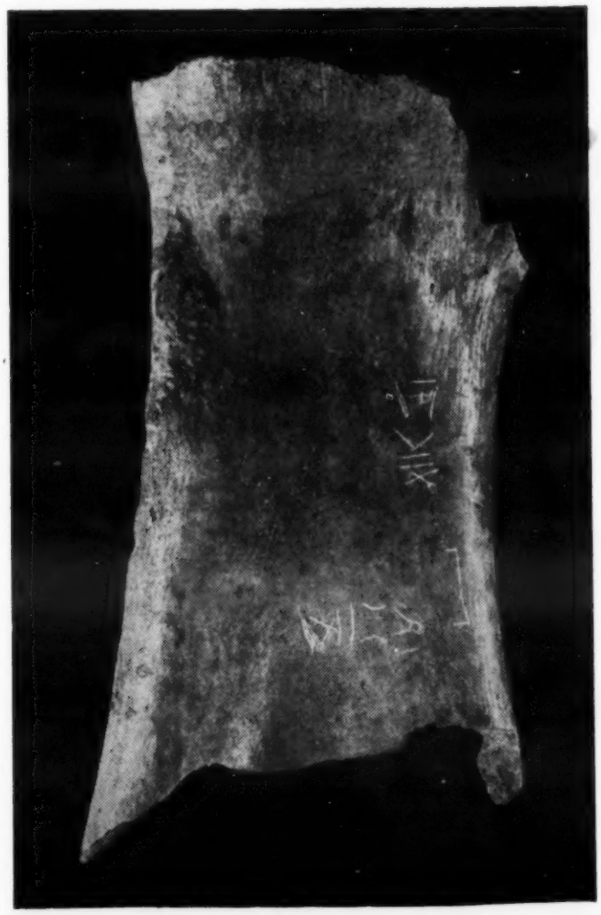


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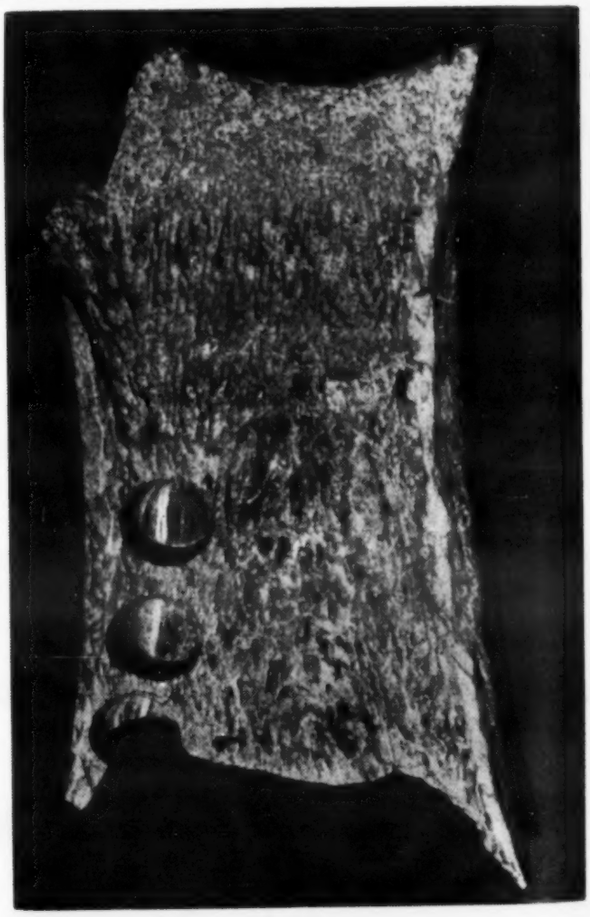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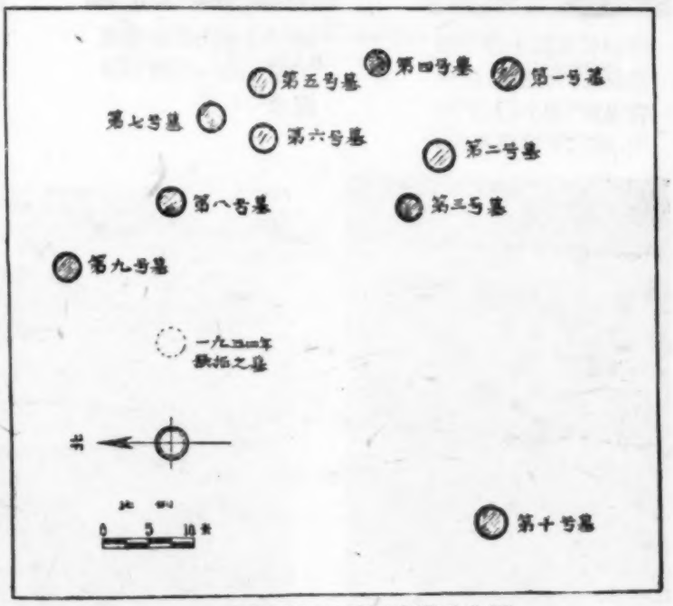


圖 二

太原市南坪头宋墓清理簡报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会

1955年7月，太原东南郊小店区南坪头磚厂發現十座古墓葬，經磚厂报告市文管会，于7月底進行了清理。各墓的形制大致相同，全是單室磚券、圓錐形墓頂，墓道均向南成斜坡形。平面分八角形和六角形兩种，面積大小不一。墓內結構一般都比較簡單，各墓角有磚砌斗栱，并作成簷椽及瓦壟狀。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号墓的墓壁上，都抹有一層很薄的白泥，每壁用墨打着黑边，栱眼壁上都用紅、黃、綠色繪成簡單的花卉，斗栱上塗紅色。因墓內曾被歷年雨水冲刷和泥土淤塞，壁上彩繪大部剝落、損坏，僅留一些模糊痕迹。第一、二和十号墓內未抹白泥，亦未彩繪。墓中殉葬品都很少，以陶瓷器为主。各墓埋葬人數有兩人或三人的。



太原南坪头磚厂宋墓分布圖

第一号墓，方向正南北，平面成八角形。墓室南北長2.5米，东西寬2.67米，自頂至底深2.45米。墓門高1.09米，寬0.91米。墓底未鋪磚，也未作炕。人架兩付，是一男一女合葬一棺，仰臥，头向东。墓內未經雨水淤浸过，棺板仍保存着，骨架也較完整，只是靠北端的男性头骨僅剩一塊。墓門用瓦缸堵塞，可能是砌墓时盛放过白灰泥的。墓內殉葬品有黑釉小瓷罐一个，置于兩人头骨之間。

第二号墓，平面为八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2.7米，东西寬2.65米。墓頂已塌。墓底用方磚平鋪，厚0.3米。墓門高1.3米，寬0.8米。門用条磚封閉。墓內被泥水淤浸，棺已腐朽，只剩木灰、鉄釘。人架兩付，是一男一女合葬一棺。兩骨架重疊一起，一个头骨完整，另一个只剩一片头盖骨。面向因被泥水冲动，成側臥形狀。殉葬品在淤土中發現長頸灰陶瓶一，黑釉小瓷碗一。有"祥符元宝"和"嘉祐通宝"銅錢各一枚，在人骨口內含着。

第三号墓，平面为六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1.93米，东西寬2.19米。墓頂已塌。墓門高0.875米，寬0.625米。門用条磚封閉。靠北壁有磚炕，南北寬1.225米，东西長2.2米，高0.05米。墓底用磚平鋪。人架兩付，未發現棺槨。墓室經泥水淤浸，骨架全腐，僅剩兩片头骨。殉葬品有"景德元宝"、"熙寧元宝"、"嘉祐通宝"銅錢各一枚，在淤土中發現有一个白瓷黑花長頸瓶，倒于墓門东角牆下。有白瓷道字碗和白瓷花字罐各一个，置于东角炕边。

第四号墓，平面为八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1.98米，东西寬1.9米，自頂至底深2.62米。靠北壁有磚炕南北寬1.375米，东西1.9米，高0.3米。墓門高0.8米，寬0.52米。門用条磚封閉。墓道寬0.82米，墓底鋪条磚。靠墓門的东西兩壁各有一直欞窗，高和寬都是0.7米，成正方形。北壁正中以兩塊条磚作成一个小的未啓門，上塗紅色，高0.3米，寬0.15米。人架三付，一男二女合葬，無棺槨，头向东，骨架完整，均仰臥，男的是后來移埋進去的。殉葬品有陶罐一，倒于东壁炕边人架头部的东南方，灰陶盆一，在墓底东壁炕角下。

第五号墓，平面为六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1.75米，东西寬1.95米，自頂至底深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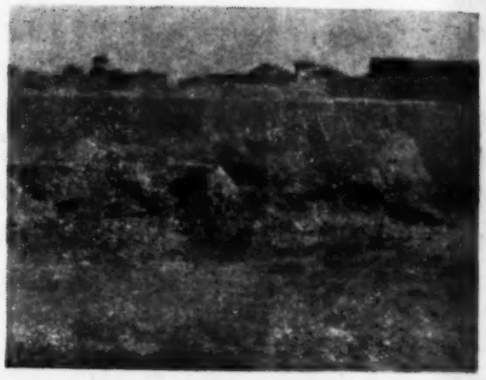
第三号墓出土白瓷黑花瓶(高28厘米，瓶底有墨寫"刘小口口"四字，后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号墓出土白瓷道字碗　高5、口徑 14.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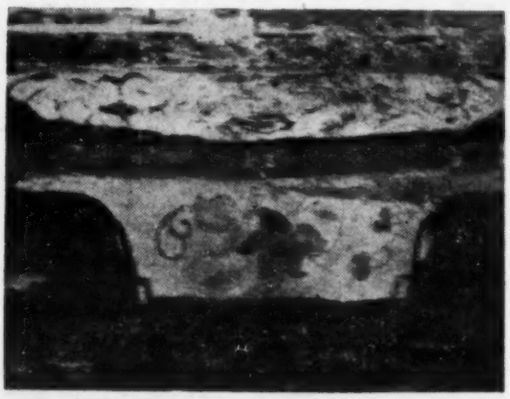
第三号墓出土白瓷黑花"花"字盖小罐　高 11 厘米

第一号墓的墓頂和墓壁

第四号墓的斗拱和半啓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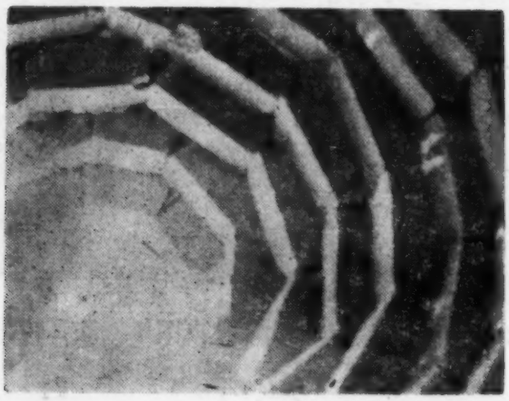
第五、六、七、八号墓的分布情况



第八号墓的斗拱和拱眼壁間的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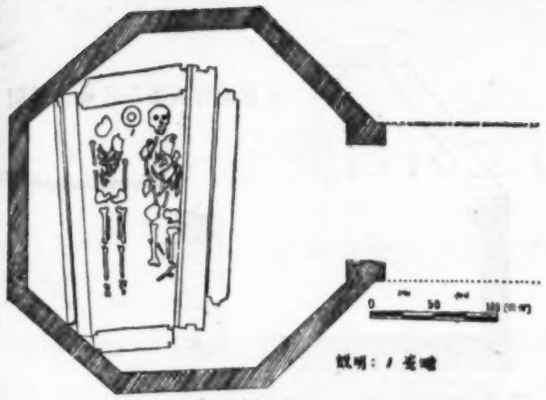
第八号墓墓門口堵磚和大瓦缸

第九号墓中的人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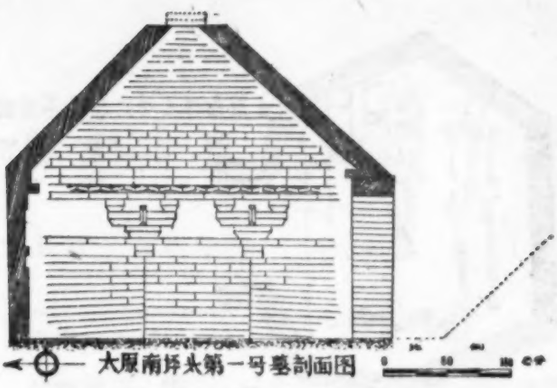


第八号墓券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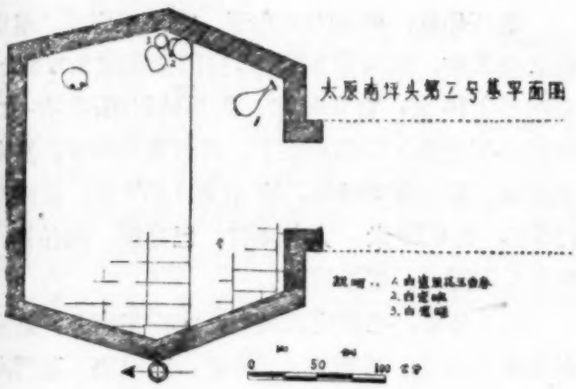
第七号墓出土罐高 15、口徑 16、腹徑 21.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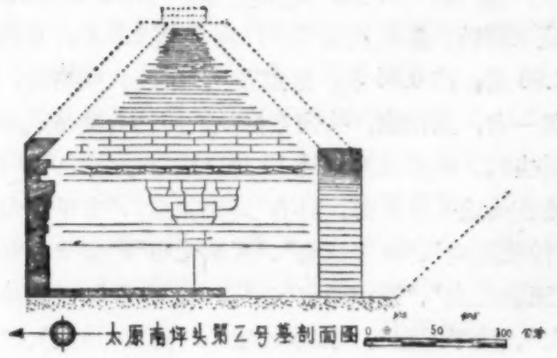
太原南坪头第一号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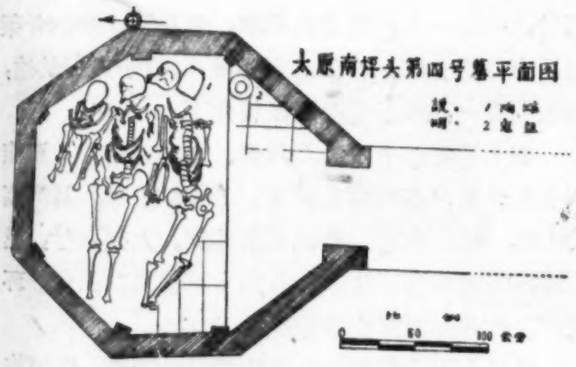
太原南坪头第一号墓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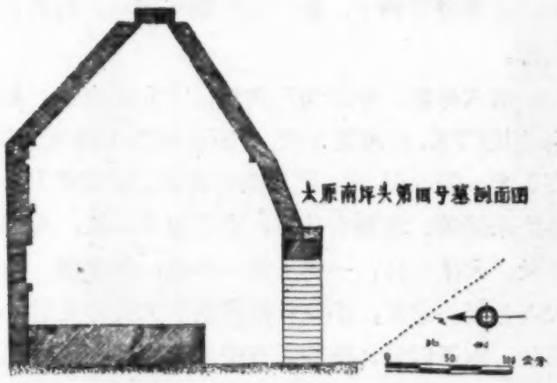
太原南坪头第二号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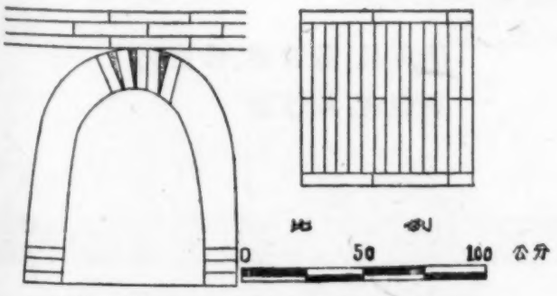
太原南坪头第二号墓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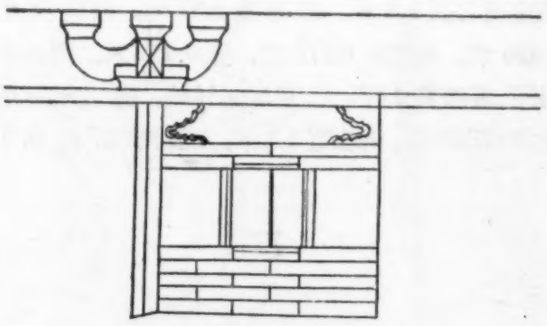
太原南坪头第四号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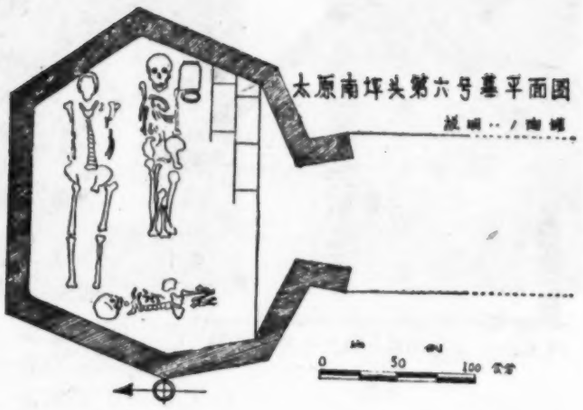
太原南坪头第四号墓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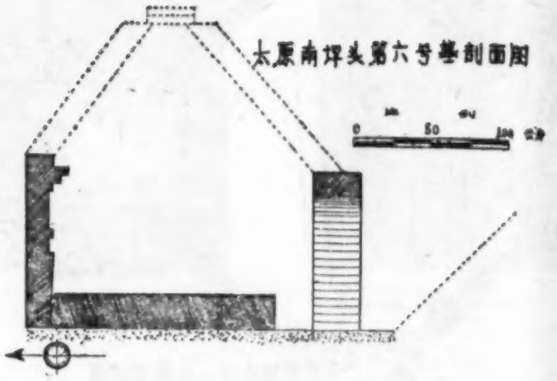


第四号墓的门洞　　第四号墓的直棂窗



第四号墓的斗拱和半截门





米。墓門高0.85米，寬0.59米。門用条磚封閉。墓底未鋪磚。靠北壁有磚炕，南北寬1.2米，东西寬1.95米，高0.35米。墓道寬0.9米。人架兩付，一男一女，無棺槨，头向东仰臥。男性人架是后來移進去的。殉葬品有銅錢15种（按年号分），共46枚，放在炕边人骨头部，計有"开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祥符通宝"、"天聖元宝"、"皇宋通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嘉祐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熙寧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紹聖元宝"、"元符通宝"、"大观通宝"，白瓷碗一，在墓道內，灰陶罐一，在炕边，黑釉碗一，在东壁炕角下，鉄三塊，銅耳环一，均在人骨头部。

第六号墓，平面为八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1.7米，东西寬2米，自頂至底深1.95米。墓門高1米，寬0.65米。門用条磚封閉。墓道寬1米。墓底未鋪磚。北壁有磚炕，南北寬1.45米，东西長2米。人架三付，一男一女一小孩，無棺槨。兩个大人骨架头向东，小孩骨架横躺于大人骨足后，头向北，均系仰臥。殉葬品有帶盖灰陶罐一，在炕边人头骨左側。

第七号墓，平面为六角形，方向北偏东四度。墓室南北長1.8米，东西寬2.37米，自頂至底深2.625米。墓門高0.775米，寬0.525米。門以条磚封閉。墓道寬0.875米。墓底未鋪磚，靠北壁有用紅色方磚砌的炕，南北寬1.3米，东西長2.37米，高0.25米。人架兩付，为一男一女，無棺槨。骨架被泥水冲动。殉葬品有鲢魚黃帶盖瓷罐一。

第八号墓，平面为六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2米，东西寬2.25米，自頂至底深2.175米。墓門高1.16米，寬0.66米。門用磚封閉，并有一口放过白灰泥的瓦缸砌封在下。墓道寬0.96米。墓底未鋪磚。靠北壁有磚炕，南北寬1.275米，东西長2.25米，高0.29米，人架兩付，已腐爛，無棺槨。殉葬品陶罐一，置于炕边。

第九号墓，平面为六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1.85米，东西寬2.275米，頂已塌。墓門高1米，寬0.82米。墓底未鋪磚。靠北壁有磚炕，南北寬1.3米，东西長2.275米，高0.2米。人架兩付，一男一女，保存尚完整，無棺槨。男的骨架系后來移進去的。殉葬品有陶罐一，放于东壁炕边，黑釉瓷碟一，放于东壁墓底炕角下。

第十号墓，平面为八角形，方向正南北。墓室南北長2米，东西寬2.17米，頂部已塌。墓門高0.91米，寬1.09米。墓底用条磚鋪。人架兩付，已腐爛，方向辨別不清。葬具为木棺已朽，只留鉄环鉄釘。殉葬品有黑瓷帶盖罐一。

从以上十个墓葬的分布位置看，系屬一个家族的坟地。根据各墓所出的器物、錢幣考查，这些墓是北宋末年的墓葬。

清理員：戴尊德、曾廣亮
整理者：戴尊德

洛陽澗西16工区82号墓清理記略

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16工区發掘小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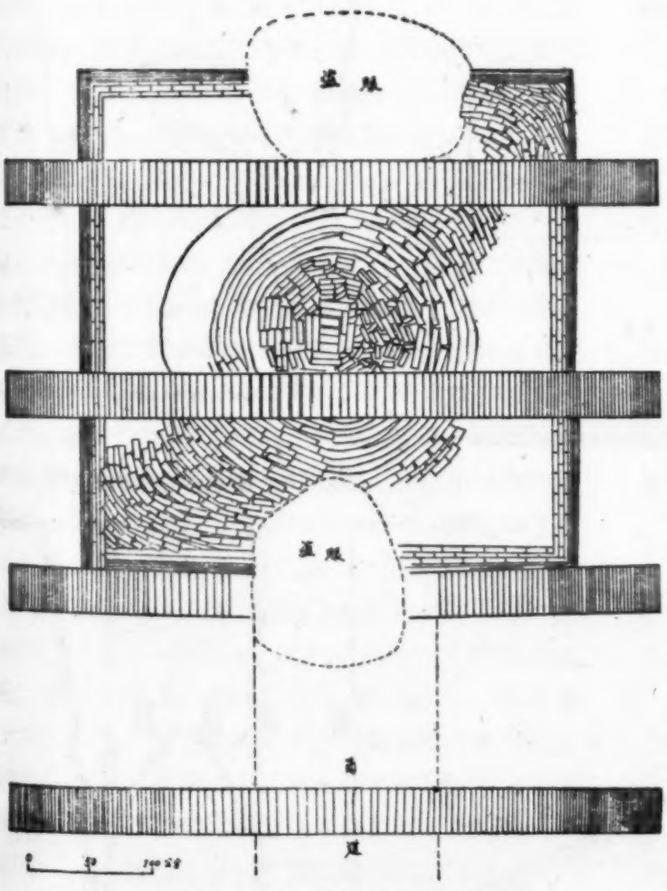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二隊16工区發掘小組在洛陽16工区兩个月多清理了七十余座較大型的墓葬，其中以晋墓为最多，但大部分已为早期擾乱，尤以其中的82号墓被擾乱的最甚。可是这墓的建筑結構較为特殊，特略作介紹。

82号墓位于洛陽西二十里谷水东略北平原地帶，坐北向南，偏西十度。在地表下深达9.5米，为了適应工程需要，决定擴大揭頂發掘。每下挖1米，就四周留20厘米的台階，挖到第二个台階，發現兩个不規則的橢圓形盜洞，長寬約1米，在盜洞中發現殘陶俑腿和陶片等。由第三个台階再向下挖1·5至2米，同样留20厘米的一周台階。該墓到結束共出土1,185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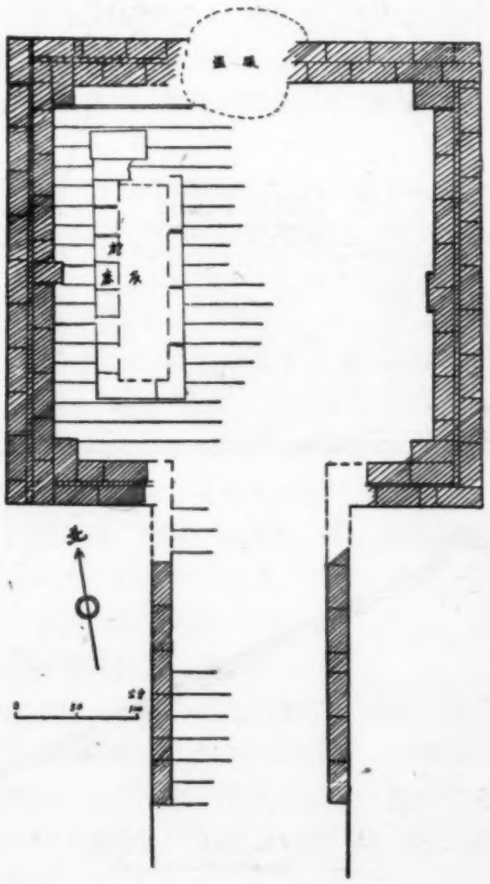
墓的結構：券頂以上的填土中，用小磚筑成四道懸臂似的弓形拱，似为保护墓頂的。墓室是用長36厘米、寬18厘米、厚8厘米的磚砌成方形室，室長3.1米，寬3.18米。地面用大長磚横鋪。前有券門（已被擾乱），長2.76米，寬1.3米。

磚的砌法：墓室四壁和甬道均为走磚式砌法。东西兩壁均有磚雕斗栱，斗栱可分为柱斗科与角斗科兩种。东壁除斗栱以外，还有磚雕壁龕，四角有磚柱，柱頂雕有獸头。墓頂自斗栱以上由方形逐漸收縮为圓形尖頂拱。尖頂拱又可分为兩部分：(1)

（下接第5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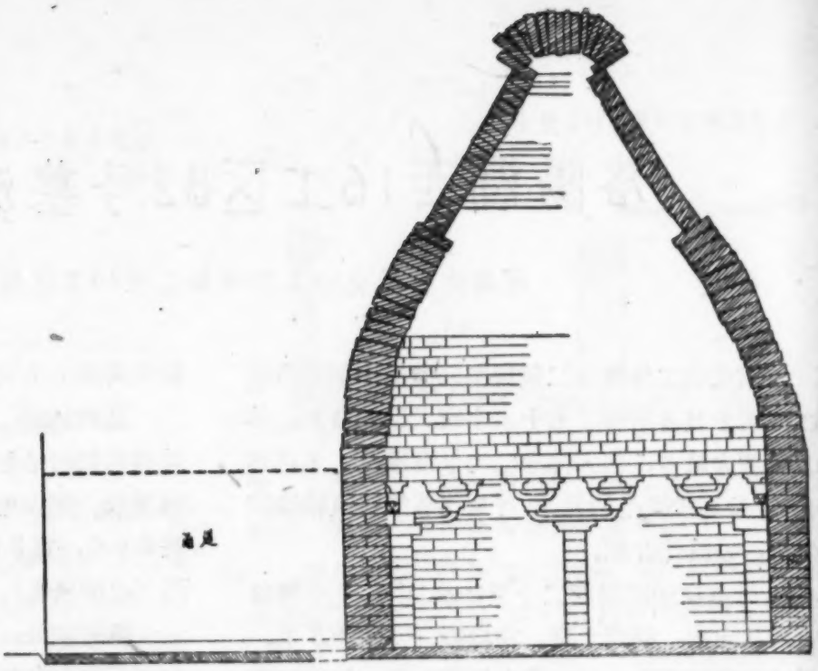
插圖一　82号墓拱券和墓頂俯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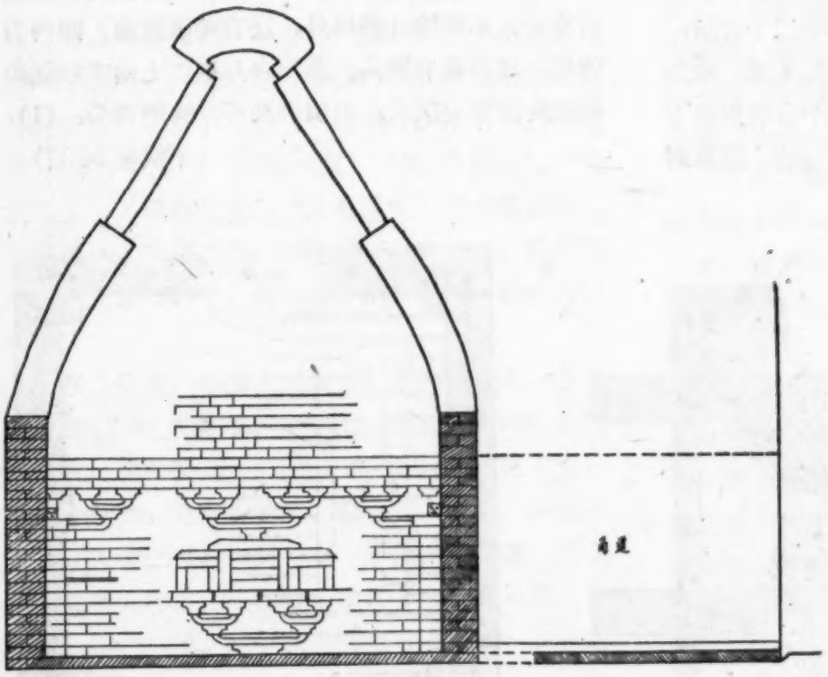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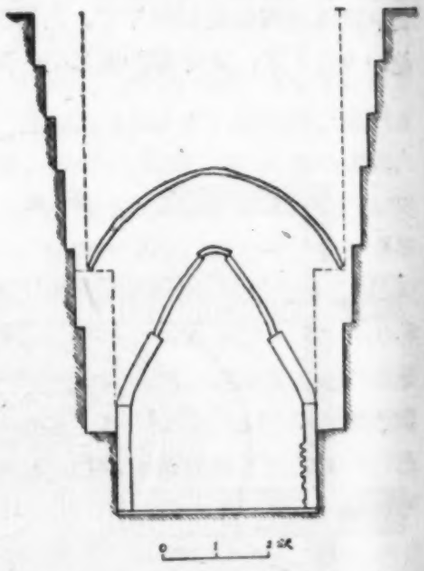
插圖二　82号墓平面圖

插圖三　82号墓西剖面圖柱头和
轉角鋪作及穹窿頂結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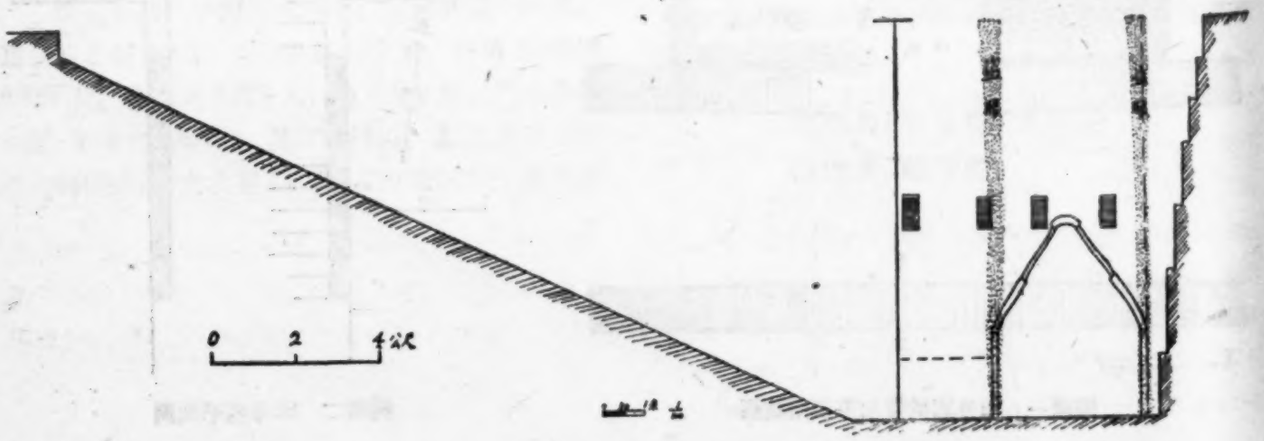
插圖四　东剖面圖(下)







插圖五　擴挖台階和供的形狀



插圖六　北剖面圖

長沙近郊發現的宋代遺存堆積

張 鑫 如

1955年10月，長沙北門外龍寿桥街东工地清理了26座墓葬，其中漢墓21座、唐墓2座、宋墓1座。唐墓和兩座土洞竪穴漢墓，已被挖坏，僅存碎磚及几件陶片。另外还發現有宋代遺存的堆積層及垃圾坑，在堆積層里藏着許多不同釉色的瓷片，也有半成品和完整的器物。在这里清出的漢代墓葬都是通过堆積層約1米多深才能發現墓口的，現將清理情况介紹于后。

这里是一座起伏的土嶺，方圓約100米左右，高約1—5米，上面是農民种菜的耕土層，工地取土是在土嶺自西而东。这里清出的墓葬一般較淺，最深不过4米，因上面是浮土堆積層，無法估計墓的原來深度。墓葬結構全是長方形土洞竪穴，葬具全腐蝕；坑長2.5—4米，寬1.5—2.5米，深1.5—3米。殉葬品大部分是泥質灰陶器，有一部分是火候較高的麻布紋罈子。此次21座西漢墓中所出的陶器大部都是火候低、胎質較松的泥質灰陶。遺物中有鼎、壺、盒、罇、灶等。除清理墓葬外，在土方断面上看出距地表約0.90米深处，有0.30米厚的灰黑色土層，当时沒有注意，認为是堆積土，未進行清找土層的遺物。后來在土嶺中部看到有民工挖爛的許多瓷片，与瓷片共存的也有碎磚和瓦片，同时也有完整的小瓶、碗、碟、缽、爐等。当發現这样情况的时候，整个土嶺已經挖去了大半，僅剩土嶺中部20多米長、10米左右寬的一个土堆。在这里仔細的清理了一下，約在0.30米厚的灰土層中，就發現了很多各种釉色的瓷片；特別是在一个扁圓形的灰坑內，清出的瓷片最多。这个坑的上部被挖掉了，僅在土方的断面留下一条痕迹，坑的下部还有0.30米的深度，总深1.10米，長1.20米，寬0.80米。坑內填土是灰黑色，土中含有木炭渣和腐蝕的布痕同瓷片混合在一起。在灰坑附近的土層中还發現有淳化通宝錢（宋太宗时的）。根据这个灰坑和文化層的遺物來看，可以推断是宋代人民所居住的地方遺留下來的堆積層，清出的瓷器等，就是人們当时抛弃了的生活用具。

清出的瓷片甚多，現分为5种介紹于后：

（1）黑釉瓷器，有大口罐、兩耳帶蓋壺、三足小爐、灯盞、小底碗、碟等，这些瓷器胎質堅硬。胎有香灰色和白色兩种，釉水濃厚，但釉多不到底。其中有一件醬色釉三足小爐和一件殘存三分之一的黑釉小底侈口碗，釉水黑而潤澤，造形美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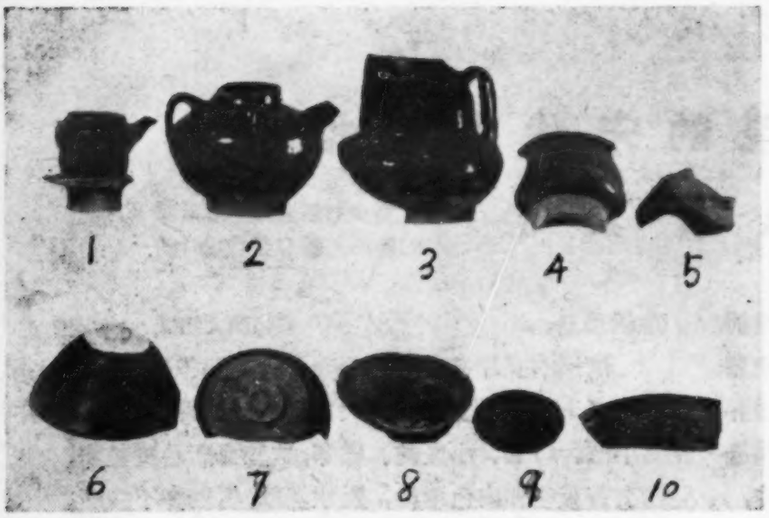
（2）白瓷，其中大部分是碗、碟、盂类，这些瓷器与長沙以往唐墓中所出的白瓷略有不同。唐墓出的白瓷碗、碟等，釉色白而濃，胎質較厚，同时口边全都有釉；而这些瓷片胎質較薄，釉中微帶淡青色，特別是碗、碟、盂之类，口边全都沒有上釉，似乎当初是鑲过銅边的。有些胎上刻有水草暗花而不透亮（圖二）。另有兩件半成品的青釉瓷器，一碗一碟，灰白色胎，釉色潤澤細腻（似龍泉窯品，圖三）。

（3）月白釉小碗，胎是紫紅色，質不甚堅，釉中帶藍点，釉水較厚，外面底部露胎，釉不到底（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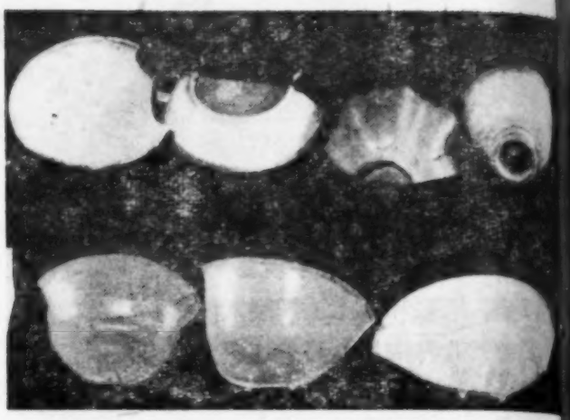
（4）黃釉凸花瓷器，以碗碟居多，也有似缽类的殘片。器的里面印花有四条魚，或中間有一龕字周圍印蓮花的。釉很薄，在花枝上露胎，容易脫釉。在这个灰坑內清出的黃釉瓷片較少，这种瓷片胎質很粗，不堅硬，可能是較早期的（圖五）。

（5）三彩器，有瓶、缽兩种，彩色有綠、黃、白三色。有一件小瓶僅高0.12米，腹部一段花，上部是綠釉，下部是紫泥色胎，胎的外衣似栗色。小瓶与殘缽在制作風格上是相同的（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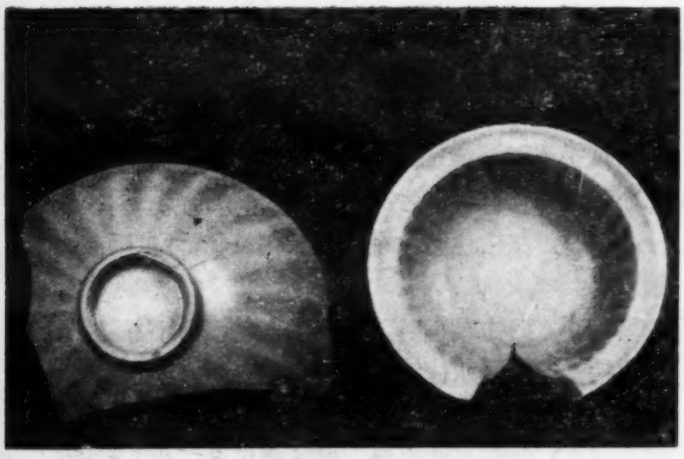
根据此次發現的各种釉色瓷器殘片和出土情况來看，似为本地所燒造，但未發現窯址。在長沙近郊清理墓葬时，曾不断發現有类似瓷片，但沒有这次出土的多而又集中，可以肯定的說这座土嶺是宋代的一个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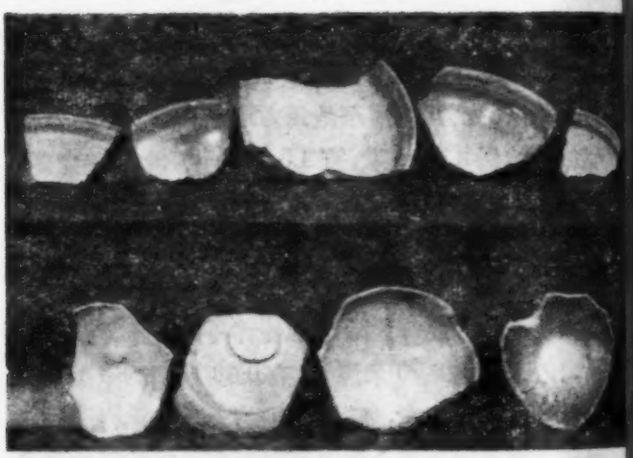
圖一　1. 黑釉灯盞　2. 黑釉兩耳帶蓋壺　3. 黑釉大口罐　4. 5. 醬色釉三足小爐　6. 7. 8. 黑釉小碗　9. 醬色釉小碟　10. 黑釉帶藍彩瓷片。



圖二　上：左2件白瓷盤　右2件白瓷盂
下：白瓷碗片



圖三　左青釉大瓷碗　右青釉瓷盤



圖四　月白釉瓷碗片

圖五　左：黃釉四魚大碗（正面）
右：黃釉印蓮花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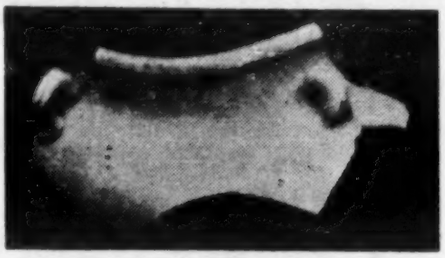
圖六　左：三彩小瓶（繪圖）　中：原器
右：三彩缽殘片

四川崇寧縣鉄砧山的古窰址

支　沅　洪

一九五五年五月，我調查漢嚴君平墓时，听当地老鄉說："离这不远有个'古窰包子'，很早就沒燒了，現在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爛陶片"。在群众的指引下，我到那里看了一次，認为是一座古代窰址。因为窰址位于鉄砧山，暫名它为鉄砧山窰。

鉄砧山在崇寧縣的西北部，实际是一横土埂子，所以又叫横山子，山南端有嚴君平墓，由此向北約三里，有一座較大的土堆，这就是老鄉所說的"古窰包子"。土堆的上端及四周，滿布着不成器形的各类陶片，及各种不同的匣鉢、支釘等物（圖二）。这些陶片全是泥胎，一般火候都頗高，釉色以黃綠为主，多数为輪制，厚約半公分。在窰址上拾得的陶片中，有一个四耳殘陶罐（圖一），釉色、胎骨、器形，完全与成都跳蹬河第5号墓出土的五代四耳罐相同。有一种类似陶璧之物，質粗，直徑約30厘米，厚約2.5厘米（圖三），地面堆積頗多。这种东西，是放在墓中殉葬用的，还是一种工具？尚須進一步研究；但过去在華陽縣包家桥清理的小形宋墓中曾出土过类似之物，它上面并寫有死者出身和死亡的年月日期。除此以外，这次拾得的标本，約可分为下列六种：



圖一　四耳陶罐殘片

第一种：胎为紫色泥胎，內塗灰色或黃色釉。器形以四耳罐为多，碗、盤外为半釉，滿底，輪制（圖四、五）。

第二种：胎为紫色泥胎，外塗黃釉，醬色斑（圖六）。

第三种：胎为灰色泥胎，外塗灰褐色或黃褐色釉。

第四种：胎为淡灰色泥胎，外塗灰色釉，开細冰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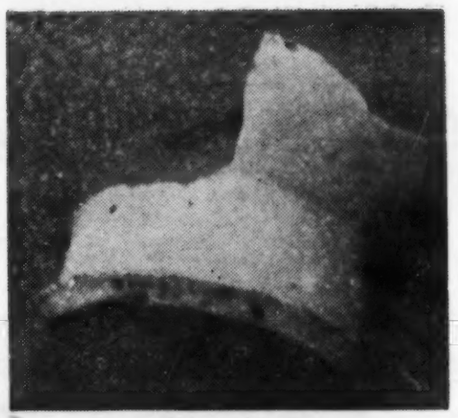
第五种：胎为半瓷胎，內外为淡黃褐釉，开細冰紋（圖七）。

第六种：胎为瓷胎，外为白釉。

关于窰史的記載，在崇寧縣志卷二第一頁說："鉄砧山又名横山子。今農人之耕田者犹时獲古盌古盤"。同卷第十一頁又說："縣北土性凝堅，制磚瓦可耐久"。卷三第二十一頁說："桂花場（縣北）有窰二座，一名嘉慶窰，从嘉慶間开办；一名新窰，光緒間置。以黃泥为料，白石爐底搗爛，傅面燒数日遂成堅硬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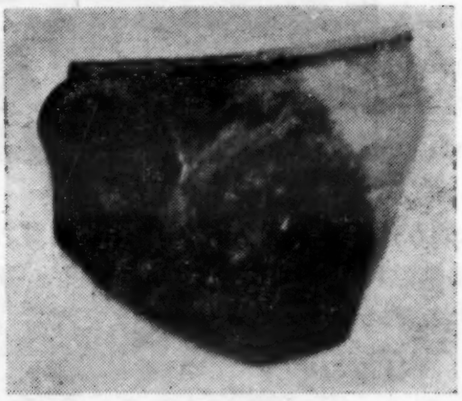
圖二　鉄砧山古窯址的碎片堆積層

圖三　堆積的陶璧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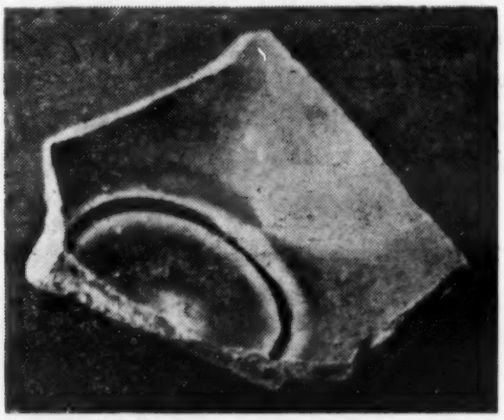


圖四　四耳罐口部

圖五　碗、盤殘片



圖六　帶醬色斑双耳罐殘片



圖七　淡黃褐釉开片瓷片

大小器皿各有制造。有小窰数座，造香爐、香筒、痰盒、春凳、洗臉盆諸器具；惟造黃綠二色亦佳，不及大窰耐久。环鄰数縣亦頗暢銷"。由这三段記載，可以看出这个古窰址很早以前就在大量燒造四川民間所用的生活器皿。过去談中國陶瓷藝術的一般只限于几座精美的名窰，但要从物質資料上來眞正了解和研究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藝術創造，这类"無名气"的民窰是頗值得我們今天重視的，希望能引起同志們的注意与研究。

(上接第45頁)

由方形呈現圓形起，往上 1.4 米高处的厚度为一个磚長。(2) 再往上至券頂口的厚度只有半个磚長。

墓道長 20 米，中寬 1.26 米。

墓室內積滿了淤土、乱磚，当清理到底时，發現左側有磚砌長 2.2 米，寬 0.74 米，高 0.12 米的棺床，床上鋪一層白石灰，石灰痕迹長 1.59 米，寬 0.42 米，这尺寸大概也是棺的形狀。

墓室中殘留遺物：1. 殘平頂陶俑一件；2. 殘陶灯一件，柄高 13 厘米，直徑 4 厘米，座高 6 厘米，底徑 12 厘米。

陶器为青灰色，火候均高。

根据我們对晋墓發掘材料的整理，从这座墓的結構形制，以及它和晋墓群之关系等方面判断，这墓应为西晋晚期南北朝时代的墓葬。

（执筆人　翟繼才）

丹陽六朝陵墓的石刻

朱　偰

六朝陵墓的石刻，在整个中國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丹陽六朝陵墓的石刻，在六朝陵墓石刻中，又独放异彩。在丹陽附近，有齐、梁兩代陵墓十处；陵墓前面，都有石麒麟（天祿或辟邪）以及神道石柱等石刻。这些石刻，离現在已有一千四百年到一千四百七十多年，比起有名的唐太宗昭陵六駿，还要早上一二百年。它們气魄雄偉，姿势生动，而且雕刻精美，装飾繁富，代表南方优雅的情調，的确是我國雕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原來齐、梁二代的統治階級，都是南蘭陵人，而当时所謂南蘭陵，便是現在丹陽地方，所以齐、梁兩代帝王陵墓，都集中在丹陽附近。不过因为地点比較偏僻，到那里去的人比較少，所以丹陽的六朝陵墓，便不及南京近郊的六朝陵墓有名。作者对于丹陽六朝陵墓，曾不只一次加以調查，并曾一一加以測量和攝影。現在特寫本文，介紹如下：

丹陽的齐、梁二代陵墓，共有10处，就其地理上分布情形而論，凡有五組：

(1) 丹陽东北30里獅子灣、趙家灣为一組，有齐宣帝蕭承之的永安陵，齐高帝蕭道成的泰安陵。

蕭承之是蕭道成的父親，他生前并未做皇帝；他的事迹，見齐書卷一高帝本紀。根据齐書卷一紀載，他死于公元447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24年），到了蕭道成即位，改元建元（479），追尊他为宣皇帝，妻为孝皇后，陵为永安陵。这样看來，永安陵的落成于公元479年，或系就旧墓加以擴大，而崇其体制。这是丹陽附近齐、梁陵墓中最早的一座墓葬，离現在已經有1477年了。

根据元和郡縣志卷第二十六："南齐宣帝永安陵在縣（丹陽）北28里，高帝父也，追尊曰宣皇帝。"又根据清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齐永安陵在縣北三十里尚德鄉，高帝父皇帝及陈皇后所葬。"現在一般所傳說的永安陵，在胡家桥北獅子灣，正当丹陽縣北（略偏东）30里，与丹陽縣志所載相合，与元和郡縣志所載，亦相去不远。所以我們可以断定它是蕭承之的永安陵。

陵前遺物，僅存石麒麟一对，右边的头上一角，还比較完好；左边的头部及頸部已經殘破，是从前鄉人因为迷信关系而加以打毀的。根据实測，石麒麟身長2.95米，胸寬1.23米，高度因半埋在土中，無法測量。二石麒麟相互之間的距离，是23米。至于陵的本身，早已犁为平地了（圖一）。

齐高帝蕭道成的泰安陵，在丹陽縣东北31里趙家灣。蕭道成本是宋朝的大將，后來篡宋，自立为皇帝，國号齐。他的事迹，見齐書卷一高帝本紀及南史齐本紀。他死于公元482年(齐高帝建元4年)，根据齐書紀載，泰安陵的营建，就在这一年陰曆4月，离現在已經有1474年了。

根据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齐高帝道成泰安陵，在縣（丹陽）北三十一里。"又根据清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泰安陵在縣北三十里。"今查泰安陵虽离开上面所說的永安陵不远，但它西边数百步，便有一座小小邱陵，翻过这座邱陵，才到永安陵，

圖一　齐宣帝蕭承之永安陵右麒麟

所以元和郡縣志31里之說，是比較有根据的。

陵前遺物，僅存石麒麟二，左右兩个，都已殘毀，因此也無从測量。陵的本身，也早已不知去向了。

(2) 第二組在丹陽东北36里經山东南鶴仙坳，現存齐景帝蕭道生的修安陵。

蕭道生是蕭道成的次兄，他生前并未做皇帝，他的事迹，見南史始安貞王道貞傳。他死的年代無可考，根据齐書明帝本紀記載："建武元年（495）冬十一月壬申，追尊始安貞王为景皇帝，妃江氏为懿后，别立寢庙，号陵曰修安。"則修安陵的定名及擴建，当在公元495年。

根据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齐景帝道生修安陵，在丹陽縣东北二十六里（二字大概系三字之誤），明帝父也，追尊为景皇帝。"又根据清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修安陵在縣东北三十六里經山。"所記載的里数，和現在一般所指的修安陵正合。

陵前遺物，僅存石麒麟二，左边的双角，右边的一角，都很完好，雕刻异常生动。根据測量，石麒麟身長2.65米，胸寬1.10米，高度因半埋土中，無法測量。至于陵的本身，因靠近山坡，还隱隱有

圖二　齐景帝蕭道生修安陵左麒麟

隆起的痕迹（圖二、三）。

(3) 第三組在水經山的北麓，离丹陽縣城約40里，有东西二墓，相去里許，人名都不可考。

按水經山，是經山东南的一座支山。根据清乾隆丹陽縣志："經山，在縣东北三十五里，昔有异僧講經于此，故名；上有金牛洞，一名金牛山。今土人名經山为旱經山，而以其东南五里之支山为水經山。"这是水經山得名的起源；但是关于这兩座古墓，却从來沒有人提及过。

根据二墓墓前的石辟邪看來，是屬于王墓的制度，所以很有可能它們是齐代二个廢帝的墳墓。据我推測，东边的一墓，可能是齐前廢帝郁林王（蕭昭業）的墓；而西边的一墓，則当是齐后廢帝海陵王（蕭昭文）的墓。二人都是齐武帝的孙子，文惠太子的兒子，又先后于公元494年（齐明帝建武元年）被殺，都葬以王礼（見齐書郁林王本紀及海陵王本紀）。齐代的陵寢都在丹陽，則二人归葬丹陽水經山下，当亦在意料之中。

不过这里有一个不同的記載：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五，說："慶曆中，予在金陵，有甕人以一方石

圖三　齐景帝蕭道生修安陵右麒麟

圖四　齐武帝蕭賾景安陵右麒麟

顎肉，視之，乃海陵王墓銘，謝靴撰。”（按齐謝朓碑撰有海陵王墓銘，文見藝文类聚四十五，亦見夢溪筆談十五）。于是嚴观江寧金石記，遂說海陵王的墓，是在江寧（文見沈括夢溪筆談），所以这兩个墓究竟是誰的，还有待于將來的發掘來証明。

墓前遺物，各有石辟邪二，偏东的一墓，石辟邪身長2.10米，胸寬0.50米，二辟邪相距14米（圖九）；偏西的一墓，因为石辟邪全埋土中，僅露头部，所以無法測量。二辟邪相距，也是14米。石辟邪的規模，比南京近郊六朝諸王墓要小得多了，大概是兩个廢帝被殺之后，草草营葬，無人替他們撐場面的緣故。

（4）第四組在丹陽城东32里戎家村北三姑庙，現在僅存齐武帝蕭賾的景安陵。

蕭賾是蕭道成的長子，繼道成即皇帝位，改元永明。他的事迹，見齐書武帝本紀及南史齐本紀。他死于公元493年（永明11年），根据齐書記載：“永明十一年七月，上（指武帝）不豫，戊寅，大漸，詔曰：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指武帝后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是日上崩。九月丙寅，葬景安陵。”則这一座墓葬的营建，当即在公元493年。

根据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齐武帝賾景安陵在縣（丹陽）东二十二里。”但是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却作31里。按今本元和郡縣志把32里誤作22里；輿地紀勝所引3字不誤，却又誤作31里。今考清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景安陵在縣东三十二里，武帝所葬。”这和元和郡縣志原文相合，和現在实測里数亦合。

可是这里有又一种不同的說法，清朱孔陽歷代陵寢备考，說“齐廢帝东昏侯冢，在丹陽縣东三十一里，或疑此陵即是。”按东昏侯是亡國之君，且被廢封为侯，死后也以侯礼下葬，决不能僭用麒麟；而且亡國之君的墓葬，規模决無如此之大，所以朱說是靠不住的。另外又有一个張璜，著有“梁代陵墓考”，把齐武帝陵，位置在丹陽东北25里的荷花塘。顯然，他是把齐明帝的兴安陵当作齐武帝的景安陵了。

陵前遺物，僅存石麒麟一，头上双角，系位在陵的左边；至于右边的一个，据当地人說，已經陷入池中。在池塘的西北部，我还發現有石礎一个，可能是神道石闕的遺址。根据实測，石麒麟身長2.90米，高2.40米，前胸寬1米，在丹陽現存各种石獸中，是比較高大的一个。除了麒麟的下顎已被击損外，其余都还比較完好（圖四）。

（5）第五組在丹陽城东略偏北24里尚德鄉东城村。有齐明帝蕭鸞的兴安陵、梁文帝蕭順之的建陵、梁武帝蕭衍的修陵、梁簡文帝蕭綱的庄陵。这

圖五　齐明帝蕭鸞兴安陵右麒麟
（長3.10、高2.60米）

圖六　梁文帝蕭順之建陵石闕
（前半已被取字劈取，頂上圓盖墜地）

四处陵，是丹陽齐、梁陵墓的重点，所存石刻，在文献上固然極有价值，在雕刻的气魄偉大及刀法純熟、作風細致、裝飾繁富上看來，都独放异彩。現在分別介紹如下：

蕭鸞是齐始安王蕭道生的兒子，繼廢帝海陵王为帝，做皇帝不到5年(494—498)。他的事迹，見齐書明帝本紀及南史齐本紀。根据齐書紀載，他死于公元498年，兴安陵的营建，就在这一年陰曆7月。

根据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齐明帝鸞兴安陵在縣（丹陽）东北二十四里。"又根据清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兴安陵在縣东北二十四里尚德鄉，明帝及敬皇后刘氏合葬。"現在的里数，与志書上的記載正合。

陵前遺物，僅存石麒麟一，头上独角，系在陵的右手。左边的一个，应該头上是双角，但已不知去向。現存的石麒麟，前腿已缺其一，可是仍然凝重地矗立着，姿态异常雄健（圖五）。

第二个是蕭順之的建陵，在丹陽縣东略偏北24里，其地又名三城港，在上面所說齐明帝兴安陵北面数十步，二陵相去不很远。蕭順之是梁武帝蕭衍的父親，他生前也并沒有做皇帝，他的事迹，見梁書卷一武帝本紀。根据梁書紀載，公元502年（梁武帝天監元年）陰曆閏4月壬寅，追尊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妻張氏为献皇后，陵为建陵。他的陵墓的营建和擴大，大概就在这一年間。

根据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梁文帝順之建陵在縣（丹陽）□二十五里。"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也載："梁太祖文皇帝神道碑，在丹陽縣之三城港文帝陵下。"又根据清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建陵在縣东北二十五里东城村，武帝父文帝及献皇后張氏所葬。"地方志所記載方位和里数，大致和現在实际情况相合，只是現在居民說是24里，方志記載說是25里。

陵前遺物，有石麒麟一对，都已經傾倒，它們的背部雕刻，非常繁富。又有神道石柱二（圖六），异常高大，柱身作隱陷的直刨稜紋（普通叫做瓜稜柱），上面原有圓盖，盖頂上有小辟邪，盖下面前上方，原有神道碑。在滿清末年（1909），丹陽縣署因为要"保存"古物，遂粗暴地把左石柱神道碑用斧劈去，移置于丹陽城內公園，右闕頂上圓盖墜地，弃置田間。石闕下面，各有柱礎，浮雕二蝦蟆相向环繞之形。另外在石麒麟与石闕之間，有二石礎，上

圖七　梁文帝蕭順之建陵神道碑
（有正刻及反刻二方，此系正刻）

面不知何物，已不存在；又在石闕后面（西边），發現有龜趺一对，这当然是碑座，惟左右二碑則已不知去向了。"

移置城內丹陽公園的兩塊神道碑，在陵前的时候，原为左右相向，左为正文順讀（圖七），右为反文逆讀。这和南京所發現的六朝王侯神道石碑左右都是向前的，体制上有所不同。宋朝以前，一般学者都把这兩塊碑考錯了，以为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神道碑。如宋欧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按宋書，文帝为元凶邵所弑，初謚曰景，庙号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号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又宋陸游入蜀記，也誤認梁文帝陵为宋文帝陵，又誤認齐明帝陵为梁文帝陵（他記載道："余尝至宋文帝陵，道路犹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类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实际是麒麟——尚存其一，为籐蔓所纏，若紮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实际上宋文帝長寧陵，明明是在南京（唐許嵩建康实錄及元和郡縣志都說是在上元縣蔣山东南），与此陵毫無关系。

第三个是梁武帝蕭衍的修陵，也在丹陽縣东北24里东城村，較上面所說的修陵略为偏北，离皇業寺不远。蕭衍是梁朝的开國皇帝，他的事迹，見梁書卷一至卷三武帝本紀。根据梁書卷三紀載："太清三年（549）五月丙辰，高祖（指蕭衍）崩于淨居殿。十一月乙卯，葬于修陵。"大概修陵的营建，也当在这一年以前。因为梁書高祖郗皇后傳，有一段記載，說是郗皇后死于公元499年，地点在襄陽官舍，同一年归葬丹陽东城里山；蕭衍即位，追尊为皇后，陵曰修陵。又根据梁書武帝本紀及建康实錄，蕭衍生前，曾屢次親到修陵。可見修陵的营建，已早在第6世紀的初期即已开始了。

圖八　梁武帝蕭衍修陵左麒麟

陵前遺物，僅存左边的石麒麟一，头上双角（圖八）。这只石麒麟，是丹陽齐梁陵墓石刻中最高、最大，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个，态态雄偉，气魄偉大，远远望去，竟像是一头高傲的猛獸，在大地上迈步前進。而且在雕刻上講，刀法純熟，作風豪迈，也是上乘作品。根据实測，石麒麟身長3.32米，高2.70米，腰圍2.40米，腿圍1.18米，腿長65厘米，尾粗73厘米。陵的本身，尚未全平。

圖九　前廢帝蕭昭業墓(?)石辟邪

第四个是梁簡文帝蕭綱的庄陵，也在丹陽縣东北24里多的东城村，較上面所說的梁武帝修陵，又略为偏北。簡文帝蕭綱，是蕭衍的兒子，他的事迹，見梁書簡文帝本紀及南史梁本紀。根据梁書記載："大宝二年

(551) 十月壬寅，太宗（指蕭綱）崩于福省；明年（552）四月乙丑，葬庄陵。”則庄陵的营建，大概当在这一年。

根据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梁簡文帝綱庄陵，在縣（丹陽）东二十七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九：“梁簡文帝陵有麒麟，碑尚存。陵有港，名曰蕭港，直上陵口大河，去縣（丹陽）二十五里。”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七：“梁簡文帝庄陵，元和郡縣志云：在丹陽縣东二十七里，地名三城港，有石麟高丈余。”最后根据清乾隆丹陽縣志卷十九：“庄陵在縣治东二十七里，梁簡文帝及簡后所葬，地有港，名蕭塘港（即蕭港），前有石麒麟，高丈余。”又卷二：“蕭港在縣东二十七里皇業寺前，直入陵口。”这里有兩种說法：一說去丹陽縣27里，一說去縣25里。查皇業寺現在还在，离庄陵、修陵不过半里，去縣城25里，則以25里之說为是。

可是因为太平寰宇記的記載，后人發生一个誤会。張璜梁代陵墓考云：“梁簡文帝陵在陵口或蕭塘，丹陽东南二十里，陵口車站西南方。”查陵口車站南面，当蕭港入大运河之口，确有石麒麟一对，都已傾倒，因为久經風化，已經模糊不可辨認。而且兩个石麒麟之間，是一条大河，决不可能是墓前之物。按齐、梁二代，都建都建康（南京），而陵墓則在丹陽，当时公卿謁陵，都从秦淮河上溯破崗瀆，过二十四埭，到了丹陽，再从陵口進蕭港，以上至各陵。所以清乾隆丹陽縣志兴安陵条，引輿地志并加按語說道：“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蘭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西为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夾道，垄戶守之。四时公卿行陵，自方山下乘舴艋，經此入蘭陵，升安車以至陵所，旧迹犹在。”这样看來，陵口运河北岸蕭港东西的一对石麒麟，乃是陵墓区進口地方的一种裝飾品，而决不是蕭綱的庄陵了。

圖十　美國帝國主义分子盜去的六朝陵墓石麒麟

至于庄陵陵前遺物，僅存右边石麒麟一只，而且已經全毀，只存一部分，已看不出來是麒麟身上的那一部分了。

現存六朝陵墓石刻，为我國雕塑史上的瓌宝。帝國主义分子，曾千方百計，企圖加以盜窃。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倫敦举行“中國藝術國际展覽会”，內有六朝陵墓石麒麟一件（圖片編号2361），四腿及尾已断，僅存头部及軀壳，系美國送去参加展出者。观其作風，雄渾沉着，顯系六朝初期刘宋时代作品，被美帝國主义者所盜去的。这是祖國文物中的瑰宝，我們將來一定要向美帝國主义算清这一筆賬的（圖十）。

六朝的陵墓石刻，在南京的有十八处，在丹陽的有十处，一共二十八处，是我國雕塑史上宝貴遺產，而且經过一千四、五百年之后，还保存得比較完整。我們論及中國南北朝的雕塑，大多以佛像雕塑为主要材料；而这一大批石刻，則是佛教藝術以外的大宗作品。有了它們，上可以探討漢代的石刻，下可以观察唐代陵墓的各种石獸，其意义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应該妥善加以保存，尤其希望关心文物的讀者，共同加意保护。

徐州云龍山石佛介紹

張 寄 卷

徐州云龍山兴化寺內石佛，是一座有3丈2尺多高的半身像，当初是就山岩的巨石雕刻成的，后人又在石佛兩側依着自然的峰崖造了許多一排一排浮雕佛像，現在虽然有些殘缺，但以保留下的部分看，古代劳动人民是發揮了高度的藝術性与創造性的，是值得愛护和研究的。

关于这个石佛的歷史資料，在旧五代史卷十二朱友裕列傳里曾有这样記載："景福元年(唐昭宗年号，公元892年）总大軍伐徐（时溥），时朱瑾領兗邦之众，为徐我外援，陣于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击之，斬獲甚众。瑾領殘党宵遁。"同書卷十六，葛从周列傳里也寫着："景福二年二月与諸將大破徐兗（徐·时溥，兗·朱瑾）之兵于石佛山。"新五代史关于石佛山的記載与上述文字相同。石佛山即現在云龍山。山在当时既以石佛为名，說明这以前此地就已經有了石佛像。

这个石佛像是什么年代雕刻的？关于这一問題，宋朝苏頌潢的集子里有一首魏佛狸歌曾这样說："魏佛狸，飲泗水，……卷舒三軍如指使，奔馳万夫鑿山嘴，云中孤月妙無比，……青蓮湛然俯下視。击鉦卷旆抽行营，北徐府中軍吏喜。度僧筑室依云烟，俯視城郭众山底。"照着詩句的次序解釋：第一句是指北魏拓拔燾（太武帝）的小字，第二句是說他南下侵略來到徐州（当时泗水流經徐州城东面），第三句形容他帶的軍隊，第四句是說他役使劳动人民在山岩施工雕鑿，第五、六句形容刻成的佛像，第七句是說他撤兵回國，第八句形容徐州守將（刘宋）的情况，第九、十句是說修建寺院，高踞山巔。这首詩对石佛的彫造提供了很好的說明。賀方回在和張謀甫游石佛山詩序里也寫着："南北史彭城圖經：魏太平眞君十一年南侵，至瓜步，筑宮駐蹕，声欲渡江，……明年（按魏改元正平）春，旋师渡淮，复留連徐方，再旬始北去。在彭城南五里（按五当作二或三——筆者），因山鑿佛，高十許丈。"从这兩段文字中，我們就可知道云龍山石佛是北魏拓拔燾正平元年，即刘宋元嘉28年（公元451年）徐州劳动人民雕刻的，到現在已經有1503年的歷史了。

在石佛像完成之后，歷代的劳动人民选擇了兩側的懸崖削壁繼續進行彫造，据造像旁的題字，有：

1. 北魏太和10年（蕭齐永明4年，公元486年）7月造像；

2. 唐开元22年（公元734年）5月造像；

3. 唐乾元3年（即上元元年，公元760年）4月造像；

4. 唐元和13年（公元820年）造像；

5. 宋政和7年（公元1117年）造像。

上述造像的題字里，有的刻着为皇帝、皇后求福，有的为自己的父母、妻子求福，有的为河西行人求保佑；其官銜有大將軍，有輕車都尉，有左金吾衛；惜人名模糊，不能辨認。雕刻的形式有山峰，瀑布，洞穴，岩竇，各种各样的佛像錯落布置其間，成为"龕山为宇，削峰成相，四壁巍峭，阿罗漢諸天龍女歷落岩竇間，天然如画（清康熙14年祖文明記文）的巨观。歷代的天然和人为的灾害，給文化藝術遺產帶來了沉重的損失，現在云龍山石佛像兩側的浮雕造像，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尚有72处，250余尊。

大部分佛像兩旁的題字是唐代的，但在唐代題字中間另夾着更古老的一些小字，斷斷續續，隱約可見，可能唐代題字还是后刻，更有較早的刻字在隋代以前。

这里有座石佛殿，原名大雄殿（僧杲慶記文），規模頗大，据有关碑記，說是明洪武31年（公元1398年）住持僧勝吉为了复盖佛像修建的。到了宣德己丑（8年，公元1433年）（按己丑当是癸丑——筆者）殿燬于火，兩側造像遭到嚴重損失，幸而石佛

巍然独存。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僧文安重修，擴大原來大殿为5間，高4丈5尺，同时裝修石佛兩側的造像，飾以金碧。成化23年(公元1487年)又由太監高瑛倡行續修（以上皆錄自正統元年喻則成及成化23年吳瑞記文)，歷正德、万歷，清康熙、乾隆，各个时期均有續修。咸丰年間（公元1851—1861年）曾國藩曾以徐州作为向太平天國進攻的軍事基地，由于"兵革迭兴，方丈为駐軍之所，名山为选將之場"(光緒21年僧杲慶記文)，而这座巍峨壯丽的石佛殿，因此受到駐軍的嚴重摧殘。日寇侵占时期，常住敌兵，每以投擲石子打掉造像为嬉戲，簷廊木柱被馬齧爛，到現在还留着斑斑伤痕。日寇投降后，國民党反动派繼承了日寇的衣鉢，在云龍山修建碉堡、炮壘，作为向解放区進攻的据点，破坏得石佛殿一片荒凉。然而古代劳动人民創造的文化藝術遺產，終于度过了黑暗的長夜，徐州解放后，受到人民和政府的保护。

从明正統元年起到現在，經过517年还倖存的这一古代木構建筑——石佛殿，樑、柱、門、窗、天花板等部分尚完好。江苏省文化局、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对云龍山石佛像及石佛殿極为关心和爱护，曾進行了多次調查与了解，1954年并撥款給徐州市文教局設計整修，現已恢复旧观。

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会

我会配合陝西省地方國营澧桥磚厂的基建工程，在該厂的晾坯場起土区，進行了以西周遺址为主要对象的文物清理工作。

这次工作开始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結束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除因降雪、地冻停工及假日外，共工作了五十六天，發掘面積約四百八十七平方米。

这个磚厂位于西周酆、鎬二京遺址范圍以內，厂址所在的高地上布滿了西周及其以前的古代文化遺迹。而在晾坯場的下面則有着保存得極好的周代遺迹。

根据清理中的發現及对这些發現的初步認識，我們对这个遺址作如下的說明：遺址的最上層为近代擾乱層，其下为漢代擾乱層，再下为周代遺址灰層，除直接与周代灰層相連的灰坑外，还有一些灰坑的坑口上墊有一層黃土，和灰層隔开。从这些灰坑所出陶片上的紋飾初步观察，可以認为它們是同屬周代，而时間上略早于灰層。而在一处探方中的周代灰層下面，發現了一个灰坑，在它的坑口部所墊的黃土上，我們發現四个柱孔、燒土地面和一个有炭灰的灶坑，根据以上情况，我們認为这里是一个古代人們曾經居住过的房子的殘迹。这个房子就利用了原來的灰坑壁做成了圓形的矮牆。而在該厂輪窖地基的施工中，曾發現过一个圓形的燒陶器的窖和許多蚌器。

此外，在我們所开的几个探方的不同層位上發現了七座墓葬，其中有兩座周墓，五座唐墓，这些墓和灰層、灰坑有着明顯的复压与打破的关系。

遺址的出土物極为丰富，在不同的層位中出的东西包括了石、蚌、骨、陶、銅、鉄器及卜骨等四百二十六件，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破片。应当特別介紹的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这个遺址的周代灰層（T4.⑤）中我們發現了一片刻有兩行文字的殘骨，这塊刻字甲骨应当是中國考古史上的第一片周代刻字甲骨。这塊字骨用牛肩胛骨制成，大部已殘，現存者为肩胛骨之柄部。長13厘米、寬6.5厘米，背面靠一边有圓形鑽孔三个，其中一个已殘。鑽孔直徑約1.5厘米，深約0.9厘米，孔壁垂直，平底。靠一边有鑿一道，与骨長同方向，極細，不及0.1厘米寬。灼痕不顯。正面均有卜兆。在卜兆附近有刻划極細的文字兩行。一行与骨長同方向，一行与骨寬同方向。

从这次初步清理工作中所提供的情况來估价这个遺址，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它的保护与發掘是值得特別慎重考慮的。（圖見第40頁）

关于济南近郊北魏隋唐造像的补充意見

荆　三　林

"文物参考資料"1955年第9期于筆者"济南近郊北魏隋唐造像"一文（第27頁末行）中附編者按語云：

"为什么較晚的这些石崖，逐步的靠攏济南市？为什么較早的北魏石崖不这样靠攏？据山东文物管理委員会同志的意見，有無石崖造像似乎只是一方面，他們覚得更远的朗公谷(柳埠)是个中心。它向南向北發展。这是向北發展的，因而由远及近。——編者"。

在这里面包括兩个問題：其一，是济南近郊造像之由远及近的原因問題；其二，是济南近郊的造像是否从朗公谷(柳埠)作为中心發展而來的問題。这兩个問題都关系着对济南造像整个看法的环節，是非常的重要，因此特再补充如下的兩点意見，尚希同志們指正。

一、关于济南近郊造像之由远及近的原因問題

关于这一点，首先我說明黃石崖、玉函山、千佛山、佛慧山四处之距济南的远近情况是：北魏的黃石崖造像距城为5華里（据歷城縣志載），隋初的千佛山造像距城較近，亦为5華里（同上書載），隋中叶的玉函山造像距城最远，为府南20華里(同上書載)，唐代造像的中心地佛慧山造像距城比黃石崖更远为10華里（同上書載），其分布如附圖。从这些上面給我們說明了一点，就是在元魏到隋初的造像是由远而近的，隋中叶之后的造像是由近及远的。这一个排列非常明顯。因此我認为这由远及近即向济南市靠攏的一点，不能單独成为問題，也不是本問題的中心。如然，則隋代的千佛山至玉函山，佛慧山之"由近及远"也应包括在內。故它的中心应放在这四处造像的关系究竟如何的上面。很顯然，济南近郊的造像，最早是歷山的黃石崖，而千佛山，玉函山、佛慧山、龍洞、东佛峪等地，都是圍繞在它的周圍，在时間上又都是按序發展，这一点又是非常的明顯。因此，我認为它們的發展是一个系統。

关于黃石崖到千佛山造像的轉移原因，我說是"由于黃石崖那个地方已經沒有了可以繼續造像的石崖"。这个說法是不够全面。有無石崖可以造像，只是使不能再在黃石崖造像的原因，而不是使当时造像必然轉向千佛山靠攏济南市的原因。因为黃石崖即使無崖可以造像，还可以向附近的石崖上去造，不一定要向济南市靠攏。因此，这个促使靠攏的主要原因，不只是有無石崖，而是由于东魏之后經北齐、北周到隋代之一段济南局势發展的結果。

关于这一發展的經过，我在"玉函山之宗教史迹"（山东师院47期）一文中，說的比較詳細，節錄如下：

"其一：在时間上說，黃石崖造像是始于北魏正光4年（紀元523年）至东魏兴和元年(紀元539年)。即比玉函山造像早42年，中經北齐北周兩朝。按千佛山造像始于隋开皇元年(紀元581年）止于开皇15年（紀元595年），是較玉函山造像早起4年，早止5年。开元寺造像多唐代物，是其比玉函山为晚。如再窺之当时的歷史，据文献的記載，东魏、北齐、北周一段，济南(时为齐州)地方大乱，民不聊生，隋开皇元年天下初定，到开皇5年天下已經大定。由这些上面可以看得出來，黃石崖、千佛山、玉函山等地造像的歷史是一个系統，其階段是随着当时齐州的社会經济之發展而發展的。即最初都在黃石崖造像，俟后由于荒乱，并又有北周的毀滅佛像，突告停止了42年。隋开皇元年天下初定，乃在离城較近处造像，繼之天下大定，故又向較远的玉函山發展了。与此同时，又开發了开元寺，到唐代造像即集中于开元寺，故玉函山的造像也就到开皇20年为止。这个發展是和北魏至隋唐間齐州的發展歷史分不开的。其二：从造像的人來說，黃石崖的造像是地方長官及僧尼來建造的：如齐州長史乞伏鋭，魏郡丞姚敬遵，及帝主元氏，僧法义等。而玉函山造像者，全部是一般的佛教信

徒，这一点和千佛山的造像有点接近，这一点反映着佛教信仰逐步的普遍化了，已由帝王貴族大臣而漸傳布到民間。

其三：由于时間的不同，經济条件的不同，所以表現在造像的技術与布置上都有些顯著的差异。"

二、关于朗公谷（柳埠）是否是造像的一个中心向北發展到黃石崖、千佛山的問題

关于这一点，我們应当首先考察一下朗公谷的造像。据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說，在柳埠最早的造像是神通寺东四門塔內的楊口叔造像，它的銘文是："武定二口口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冠軍將軍司空府前西閣祭酒齐州驟大府長流參軍楊口叔，仰为口口口，十一日，敬造石像四区，願令亡者生常值佛"。參照"山左訪碑錄"，知是武定二"年"，楊"顯"叔造像。按"武定"是东魏孝靜帝的年号，武定2年是公元544年。武定这个年号，还在元象及兴和之后。黃石岩造像最晚在兴和二年，是公元540年。是柳埠朗公谷的造像起始比黃石崖造像的終止还晚4年。因此朗公谷造像即使为一个中心的話，它也不会向北發展成为比其早20年的黃石崖造像，这一点可以肯定山东文物管理委員会同志們的說法是不正确的。如果可以覚得黃石崖造像是从朗公谷造像發展而來，到不如說柳埠朗公谷的造像为繼黃石崖造像向前發展比較妥当。

济南近郊造像分布圖（參照歷城縣志原圖）

柳埠的朗公谷在唐代是一个造像的中心，这一点我們是承認的，而且那里有最大規模的千佛崖，表現着最优美的雕刻藝術，远在佛慧山开元寺造像之上。据它的造像銘文有：唐武德口年（武德是自公元618—626年）的僧沙栋造像、貞观口8年（公元644年）的僧明德造像、永徽口年的千佛崖造像、顯慶2年（公元657年）齐州刺史刘元意造像、同年的南平長公主造像、顯慶3年（公元658年）青州刺史趙王福为太宗文皇帝的造像、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的趙昨造像。此外題記二三十个，虽無年月，大都是唐代遺物。就这些題記來看，自唐高祖的武德口年至睿宗（武則天皇帝时）的文明元年，前后60多年，正是唐朝的盛时。造像者有皇族的南平長公主及駙馬齐州刺史刘元意等大貴族大官僚，以及僧尼等人，造像的紀念对象，有"太宗文皇帝"等帝王，因此决定了千佛崖造像規模的宏大及藝術的精美，而成为唐代造像的一个中心地区（即在全國來說，唐代的遺存中千佛崖也是有特殊价值的，远超过佛慧山开元寺之上）。但它这个中心的構成是在东魏之后，主要还是在盛唐这一階段（公元618—685年之間），俟后的發展自成一个体系。这是与济南近郊的造像体系不能混淆的，更不能說以它这一个造像为中心，向北發展到济南近郊構成了北魏的黃石崖造像及隋代千佛山造像。（在歷史价值來說，还是以黃石崖的北魏造像为首。）至于它們中間的互相影响关系，我們并不否認，当然不能把它們各个都孤立起來。

至于为什么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同志会產生这样的說法呢？据我們推測（当然不一定正确），他們是基于：第一，把石窟及摩崖造像的發展与佛教發达的歷史範統來看問題。因为朗公谷的得名由于西晋时曾有高僧"竺僧朗，京兆人"（高僧傳），"乃于金輿谷昆侖山別立精舍"（同上）。昆侖山就在現在的柳埠南，距济南市約75里。俟后到了隋代又于此建有神通寺，唐代的千佛崖又是在这一个地区开辟的。直到現在，犹有神通寺的存在，柳埠朗公谷是

有这样一段的歷史。在佛教史上來說，远在西晋末叶（約在公元300—316年間），僧朗就在这里設舍傳授佛教。但我們所研究的对象是石窟造像及摩崖造像，这石窟造像的藝術是就印度的支提建造藝術結合着中國的崖洞建造藝術而成的。摩崖造像是"就其山而鑿之"，（金石索句）的造像。这些在我國，据現有的物質材料來說，約始于苻秦时代，最發达的是在北魏。这就是說在中國西晋时还沒有造像的發生，如何会在柳埠構成一个中心呢？当然，石窟造像也是佛教發达史的重要史料的一环，这一点我們并不否認。但它只是一环，而不能說有佛教的地方或有了佛教就都必然有石窟造像，更不能把所有佛教傳播的地方硬与附近的造像都拉起关系。晋时僧朗并沒石窟造像。四門塔的建立造像是东魏末，神通寺的建立是在隋代，千佛崖的开發是在唐代，这是很顯然的史实。并不是因为它先構成了造像的中心，而向北向南發展。——向北發展为黃石崖造像的說法是不正确的，但不知他們所說的向南發展又如何？

第二，他們是根据政治区域來看石窟造像的系統問題。因为都屬于歷城縣，所以基本上先把这些造像發展的歷史看为一个，然后就覺得黃石崖的造像是由柳埠这个"中心"向北發展而來的。

如然：这兩种看法都不正确。我們应当以歷史的具体条件結合着現有的物質遺存來看，認为这些物質遺存——实物的歷史材料，都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都有它一定的社会經济背景，这样还未必会看的正确，更不可是抽象地覺得。

三、济南近郊造像补遺三則

1. 黃石崖的古建筑遺痕及磴道遺迹。

在黃石崖北魏摩崖造像的上首，有很多排列整齐的石洞眼，这些很顯然是当初架置梁椽的所在。由这些遺痕上，可以証明在最初造像的前面是有木構建筑物的。从此向下有一些石磴道的痕迹，断断續續直通向千佛山去，尤其在千佛山东南正面对黃石崖的一段石磴道遺迹最为明顯。如果站在黃石崖上望去，磴道兩旁的界石还相連成兩条綫，古道規模仍可看得出來。直到山半腰間，至此似繞山向北，达山陰隋代造像区所在地。这一条石磴道，很顯明是連接着黃石崖与千佛山。因此，可以推断它的年代是在北魏至隋唐之間，与黃石崖及千佛山造像同时，并由此，不难推知黃石崖造像与千佛山造像原是一个系統。

2. 开元寺的隋唐造像記殘石。

在开元寺东北山崖下，有一个石窟，內有造像七尊，其窟西壁上有一造像記，殘余如左列：

"口口
口口口淨口
一口流口口古「
大隋开皇口口口口「
师僧父母口口口口口口口"

由此可知开元寺的造像起始也在隋开皇年間，与千佛山、玉函山为同时。此外，在南崖造像的旁边，刻有經文及梵文咒語五处，似皆为唐代物。

3. 北宋造大佛头。

在佛慧山陰山巖間有一座偉大的造像，俗名"大佛头"。歷城縣志山水考二虽載："佛慧山，一名大佛头山，以巖半有石佛头故也，又名大佛山"。但在該書金石考及古迹考各篇中，都沒有提到这个佛头的來歷。此外各金石志書，即如較詳尽的"山左訪碑錄"及民國初年編的"續修歷城縣志"，对它都沒有記載，这是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因此，迄今一般人对这座偉大的造像还不得知其究竟。

經我們兩次考察的結果，在佛头的周圍發現有三个摩崖刻石。

第一个，在其东旁崖壁山上刻有双石塔，双塔之間放置着一个北宋景祐3年（公元1035）立的碑記，原文是：

"齐州大佛寺自景祐二年正月十五日，命匠人口三鐫大佛头，至景祐三年丙子歲六月戊申朔畢。……"（其下刻首事的僧尼信徒及工人名字約百余）

由这上面可以知道这一座造像是北宋的遺存，距今已是921年。雕刻的經过时間是1年零6个月。

第二个刻石是佛像的西壁，上刻"李思从……万曆丁未三月吉日重粧"。按"万曆"是明神宗的年号，"丁未"是万曆35年（公元1607年）。东壁刻有"大慈大悲"四字，末題"明李伯春題"。由此可知，在明朝的时候，曾經对这个佛像粧飾过一次。

第三个，外面的石門，門額刻着"大雄宝殿"四字，前面的年月是民國12年（公元1923年）修，由此可知这个佛像只有前面的大門是民國12年新增修的。

这个佛头保存还相当的完整，高1丈5尺，寬1丈1尺，容貌衣飾刻紋皆甚精巧。

論歷城四門塔的年代兼答荆三林先生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过去日本人关野貞說歷城四門塔为东魏武定二年建筑（公元544年），梁思成先生寫的"祖國的建筑"，也說为东魏，現在荆三林先生文中又同样提到塔的年代，因先論之。

塔在歷城柳埠神通寺东南附近，全为石建，势將傾塌，解放后經文管会修理保护。中加柱石、横梁，撐住塔頂，外加三道鉄箍，歪倒在地上的造像，都照原地位垫置起來，門楣也都修理。恐牧童等入內毀坏，封閉三門，留北門加鎖，由柳埠区公所掌管，随时为參观者开放。

在荆先生引的"山左訪碑錄"以前，清嘉慶时"山左金石志"、"寰宇訪碑錄"、"岱覽"諸書，已著錄四門塔內有东魏武定二年楊顯叔造像。像共四尊，与座不連，清末为古董奸商將有楊顯叔像記的佛座盜去，售于端方，見"陶齋藏石記"。現在只存北門內像座，有明代僧人刻字，余座俱失，四佛以重大幸存。塔內还有唐景龍三年无畏等造像，見以上各書，今亦佚失。

清代嘉慶以前，直到建塔时期，內中先后造像情况，現在無法推測。过去認为塔系东魏建筑，皆根据武定二年楊顯叔造像，我們的看法，有以下兩方面：

一、文献記載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南燕慕容德掩有兗州及青齐諸地，为他最后决策的，便是住在神通寺的竺僧朗，見晋書載記。山东通志通紀于是年書曰："德为沙門竺朗筑神通寺齐州"。唐代"續高僧傳"亦有同样記載，未署何年。"廣弘明集"載朗公答慕容德書，言为"兴造灵刹"，以时計之，通志大体近是。惟所謂神通寺，系隋开皇三年改名，初名朗公寺，見唐代集神州三宝感通錄。其实朗公在此說法已久，早有寺院，德只擴建或改建，后时因以并归于德（見下）。現尚存有兩座特建的古塔，一为龍虎塔，当是"續高僧傳"法瓌傳中所說隋仁寿时令瓌送舍利所建的塔；一为朗公塔，"岱覽"謂"塔制最古"，当是指的四門塔，惟叙述顛倒。四門一名固屬后起，即朗公寺、朗公塔，都和朗公谷一样（見下），也非最初名称；但它牽合了朗公，或系流傳有緒的古說。

二、塔內楊顯叔造像記，只說"敬造石像四区"，并未提到建塔。从全部建筑來看，在四門之中为一方形大石柱，各于柱的一面置佛一区，像和柱不屬一体，石質也不相同，似乎是楊顯叔就塔的空間方位來安置的。像記明言为亡考忌日所作，塔則沒有題記，顯然与楊顯叔無涉。

从以上兩方面联系起看，塔內的造像，只能証明东魏武定二年已經有塔，無法知道塔亦同年所建，也無法肯定最早的佛像安置情况。如果結合朗公塔

修理后的四門塔

一名，推測为朗公时期的古建，就須提前一百若干年。楊顯叔造像僅能說明像的絕对年代，似难連塔包括在內。若是这些造像毀坏失去，从清代嘉慶以來，只存現已佚失的無量等造像，能不能根据造記說塔于唐代景龍三年建造的呢？当然不能。那就能說現存的造像年代，不必等于造塔的年代。这是我們的疑問，願意提出來商榷。

以下就要引到荆先生所談的問題。我們認为山东在南北朝时期的造像，用北魏疆域名說，东为青州，西为齐州，現在济南市和歷城及其附近各縣，都屬齐州，今姑名为济南区。造像应該从屬于佛教的發展，这一区現在的遺存，在可能范圍內，也应当結合歷史文献來观察。从东晋到隋唐，恰好济南区有一僧众大集团，并有一位全國性佛教歷史人物，在很早的長期內总持这一区的佛教；因此，我們就注意朗公和他所在的柳埠。从南北朝兩方面記載來看，北朝是北魏时水經济水注，它說：

> "济水又东北，右会玉水。水導源泰山朗公谷，旧名琅瑞谿。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学淵通，尤明气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时沙門僧朗，尝从隱士張巨和游，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琅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即此谷也"。

南朝是梁代的高僧傳，它說朗公：

> "以伪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朗創筑房室，制窮山美內外屋宇数十余区。聞風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訓誘，劳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餽遺。后沙汰众僧，乃别詔曰：'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侖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兴，亦加嘆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百姓咨嗟，称善無極……。"

以上是兩段早期的史料。魏書釋老志說朗公与其徒众在此，北魏拓跋珪書以綿素等为礼。这封信和东晋孝武帝、秦苻堅、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南燕慕容德五封致朗公的信及四封复信，統見"廣弘明集"。它們多半在軍政方面求朗公指示方略，并各有餽遺，如孝武帝送五色珠像，苻堅送紫金数斤，供鍍形像等等。此外"高僧傳"还說："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于朗，并散营上下諸院十有余所，廊廷袤千有余間。……四百余載，佛像鮮荣如新造，……"。"三宝感通錄"也說："秦宋燕趙莫不致書崇敬，割縣租稅以崇福焉。故有高丽、相國、胡國、女國、吳

北宋大观四年彫造的四門塔模型和佛像（在神通寺千佛崖上）

國、昆侖、北代七國所送金銅像，朗供事尽礼。……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許歲，寺塔基構如其本焉"。

就以上資料，可以肯定朗公到柳埠是秦苻健皇始元年（公元351年），东晋穆帝永和七年。他的年齡，据"高僧傳"为八十五歲，生卒时期不可知，最晚在东晋安帝隆安三年还健在。那时为北魏天兴二年，早已通过苻秦。荆先生在这方面所提的朗公年代和由此引出的造像問題，似难同意。

我們的看法是这样：朗公为佛圖澄弟子，他由西方远到山东，是为了宣揚佛法，因而和隱士張巨和作風不同，一个常穴居，一个則大起楼閣。楼閣逐漸擴充，到慕容德时更輝煌起來，并非以前四十余年他在柳埠沒有寺院；沒有，便無法容納僧众，达不到傳法的目的。在慕容德以前，苻堅曾沙汰众僧，独对朗公特别下一詔書，說他"学徒清秀，昆侖一山，不在搜例"。那时不但早有寺院，并且是大的寺院，因而"高僧傳"說"內外屋宇数十余区"。这是朗公寺第一期情况。第二期便是他为慕容德服务，特别擴建或改建。到达隋唐时代，又建筑龍虎塔，并在千佛崖雕刻石窟造像等等，現在只是遺存了这些——当然不只这些，应該算第三期的發展。这就可以說：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柳埠有一座龐大寺

院，分数十余区，千有余間。四門塔所在地点，就現在形势看，是数十余区的一个区；而且是最近的区；我們結合第一、二期的修建工程來推，才有四門塔年代的怀疑。至荆先生把朗公寺改名的神通寺，說为隋代建筑，今可不論。

这就要問：在苻秦时期，誰給朗公的錢在此大起楼閣呢？当时南北朝一系列專制皇帝，都优礼朗公，但沒出錢，平民信佛的力量微薄，主要还是济南区那些統治者。慕容德时情况便不同，他給朗公的信說："使者送絹百疋，并假东齐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三宝感通錄"謂："燕主給以二縣租調，拜为东齐王"，亦即指此。奉高縣在泰安境，山茌縣在長清境，正圍繞着柳埠。这种封建时期的优厚待遇，不但擴建寺院，并且封王給租。他很了解：要傳播佛教，必須政治力量的支持，尤其是那时專制皇帝的重視。在这些皇帝們給朗公的信中，竟求一位"世外人"指示軍政机宜，絕非偶然。为慕容德决策，明見晉書，几乎可以說是一位政治僧人。苻堅的信說："今遣使人安車相請"，他回信不去。尽管他長住在济南区，先后就能借重南北朝一系列皇帝的政治力量，推动这一区佛教的發展，并且是大的發展。当地統治階級固然受到重大影响，即一般平民也都"咨嗟称善"。不但济南区，"高僧傳"說"聞風而造者百有余人"，"佛祖歷代通載"說"千里哲人競凑"；不但他地，連外國也來致送金銅像。很顯然，这时济南区的柳埠，已形成一大的僧众集团，由朗公領導，并总持这一区的佛教。

那时济南郡治已移歷城，朗公來山东傳法，为什么不在郡城近处建寺，要远到八九十里的柳埠呢？就朗公谷說：它面臨三川之一的錦陽川，即"水經注"上的玉水，風景幽美，比济南附近任何山区都好。同时柳埠也是歷城通泰安的大道所經，地轄南北，交通便利，因此朗公选擇了这一区域。

我們特别注意朗公，并不是說一位佛教歷史人物能决定佛教的發展，只是在發展中要看他能起的作用，并看这一僧众大集团所能起的作用。与朗公同时还有一位僧人叫支敦，也住在泰山，并未發生甚么影响。柳埠以西的灵巖，北魏时有一位法定，是他們的"开山祖"，寺院到唐代才發展起來。这就可以在济南区及其附近，从苻秦到清代，先后查看一下，从無一位在佛教傳播上起主要作用的僧人能和朗公比肩的，也从無一处龐大寺院和僧众集团，能与朗公寺媲美的。朗公的高足叫僧意，繼續主持这个寺院，直到唐代記載，还說"寺塔基構如其本焉"。这就看出济南区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应以柳埠为中心，其他寺院，尽管有各支各系，只是中心区的一环。要是寺院在朗公死后逐漸衰微，中心区改移在郡城附近如黃石崖一帶，隋代派法瓊送舍利，就可以在新的中心区建塔，不必建在破落的朗公寺，楊坚也不必替它改名。"續高僧傳"为唐代撰述，它說朗公寺"天下崇焉"，可見隋唐时期，还是保持中心区的地位。又說："三度廢教，無敢撤"，更証明了南北朝时期，它并未衰微或被毀坏。

既然这样，济南区的佛教，在柳埠以北的郡城及其附近，从整体來看，是与中心区密切联系的。現在虽不能說这一区的佛教，由朗公傳來，但是在文献上沒有早过他的。他以政治力量推动佛教，并有一僧众大集团，郡城及其附近都在总持以內，如果建寺造像，就可以說由中心区向北發展。朗公大約死在北魏前期，若是柳埠中心区地位，由他死后失去，在郡城附近另建立一中心区，則黃石崖一帶的造像，自然另为系統；但史实不是这样。这个史实，是結合佛教發展文献來看的。当时柳埠中心区地位，依然存在，而郡城附近，并未著錄一有名的北朝寺院，更找不到朗公或較次的人物和他們的大集团，因此說它是中心区的一环。

朗公寺距郡城較远，主要信佛的統治階級及一般群众，都在郡城区域，为免去奔波，自然能在近处建寺造像，便于瞻礼，这是容易了解的。但它無論在前在后，絕不能不受中心区的影响，甚至于还帶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于各种类型造像，是从屬于佛教發展的。全山东現在的遺存，沒有早过北魏的，但文献記載，則在北魏以前，沒有早过朗公寺的。所謂五色珠像、金銅像，那时自比石像華貴。我們無法肯定朗公寺前期僅有許多華貴造像，更不能根据現在的遺存，硬說寺中石造像始于东魏。即便始于东魏，郡城附近尽可以在它以前，雕造石窟佛像等等，那只是佛教發展中造型的同异，本不拘一。

由此可以看出：荆先生是專就郡城附近的石造像而言造像，也就是根据現在的遺存而言遺存，这固然是一种介紹文物方法。但若在可能范圍以內，結合文献記載，把現存的和不存的实物，以及人物、古建等等，作一稍为全面的歷史观察，也是应該的。

（下接第78頁）

介紹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古代音乐史料陈列室

王 世 襄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在数月前重新布置了古代音乐史料陈列室，采用按时代綜合陈列的方法，用实物、乐譜、書籍、圖片等圍繞着音乐史中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布置了陈列，有些处并用放送錄音來做配合。陈列的目的是企圖通过这些实物材料等說明中國音乐文化在歷史上的發展和成就。

陈列的时代从殷商起至清末止，分五个时期，連同序幕，共計六个部分。以下是各部分的概况介紹：

一、序幕

在序幕中錄引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中所教導我們的关于对文化遺產要批判接收的一段文字。此外陈列了兩个年表：中國歷史年表和中國音乐重要史实簡表。这兩个年表标明着該室的五个歷史分期。

二、殷商

在这一时期的陈列中，用当时的乐器和有关音乐的甲骨文字來証明我國在三千多年前音乐文化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陈列在最前面的是山西荆村發掘出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陶壎的照片。这說明殷代的壎，有它更早的歷史淵源。以下陈列殷代的壎、毓、半球形的磬、接近曲尺形的磬等实物或圖片；中國科学院發掘出土的虎紋大磬，也經制成模型陈列在这里。甲骨文字除摹制拓片及將有关音乐的文字，如磬、鼓、乐、舞等字放大摹寫外，还选用了几片甲骨卜辭來說明乐舞的应用及巫师与乐舞的关系。

三、周、春秋、战國

在这一时期的陈列中，所表現的是下列几个問題：先秦的音乐思想；周代在乐律方面的成就；乐器的發展；周代統治者的音乐机構和乐隊；周代的声乐。

在先秦的音乐思想陈列櫃中比較了儒家、道家、墨家三个学派对于音乐的不同看法。儒家思想对后代的影响最大，所以从公孙尼子的"乐記"中提出要点，譯成語体文。

周代在乐律方面的成就是輝煌的。七声十二律尽管在較晚的書籍中才有記載，应当是周代初年的發明。公元前七世紀时成書的"管子"寫下了在弦上求得五音的計算方法，比希臘的畢太哥拉斯（Pythagoras）早一百多年。这里陈列了"管子"中的"地員篇"以及說明它計算方法的算式。公元前四世紀时成書的"呂氏春秋"講到了十二律的算法，根据它的記載，画出了十二律上下相生的次序。

周代的乐器，根据現有的材料，知道已發展到八十多种，并出現了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依制造的材料來分类）的分类方法。在这里画制了乐器分类的表格，并在表格下面陈列八組乐器。当然，除了金、石、土三类外，其他五

泥南鼓　　明代制品

类乐器由于器物的难于保存，几乎找不到当时的实物。所以，革类的鼓只好用商代的双鳥饕餮紋銅鼓的照片來示意，絲类的瑟，只好用長沙出土楚瑟的模型；匏，竹等类，則只好用漢画象來表現，因为这些乐器現在还沒有找到比漢代更早的圖象。

周代的統治者有龐大的音乐机構，"礼記"的"春官"記載很詳。根据这項材料所制的表格統計，总人数达1463人之多(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沒有定額的人員)，乐官的等級，每級的人数，以及职掌等也可以比較容易从表中看出。"仪礼""大射仪"中所講到的堂下乐，宋陳暘"乐書"中的宮縣圖和堂上乐圖，都排列出了当时乐隊的位置。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战國宴乐漁獵壺，中國科学院在輝縣發掘出土的銅鑒，上面都有击鐘击磬的乐隊花紋，对当时乐隊的实际演奏情况有很好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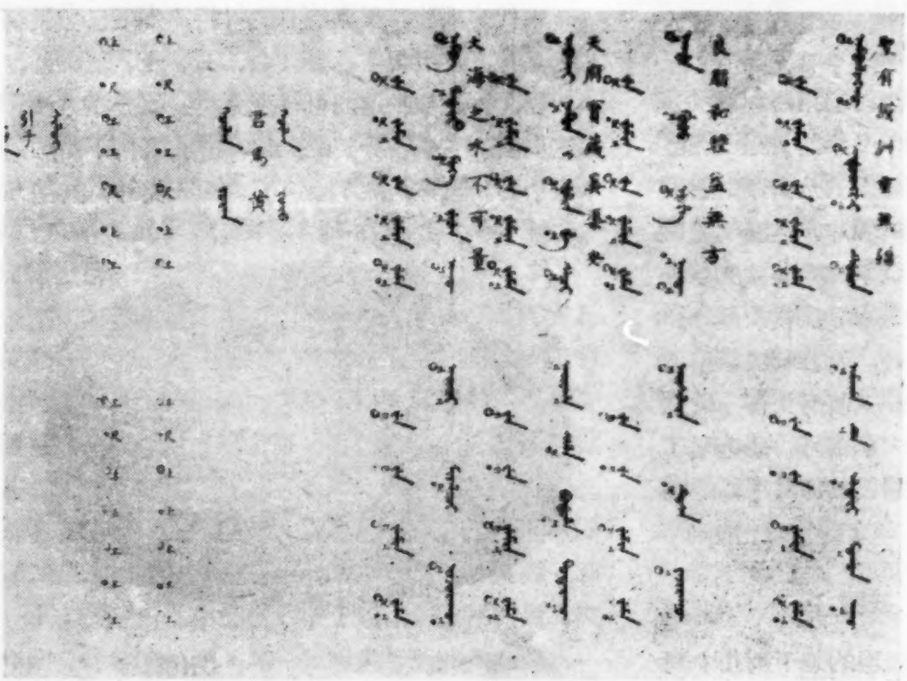
关于周代的声乐，陈列了中國第一部民歌选集——"詩經"，一旁放着当时采集民歌地域圖。"荀子"的"成相篇"用綫譜画出了推測的節奏，句法形式很像現在的快板。从楚辞"九歌"中选了与音乐关系最密切的兩節，抄錄了郭沫若先生的今譯，并用傳为宋李公麟所画的九歌圖作为它的插圖。

四、秦、漢、三國、晋、南北朝

在这一时期的牆壁上，懸挂了若干幅与音乐有关的圖画，其中包括漢画象拓片、敦煌及麥積山的北朝壁画摹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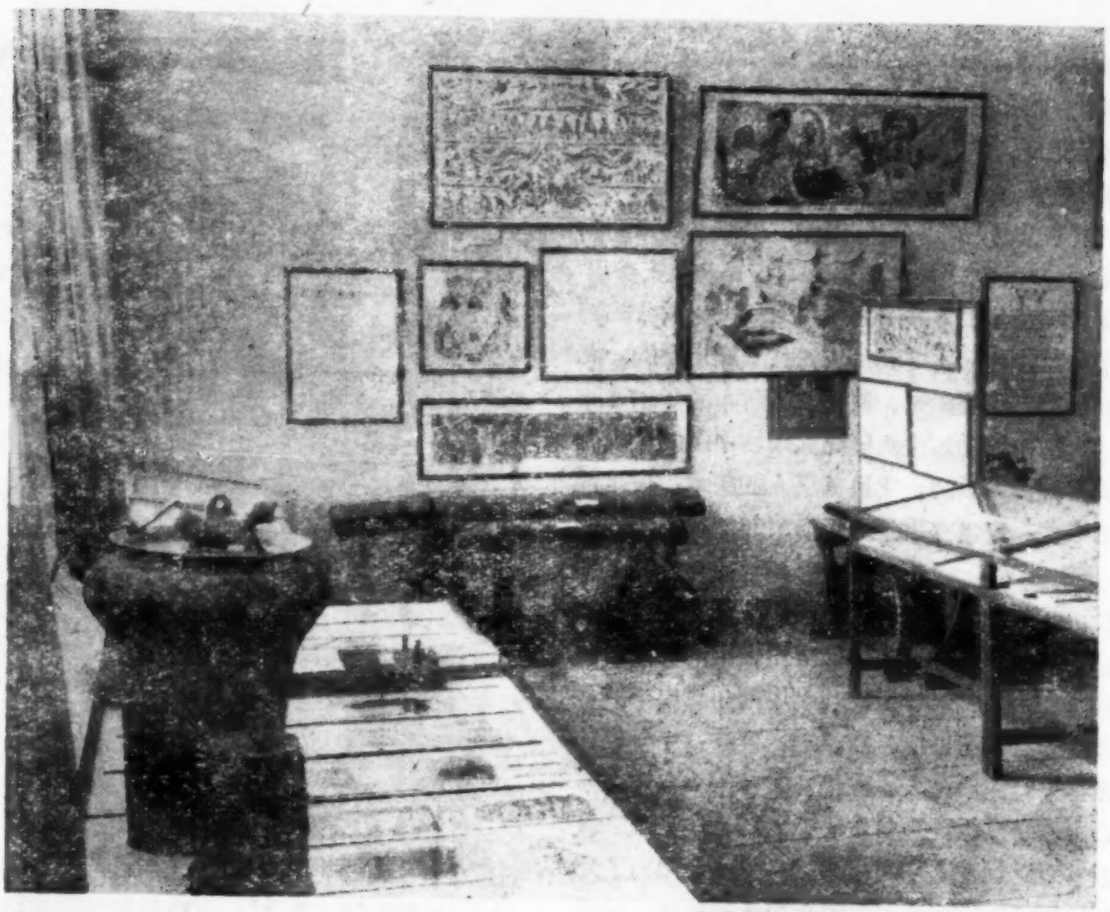
西安何家营鼓乐社乐譜　旧抄本
記譜法与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相同

古琴發展到漢代，曲調已很丰富，蔡邕"琴操"中所講的"聶政刺韓王曲"，就是傳世的"廣陵散"。武梁祠画象也用了这个故事作为石刻題材，再加上明初刊本相傳出自隋宮的"廣陵散"譜及根据此譜發掘出來的現在譯譜及錄音；文字、圖片、和音乐結合在一起，对于这个古曲，可以給人比較全面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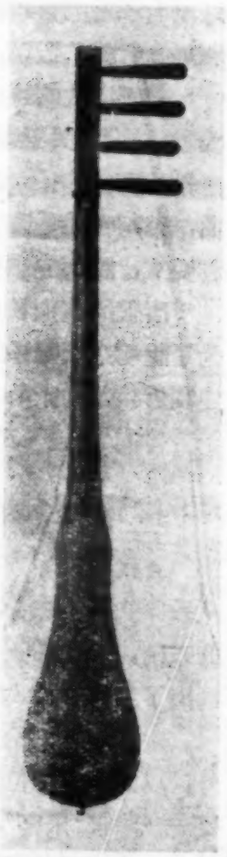
漢在南北朝期間的乐律理論向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發展，積極方面的有晋荀勗笛律和宋何承天接近平均律的十二均差律。荀勗的發明，用按照他的規定制成的篴（即現在的篳）來說明早在三世紀时他已經实际应用了近世才为音响学家所知的"管口校正法"。消極方面有脫离音乐实际，为了宣傳神秘主义而造作的漢京房六十律和宋鑄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对比的陳列，指出了它

← 蒙古笳吹乐譜清宮黃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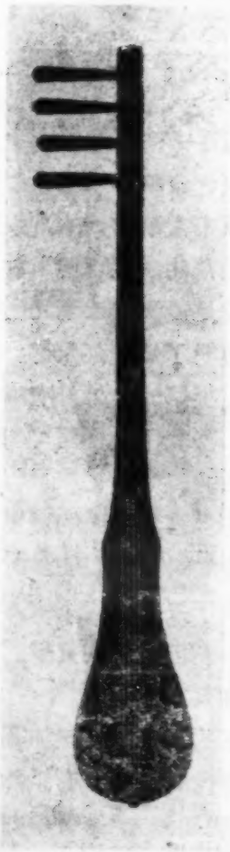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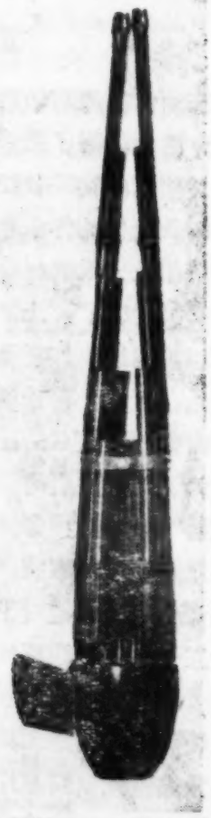
古代音乐史料研究室内景一角

阮　清代制品



火不思（正面及背面）　明代制品





十七簧笙　明代制品(注)

們的積極和消極的作用。

漢代的"乐府"是一个搜集整理民歌的机構。根据"漢書礼乐志"和"藝文志"，画出了乐府人数統計表和采集民歌的地域圖。乐府的節奏，依照句法加以分析，有的可以找到它的規律，用綫譜画出推測的結果。

漢代的乐器很难找到实物，所以采用后代的仿制品來陈列，而标明它們是在漢代已經出現的。擺出來的乐器有箜篌、簫、笛等及漢时本國所創造的琵琶（即現在的阮）。宋人仿周文矩宮中圖的琴阮合奏一段，經放大摹制。它虽是唐人的粉本，但这种合奏的形式，应当在更早的乐府"相和歌"中已經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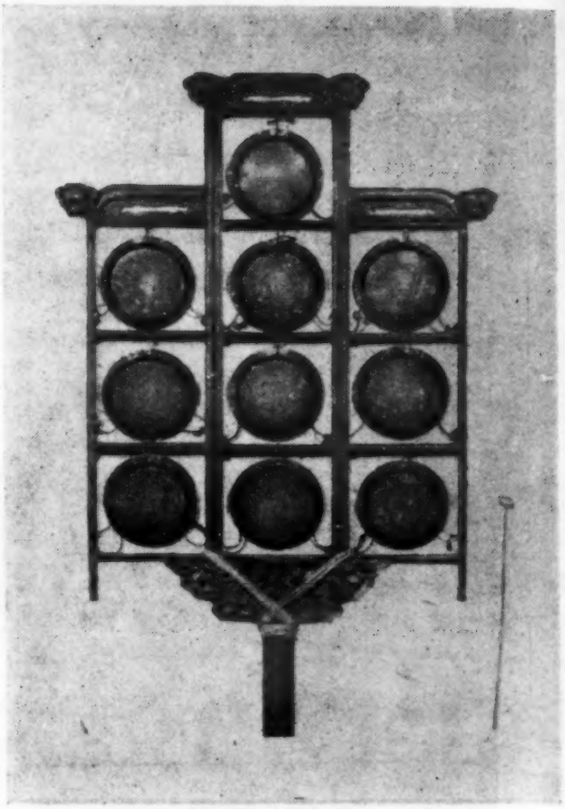
外族音乐被吸收和融化，發展成为中國自己的音乐，是这个时期陈列中应該突出表現的一点。此处陈列了在南北朝时期被吸收到中國乐隊中來的外族乐器，如貝、星、鏡、鈸、鑼、腰鼓、手箜篌、曲項琵琶等。从中國吸收融化外族音乐史实簡表中可以看出这时期主要是在鼓吹、歌舞、琵琶及宗教音乐等方面受到了外來的影响。另外一欄指出了梵文經籍的翻譯工作促進了中國音韻学的形成，对后來的声乐有密切的关系。

五、隋唐

在隋代出現的乐器，陈列了方响，篳篥及十七簧笙；唐代陈列了軋箏、拍板、口琴、尺八、忽雷等等。隋唐兩朝的敦煌壁画及宋人摹唐代的宮乐圖等繪画及唐代的作乐俑，都能帮助我們理解当时乐器的使用及乐隊的組織；尤其是傳为宋武宗元所作的"朝元仙仗圖"，上面标題寫明了是龜茲乐部，我們可以相信原画作者是有一定根据的。另外有隋代九部乐、唐代十部乐所用的乐器表，是根据"隋書"及旧唐書"音乐志"的記載画成的。

为了說明隋唐时期在音階和宮調方面的發展，用隋書"音乐志"中鄭譯与苏夔的对話來証明当时已有应用新音階的事实，并陈列了关于大音乐家万宝常的文献來介紹他对于八十四調理論上的貢献。唐燕乐二十八調也經画成表格陈列在这里。

唐代的大曲达到歌舞音乐的高峰，这里陈列了在敦煌發現的曲譜和舞譜、唐代的舞俑、有乐舞場面的敦煌唐代壁画照片、从"碧鷄漫志"等書中归納出來的大曲：体結構表及对于大曲有生动描繪的白



云鑼　清代制品　北京九頂娘娘庙旧藏

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可惜敦煌曲譜及舞譜目前还沒有理解到可以翻譯的階段，尚待進一步的研究和更多材料的發現。

关于唐代的声乐，从古琴曲中找到了用唐詩作为歌詞的"陽关三叠"和"关山月"，它們可能保存了一部分唐代的乐句。"風雅十二詩譜"虽非"詩經"原曲，但至晚也是唐朝人的作品。此外陈列了唐曲子和变文，說明它們是宋詞和后代說唱的前身。

唐代的中國音乐文化給朝鮮日本很大的影响。为了說明中國音乐的外傳，陈列了日本正倉院所藏中國唐代几种乐器的照片及当时由中國傳往日本关于音律的著作——"乐書要錄"。

六　五代、宋、元、明、清

五代时期陈列了西蜀王建墓石座的乐舞浮雕。从乐器的种类來看，可以知道它是屬于唐龜茲乐部的系統。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用現实的手法画出了当时貴族式的音乐生活。

宋代的音乐論著除了介紹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外，以突出的地位陈列了中國第一部音乐百科全書——陈暘"乐書"，并用表格分析了这部書的范圍內容，肯定了其中关于民間的和兄弟民族的乐舞資

料是最重要的部分。

宋詞音乐着重陈列帶工尺譜的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及張炎“詞源”。与它們相对照的是西安鼓乐社曲譜和五台山管乐譜。后面这兩种民間还在流行的音乐的發現，大大的有助于解决姜白石歌曲的譯譜和“詞源”譜字的識讀問題。在一旁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工尺譜演变的概况及各种工尺譜寫法的比較。

以下数櫃陈列宋代的說唱、宋元的戲曲和宋、元、明各朝所出現的乐器。四胡、二胡等拉弦乐器以及火不思、云鑼等可能都是在元代才开始盛行的，所以都陈列在这里。明代的洋琴，最初流行于廣州，当是由外國傳入的。

明代部分用比較顯著的地位來突現大音乐家朱載堉和他的“乐律全書”。朱氏在1584年所著的“律学新說”中發表了他的十二平均律的計算結果，早于欧洲的同一發明一百多年。此外对“乐律全書”中比較典型的合奏总譜和几种舞譜也作了介紹。

明代的戲曲分：明初的南戲、明代的雜剧、昆曲盛兴时期的戲曲三部分來陈列，着重在最后一部分；这部分中用魏良輔的“曲律”等來說明音乐唱腔在这时期有了新的發展。

关于明清雅乐只陈列了几部乐譜和排簫、篪、龍头笛、壎和編鐘、編磬各一具，至于全套鐘、磬的懸挂情形，用照片來說明。雅乐到明清早已是脫离人民的垂死音乐，因此在陈列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

明清的宗教音乐选用了十五世紀时刊行的特殊譜式“道藏”，“玉音法事”，永乐时編的佛教歌曲集，有悠久傳統而目前还在演奏的北京寺庙音乐等。說明中强調了它們的取材都來自民間。

明清关于古琴的著作因为材料太多，只选用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可以比較出記譜法的演变。清代和近代的琵琶譜及箏譜也陈列在这里。

器乐合奏依乐种來分組陈列，擺出了吹打曲、管乐曲、弦索曲、鑼鼓曲、蒙古笳吹等几种合奏的乐譜，各有譯譜并說明它們的來源及演奏情况。

清代的戲曲，昆曲占的比重相当大，这里有清代初叶的演戲祝寿圖大軸，画着演唱、化裝、乐隊伴奏等場面，是一幅画工的寫实作品。地方戲包括京剧、梆子、福建南乐等剧种的剧本及歌譜。

在本时期快要結束的地方，屏風上挂着几幅帶总結性的表格，如：中國乐器發展概况表，詩韻、曲韻、剧韻演变关系表，歷代管律黃鐘音高表，歷代弦律比較表等。最末一櫃陈列清末一直到最近关于古代音乐的研究論著。(因为此室之外另有現代音乐活动陈列室，所以有关新音乐运动的实物与文献沒有陈列到这里來。)

通过陈列的方式來說明中國音乐文化的發展和成就，是一樁新的工作。这个陈列室可以說是一个初步的尝試，有待不断的修正与补充。今后为了逐步提高这一項工作，除了可以从全國的音乐机構及工作者那里得到支援外，全國的文物机关及工作者也一定可以給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今后的考古發掘当中，必然会發現有关音乐的可貴資料。爭取各方面的协助，做好中國音乐史的陈列工作，將对繼承祖國文化遺產，宣揚愛國主义教育起很大的作用。

〔注〕 这一乐器为北京智化寺旧藏，笙上有“揚州致場前馬云衢老店馬功慶制”字样

河南省文化局为在農業生產水利工程中認眞保护文物發出緊急通知

原文如下：“随着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打井、挖渠、修小水庫等建設工作日益增多，为了認眞保护祖國的文化遺產，各地在兴修水利工程中，务須根据國家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对于地面古代建筑、碑碣及地下古墓、古遺址一律加以保护，不得拆扒挖掘利用，比較大的工程，事先应同当地文化部門协同勘查，作出保护計划，一般打井工程，在工程开始时遇到古墓、古遺址，应另移打井地点，若不能移动位置时，应局部停工，請文化部門派員清理，重要問題及时上报，出土文物妥为保管，不得私有。要求各縣人民委員会，將本通知及1955年2月21日省治淮总指揮部、省水利廳、省文化局‘为在水利工程中切实保护文物的联合通知’和各該專署保护文物通知，下达到鄉級人民委員会，并抄致有关机关团体，在有关幹部及群众会上傳达貫徹，各縣并应組織一定力量掌握这一工作，以便更好的保护文物。”

博物館藏品的保管与修复 十二

M. B. 法尔馬考夫斯基著

第四節 纖維物質

一、紡織纖維及紡織纖維的制品

纖維物質类包括着巨大数量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外貌上是極其多种多样，而按其性質的基本特征和工藝学上的本性是有着深厚的親族关系的。它包括：一、可用于制备織物、綫繩、絲縷、繩子等物的紡織纖維；二、皮革和皮革紙；三、木；四、紙。不过，紙不能組成独立一类，就是說，紙和第一类以及第三类是那样密切地关联着，但同时它的性質上又是那样独特，所以它値得在纖維物質制品行列中占有一个特殊地位。

在述及的四类中，使博物館学者特别注意的应当是第一类和最后一类，即織物和紙。如果說关于紙的保管和复原的文献还算廣泛，并且在这里也得到了極重要的成果的話，那么对于織物則是完全相反的，而在这一方面作拓荒者的荣譽就要屬于我們苏維埃的学者們了。因此，我認为有必要在这种情形下稍稍詳細些論述。誠然，若干年前國际联盟博物館局(International office des Musées)曾对紡織品的保管及复原問題，对世界上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巨大博物館進行了調查。

这調查的結果曾經發表在这个博物館局所出版的雜志 Mouseion 上，这文章上的摘錄曾刊載在雜志"苏联博物館"上（1935年）。

讀者如果通覽这些文章之后，就一定会極度驚訝，因为这一調查的組織以及甚至作为这些总結的基礎的思想是非常貧乏和有缺陷的。几乎任何人也沒有越过最起碼的經驗論的方法，只有華盛頓博物館保管工作者克里吉尔除了回答調查的問題之外，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論述了他自己对修复和保管的观点，还有巴黎的A·費得洛夫斯基——人文博物館試驗所主任——曾提出为進行織物修复与保管工作所需的若干科学前提条件。

这种思想貧乏和具有缺陷的原因只能是：从复原及保管的观点上看來，博物館內的織物从來不曾是充分注意的对象。

但是，在我們博物館中有一些材料，是独一無二的、在任何地方也从不曾發現过的、有世界意义的珍宝。例如，在爱耳米塔什博物館中保存着一些織物，是从我國南部地区优秀的發掘工作中得出來的。在墓內曾發現了优异的古希臘的織物标本，其中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館里也沒有的似这种織物的标本。收穫最大的發現是在1878年——1879年間。关于这些次發現的材料报導，曾在1881年考古委員会的总結中刊出。載有这些發現物的壯观的复制像册指明了我們实在是拥有令人驚异的宝庫。

在1924年到1925年，有名的旅行家考茲洛夫曾在蒙古進行了發掘。在屬于紀元后最初几世紀的墓中曾發現了大量的中國制造的独一無二的具有極高价値的織物和当地的匈奴族的織物。在任何地方从來也沒有發現过可以和这些織物相比拟的織物。在蒙古的發掘中所得到的發現物是那样富丰，以致于只有从这时候才能够講到中國絲織物的歷史。

当考茲洛夫發掘的織物运到列寧格勒的时候，这些織物送到了俄罗斯博物館人文部（現在的人文博物館）進行修复和清洗。在進行这工作之前，列寧格勒發生了巨大的水灾，把人文部的地下室灌進水去，在这些地下室內正保存着几万件物品——包括織物在內。所有这些物品都被水糟踏坏了。

为了复原織物，在博物館曾組織了特别工場，于是以非常的速度和巨大的技能把这些織物修复了（洗凈了、把泥垢刷掉了等等）。考茲洛夫發掘出

的織物也送到了这个工場來進行了修复。非常使人遺憾，对待这些織物也使用了对人文学織物所用的那些方法。但是，人文学織物的年齡不过只有二十年、三十年，最多也就是五十年而已，而考茲洛夫發掘出的織物的年齡却是兩千年。

在清洗之后，这些織物起初在地理协会，以后在物質生活歷史学院中進行了展覽。最初所有这些織物看來都是很潔淨和平整的，但是当請來紡織專家的时候，他們肯定的断言說，从織物上什么也沒有剩下來：織維弄毀了、色彩洗掉了，只有那些沒交付修复的織物才能够給出色彩和織維的眞实面貌的概念。

由于这个問題，激烈的爭辯就逐漸的展开了。关于应当如何修复与保存这些織物的問題，以及根本是否有清洗与修复这些織物的方法的問題，曾發生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和爭执。当大家开始參閱外國的和我們的文献时，發現原來关于这些問題文献上是只字皆無的。

有一些好的參考書（主要是德文的）是关于洗滌、拭除斑点之类問題的，但是这完全是另一件事。看來似乎外國博物館的实踐在这一方面能够給予我們一些什么。構成國外許多博物館的主要財富的那些埃及考普特城以及叙利亞帕利里米尔城的織物，因其考古科学生活諸条件，曾將其壯观的境况一直保持到到了我們今天，而这些織物使我們產生几乎是新織物的印象。因此，对于这些織物当然是不能够使用那些对埋在普通地下几百年甚至于几千年的織物所必須用來進行清洗和复原的方法。而从蒙古發掘出的織物甚至出在泥中，这就是說，比起考普特城的織物來是处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了。

保存与复原織物的新方法的計划工作委托給了考古工藝学院。在学院內曾組織了关于各种不同問題的一些工作組。为了研究討論与諮詢質疑曾吸收了紡織科学方面的最具威望的專家們。

对这些工作的領導就交付給我來担当。

整个工作的基本原則如下：如果对这一物品材料沒有詳密的研究（对于这一物品的个別地、而不是一般的研究）就不能采取任何一个步驟，因为这里的許多物品，無論在技術上、材料上、色彩上等等，都是各有不同的。要先对于織物材料進行研究，其次再來确定在科学上有根据的清洗与保管方法——这一原則到現在仍然是基本原則，忘掉这一条基本原則是不应当的。

上面所提到的克里吉尔所寫的文章中說：只有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材料性質之后，才能够采取保护織物的任何办法；如果沒有这种研究，我們一般地就能冒着徹底毀坏所有藏品的危險。

学院曾將对于織物所進行的工作的某一些結果刊載在物質文化歷史科学院的"消息报"上，題为："对諾晉烏拉城發掘出織物的工藝学研究"，但是整个关于复原和保存的部份仍未曾被涉及到。而关于考古工藝方法学的一些材料的出版（"論清洗織物問題"第八版）也沒能弥补上这一空白。

因此，如果我們在博物館中有紡織材料，那么我們在处理它們时必須是非常注意和謹慎的。因为，非常遺憾，时于博物館藏品說來，我們到今天还沒有关于这些材料加工方法印成的參考書。

紡織材料是由織維制成。織維有动物性的或植物性的。辨識植物性和动物性織維的最簡單方法是有如下述兩种：一、在燃燒的时候，毛絨和絲能發出特具的焦燒角質的臭味，而植物性織維——只是沒有特別臭味的普通烟而已；二、在燒剩的动物性織維的末端能够形成燒了的蛋白質的暗色小顆粒，而植物性織維燃燒时变成少量的淺灰色灰燼，它的燒剩了的織維有針狀的尖銳末端。

动物性織維是毛絨和絲；植物性的主要是麻和棉，但是考古材料中也常遇到苧麻織維、蕁麻織維及其他。在其性質上來說，动物性織維和植物性織維都是織維素。

在这以前我們曾講到礦物的——即非有机物的材料，比較起來是具有很高的耐久性；而有机的織維素在其性質上來說是非常易于变化和不穩定的。

一般地把能够从液体中沉淀成为肉皮冻狀或膠糊狀沉淀的物質称之为織維素——即膠狀物質。这种沉淀，有的能够重新溶于同一溶剂中，——例如，精制膠、木工膠、阿拉伯橡膠就是这类的；有的不能溶解，这一类的，特別是头髮、絹絲、麻織維、棉織維等等。这些織維是由动物有机組織的很复雜的織維素溶液所造成，并且是这些溶液凝固的結果。这种凝固是在有机体生命过程中完成的，不管是动物或是植物都是一样的。

織維的特点是它有吸水性以及吸收一般液体的性質。由于这种吸收，織維就膨漲起來。这种膨漲能够是各种性質的：例如，材料在干燥时往往能恢

复从前的狀态，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超过某一膨漲限度，則不能恢复，而膨漲就变成經常不变的了。在这种經常性膨漲之后就能發生較持久的吸水現象。这不是机械的，而是化学的吸水現象。这样纖維就变成某种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能具有新的区别于原來基本材料的性質，这种新的东西大部分具有比基本材料較低的品質。

如果我們將要开始观察各种纖維，那么首先应当來研究毛絨，因为它是古代最普遍的紡織材料。

毛是圓壩形体，有时是帶有內部細管的筒。这种細管大多数的情况下常常是几乎完全看不到。在某些类毛中，这种細管是根本沒有的。对于毛是最典型的乃是毛的圓壩形体外布滿鱗片。因为有这种鱗片所以造成很独具的特性——这特性就是能够弯曲、能够聚成氈子。鱗片能够密密地彼此相鄰接，也可能擴展开來彼此之間有若干距离。这种情况就特别有助于造成氈子。毛纖維，就其化学成份來說，是由許多蛋白質構成的，因此它就具有蛋白質所一般具有的那些現象，其中包括：复雜的蛋白質由于細菌的作用而分解成为复雜程度較小的物質的現象，即所謂腐敗現象。

絲，与毛相反，是完全平滑的完整綫条，沒有微小的不平坦和粗糙的地方；在某些地方常常有結節，但是它是比較少的。在切片中，絲纖維是中間沒有孔隙的密密的圓片，或者是稍微延長了些的圓多角形体。这种多角形体是野蚕絲所特有的，家蚕的絲切片却是完全圓形的。知道这一点，有时是非常有用处的。

問題在于我們研究的紡織材料，乃是歷史文献，是一定时代、一定文化的紀念物。在考茲洛夫藏品中我所提到的，以及能給我們指出紀元开始后或者紀元前一二百年的中國紡織品特点的那些織物中，原來已經就有了半飼养蚕的繭絲，因为綫条的切片是稍有角形的圓形。这証明着：中國的文化中在这个时候就發展着作为農業企業、作为人們对蚕進行选擇和淘汰的一种职業的养蚕業。这时就已經不是單純地采集野蚕的繭子而是养蚕了。我們如果知道这一点，那么我們就能对当时中國文化得出完全不同于那些沒有这些材料的人所能想像出的概念。

絲和毛都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并且虽然吸收了这些水，在外观上的变化却非常少，因此，毛吸收的百分之三十的水，在触覚上甚至于不能引起任何湿潤的感覚。

所有动物性纖維都能較好地耐得起稀釋了的酸类的作用，但是完全不能耐得住鹼的作用。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知道：毛織物品不能在鹼性水中煮沸；因为能得出的只不过是濃稠的糊狀物而已。

植物性纖維，按其構造上是大大地区别于动物性纖維的。麻的纖維內部一定要有細管。苧麻、蕁麻以及其他植物纖維，都有同样的細管。任何如毛上的鱗片構造，在麻纖維上沒有，同样在另外任何植物纖維上也沒有。但是它們有某种别的东西，即折紋，这些折紋的性質比起鱗片來絕对是另一种东西。麻纖維在切片中是相当正的多角形，这多角形中間有細管。苧麻的纖維和蕁麻的纖維，几乎和麻有相同的構造，只不过它們的多角形不太整齐，在尺度上又有些不同而已。植物性纖維不能經得起酸类的作用，而它却能較好地耐得住鹼类作用。

由此可知，植物纖維在其性質上是完全与动物性纖維相反的，但是与动物性纖維相同的地方是植物性纖維也能非常貪婪地吸收水，并且能在水的作用下膨漲起來。毛和絲在長期膨漲之后，如果不是同时有高溫的时候，能够恢复以前的狀态，而植物性纖維却也可能不恢复其以前的狀态。吸水現象造成后，这种現象能使纖維加水分解，而加水分解就能使纖維的蛋白質（纖維素）变为新的物質——变为氫化纖維素和氧化纖維素。氫化纖維素和氧化纖維素在干燥时变成非常不耐久，以致可以把它們一擦就能成为粉末。这种現象我們平常在考古織物中也能够观察到。

我們常常有一些已經染了色的、修飾过了的紡織物品。这些物品是用什么和怎样染的、怎样修飾的，以及这是怎样在纖維上反映出來的——这些問題，自然是我們必須关心的。所有纖維素，其中也包括任何織物的纖維在內，都能以非常大的貪婪性吸收着它們所接触到的一些液体。这些液体能从自己成分內沉淀出能被纖維永久吸收的某些物質。如果我們把毛纖維放在某一种染了色的液体內，即通称为染料（按其本質也是纖維素）的溶液內，那么纖維就会把一定数量的染料給吸收進去。但是，因为动物纖維和植物纖維对各种酸类和鹼类是各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当然有一些色能被动物纖維吸收，而另外一些色能被植物性纖維吸收，这就要看这些色在其本性上和在其制造方法上是酸性的或者是鹼

性的了。

因此，如果我們有某种需要加工的紡織物品，那么我們首先必須研究其纖維的性質是什么样的，这时才可以預先推測这种纖維是可能如何染上色和怎样染上色的，而后來才能够研究与考慮对于这种纖維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复原办法。

看來沒有一种物質是人类沒曾用來試驗染纖維的。从很久以前，就使用了草、漿果來給纖維染色（現在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着漿果制的这种染料）。例如，在歷史上大家都知道：罗馬人征服萊茵河以南地方（古名戈利亞地方）时（即紀元前一世紀的时候），黑莓果就曾用來給奴隸的衣服染色。到处都曾經用黑色紅醋栗、蒜、甜菜汁、胡蘿卜汁、植物皮、等等進行过染色。也曾用过有色的土、金屬氧化物等染色。

曾經有一种意見說：为了使粗糙的礦物染料（染色大概是从这种染料开始的）能够附着，并且能够足够持久，所以在古代就把这种染料和某种粘連膠着物質化合到一起了。但是，也有不用一切膠着物質而單独使用这种染料來染色的方法。不久以前，伊里因斯基教授为了工業染色的目的而研究了这种普通的又令人信服的染色方法，他給出了在工場生產規模下这种染色方法的范例。

考古工藝学院的工作中，在研究考茲洛夫發掘出材料时，曾遇到了这种用礦物質染色剂染色的有趣例子。在材料中發現了一件非常薄的絲質絹網，这是很高加工技術的絹網，这种加工技術現在都甚至于很难于想像出來；这絹網是被染成鮮紅色的。我們由于不止一次地反复研究，才断定这是朱砂（或称辰砂，即硫化汞 HgS）。对紡織品使用朱砂，根本未曾听說过：因为紡織品染色时必須要染色原料能够溶于非常稀薄的纖維素，而朱砂是不能如此的。但是，使用朱砂的事实却是無可非議的。这朱砂是怎样被使用的这个問題，到現在仍然是無法知道的問題。

由此可見，和用漿果及其他方法染色方式一样，最古代的染色方式能够是不用膠凝物質而塗刷礦物色的方式。能够得出極稀薄溶液的植物性染料，比起礦物性染料有着較大的普及根据。

用花和漿果制的植物性染料來染色是很美丽的，極其多种多样的，但是这种染料往往是極不能持久的，常常只能保持極短的时間。

用樹木、灌木、草章叶中提煉出的各种色精來染色，比較耐久些。例如，在極多的植物中所常遇見的黃色染料就是这样的染料。而在我們苏联从極西到極东的廣闊幅員上能出这种染料的植物有如鼠李（学名 Phamnus frangula）。鼠李在其叶子內，樹皮內，特別是在其漿果內，都能給出染色物質。这些漿果不能食用，它們在溶液中用來染色时能給出很耐久的黃綠色。我曾試驗用最普通的办法以鼠李提煉出的色精对各种織物進行了染色，得出了橙黃和綠色的优秀的色調。在这里我們已經有着很廣的色調范圍、可以適用的材料和很大的耐久程度。

能給出藍色染料的植物是分布得很廣的。在赤道下的一些國家里，这就是——印度藍，在我們苏联即所謂大靑（植物名，学名：Isatis tinctoria）。大靑，以及它的各种各样的变种，都能給出藍色染料。这种染料表明着：人类不僅經过了很好的观察，而且在文化的很早階段上就已經了解了复雜的化学現象，因为假如你用这大靑的漿液去染某种織物，那么只能得出骯髒的黃色，只有以后，它才开始發綠，通过在空气中的氧化后它才能得出非常經久不变的藍色來，这就是所謂印度藍色。

染色工作的進一步發展階段，我們能够在使用某些紅色染料这方面看出。这些紅色染料中最普遍的乃是用茜草（学名：Rubia tinctoria）根煎出的汁液來染色。这种茜草在下列地方都能遇到：在加斯比海沿岸低地的草原地帶，在小亞細亞、伊朗、中央亞細亞的草原地帶，在蒙古、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草原地帶。在我們苏联北方有一种近于茜草的一种草，它叫做細叶草（学名：Galium）。这种細叶草在其根上含有着和茜草相同的染色物質。

但是，如果你沒有事先准备而單單用茜草的煎汁來染織物时，那你会得出黃色的色調。为了得出紅色，就要把織物事先用媒染剂加工，即用一定的鹽类來加工，用这些鹽类以后，茜色的染色液才能够在織物上由黃色变成紅色，一直变到很深的色調为止。例如用鋁明礬就能得出鮮紅色或絳紅色，这决定于各种加添剂——用鉄的媒染剂得出紅褐色；用錫的媒染剂，得出火紅色。

柳的溶液平常能得出紅褐色。如果把紅褐色織物放到含鉄的池沼水內，那么經过相当長的时間，織物就能变成微帶藍色的黑色織物。这里發生着溶解于池沼水中的鉄和含在柳樹和紅楊（学名：Al-

nus）樹皮中的單寧酸的化合。

人类观察着所有上面描述的那些現象，就逐漸研究出來了完全特別的和非常复雜的染色工藝。染色所用方法和材料都是与紡織物品本性本質非常接近的因素，这是很顯然的。

这样，在复原織物时就应当弄明白纖維的來源、纖維的加工方法、它的染色等。織物因其纖維的性質而对于环境的所有物理和化学因素非常敏感（从对光和空气起都同样的敏感），所以上述工作还要复雜起來。

纖維本身在光綫的作用下，不管是能够看見的光綫或者是不能够看見的光綫，特別是在不能看見的紫外綫的作用下，它就能受到很强的变化。在帝國主义战爭以后，对于在战时所暴露出的某些現象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曾經注意到：优秀的毛織品，根本不是穿旧了的，但处在太陽光綫的較長时間的作用下，就丧失了它的耐久性。这种現象曾在柏林和倫敦的特殊試驗所里進行过研究。

在最近几年，在莫斯科紡織学院中曾進行了一些很有趣的观察。判定了太陽光是能有系統地降低任何纖維的强靱程度的，最耐久的毛纖維大約在一年时間的太陽光作用后，就能减低这纖維强靱性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这还是沒有酸类、鹼类及其他諸如此类物質的一切作用的情况下。在光綫作用下，進行着毛的物質分解，并同时進行着硫黃的析出，这硫黃也要氧化，而終極的結果就能得出硫酸，硫酸对纖維的破坏作用就更要大了。如果拿强度較小的纖維，例如拿絲纖維作例，那么在太陽光的作用下只要三个月的期間几乎就能把絲織物給消滅掉。太陽光对于植物性纖維也起作用，但是不是那种規模。

由此得出第一条規則：当保管紡織物品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紡織物品，必須保护它們不僅避免直接陽光，并且根本要避免强光。

湿度不能不对纖維起作用，况且纖維本來就易于膨漲，在有湿度时就能丧失它所固有的性質。和光作用到一起的湿度，就能在麗大比例上增大着光的作用。在倫敦和在印度的干燥地方，曾經对完全相同的織物進行了观察。在印度，在赤道下，太陽光有着無比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当然要大于气候潮湿又多霧的倫敦了。但是，放置在很干燥的条件下的織品，比处在英國潮湿气候条件下的織品，前者的变化少于后者一倍。这样看來，不僅是陽光能給織物帶來損害，而特別厉害的是太陽光与湿气的結合。

第二条規則：保护織品不受到光的照射时，也不要忘記保护織品不受到多余的湿度作用，就是說不要忘記注意室內的条件。

如果沒有潮湿作用附合在温度作用一起，那么温度本身不管在任何程度上也不是纖維的破坏者。有湿气存在的时候，低温就能对織物起作用，机械地粉碎着它們，根本適当湿度百分比的过分提高，如果温度不足，則能促進微生物的發展。可能存在于空气中的亜硫酸气体、氫氧化銨等形式的鹼类和酸类，它們的作用并不是毫無差別的。

对于毛織品起着很强作用的是鹼类，而对植物性纖維起作用的則是酸类。

因此，在保管織物时，对博物館空气的鹼性污染物和酸性污染物都要注意。又因为不能把毛織物和麻織物以及其他任何种类的織物分开个別地保存起來，所以就有一条共通的規則：注意織物保存庫中空气的清潔。

在自然条件下，能够發生着織物的逐漸朽坏作用。这样，織物一直能到达完全破坏。

如果講到考古物品，那么原來織物以及織物的破片常常是几乎絕对是在地窖中發現的，很少是在城市中發現的。說明这点是很簡單的：在城市中，織物曾处于湿气、太陽以及其他大气因素的作用下，因此这些織物就比和死人同时放在墳墓里的織物腐朽的更为迅速些。土原來是比空气和光都好的保存織物的手段。

但是在土中，織物常遭受到另些种类的破坏：織物在这里要被污染，而这些污染剂就能够对織物起着非常有力的作用。这些污染剂中首先就要指出水。水能導使膨漲，并且此外还能喚起独特的分解作用，即所謂水解作用。纖維的水解分解作用——这是在土中的織物所能發生的最危險的一件事。因为这种分解是不能在后來弥补的。水解作用能从纖維中析出某些物質，于是纖維就丧失了其耐久能力。

其次，能够發生由溶于水中的鹽类而使織物污染的現象。織物靠近腐敗着的死屍，就能浸漬到各种酸类及鹼类。有些物質其本身并不是有害的，但是它有时对織物的污染卻很剧烈（如：鉄、橡膠制品）。这种使織物污染的現象是可能有的。——上述

这些就是能使处在土中織物受到破坏的东西。

由于所有这些反应剂作用的結果，我們就能够得到完全黑色的織物，从这种織物中已不可能找到从前色彩的痕迹。

这样，如果着手复原織物，特别是考古学上的織物，那么就要注意織物在土中所能够發生的一切情况。所有反应剂的作用就复雜到这种程度，似乎在我們面前擺着的是一項沒有任何可能來了解的任务。但是，某一些工作，是完全可能做的。

如果說只有那具有通曉紡織品工藝学，通曉这工藝学最主要部分的極有經驗的工作者和有設备良好的工場才能够做得到对很貴重織物的复原工作的話，那么某些最簡單的工作在較差的情况下是可以作的，但是要有一条絕对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最詳密和不急燥的准备，同时要精确地遵守修复工作的几条基本規則，以及不断地記錄自己工作的一切階段，并且对于失敗和可疑結果的各种情况更要特别留意。如不遵守这些規則，那么最好不要触动織物，以便别完全把織物弄毀。

首先發生一个問題，就是：怎样从織物上把那些几乎永远使古代織物污染的泥和土弄掉，以及怎样把埋沒在土中的織物从里到外浸透的那种灰塵弄掉呢？

最好是用水蒸气流來排除灰塵和泥污。不可以把所有博物館藏品用水來洗濯，把它們浸在水里。因为那时候你就沒有把握避免一系列的意外事情，例如顏色的丧失、纖維的变弱等。

对于小的作業，用一个鋅桶，桶上做一个空洞，空洞要帶有彈性橡膠螺旋塞，以便用于注水。空洞旁面嵌入（固定住的、而不是銲上的）一个普通鋅管或銅管，在这鋅管或銅管上插入帶有玻璃尖端的細膠皮管。这个桶內裝滿水，如果沒有电热板的話，那么就在汽油爐上或酒精灯上把这裝了水的桶加热。为了預防鋅桶过热时能發生的爆裂，在彈性橡膠螺旋塞內插入高75—80厘米的細玻璃管；水在受到加热和形成蒸气的时候，就从管內开始上昇；如果水昇到了管的上端，这就是到达了加热的極限，应当把加热減低。結果，得出在一定的、不是很高的压力下的（不多于0.5大气压力）蒸气流。这样，我們曾經足够成功地加工了很多的物件。如果是电力蒸气發生器，那么事情当然就簡單了。

在对織物开始加工之前，要从使織物完整的观点上把織物詳密地檢查一下。加工本身要像下面的方式進行。把織物放在过濾紙上或放在潔白的布片上，再用蒸气流加工。泥污將很快地吸到放在下面的过濾紙上。如果織物从表面这边特别受到泥污的話，那么最好从里面來進行工作。对待考古学上的織物需要特别謹慎，因为用水蒸气流尽可能更好些的來排除一切可溶性化合物是很重要的；为此可以不用过濾紙作底垫，而用普通藥布把脫脂棉做成薄片作底垫。把需加工的物品放在这种薄片上之后，就把物品用同样的藥布盖上，而只有在这时候才能通过藥布用蒸气進行加工。我用这种方法做到了把最纖弱的物品清洗干淨。

这时，在考茲洛夫的藏品中有軍人头部像的織物。这是物品本主的第一幅而且是唯一的肖像。当时我从國家考古歷史博物館委員会接到这件織物來作試驗，那时候，这件織物是一个黑色的不大的硬塊。当时只能够極約略地說：这大概是毛織物。当然，关于織物的構造是不能談的，根本談不到能有什么繪像。从來任何人也沒有想到在这件織物上还有什么刺綉。这一小塊之所以挑选出來，因为它是完全不中用的、沒有复原希望的。

水蒸气的作用与用溶剂的加工交替進行的結果（关于用溶剂加工的問題下面將談到），一直把这件物品弄得能够看得見綉着軍人头部的优秀的刺綉的地步；这件物品現在是愛耳米塔什博物館一种引以为驕傲的藏品。这就是由于細致和頑强工作所达到的結果。

在清洗織物时特别困难的問題是选擇能够把較为耐久的污染排除掉的溶剂。

在最簡單的情形下，最普通的水可能用作溶剂，有时候用酒精。常常必須因污染的性質而使用較复雜的溶剂。应当永远記住：所加工物品的本性要求自己的条件，因此就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適用于一切的手段。

首先用普通水这是完全很自然的。如果織物公認为是耐久的，而顏色不能因水而脫落的話，用水是可以的。在这些情况下，把織物放在稍微傾斜的鋪着油布的桌子上，而在油布上面用潔白的毛巾盖好。織物也最好用細紗輕輕盖上，把織物用海綿蘸淨水（最好用蒸餾水）潤湿，同时輕輕敲打着織物，以便使水能潤湿織物，溶化污泥，并且能浸入鋪在下面的布片。这一直做到从桌子上淌下來的

水变成清净的时候为止。在工作的时候应当观察白色布片上是否开始出現了顏色的痕迹；如果出現了顏色，馬上就要停止冲洗，而把織物用溫热的床單或过濾紙吸干。

很嚴重的問題是关于肥皂適用程度的問題。在下列情形下肥皂是不適用的：一、如果織物根本已朽旧而顏色又不耐久的时候；二、如果顏色能因水而褪掉的时候；三、如果水因有溶解性石灰而是硬水的时候；四、如果在織物上有白色薄層，这些薄層不溶于水，而看來这些薄層又是石灰性的时候。

把肥皂弄成为碎泡沫塗在湿潤的織物上，而讓它保留在織物上若干时候，之后就像上述那样用水清漱下去。要經常地注視是否顏色因肥皂而脫落，如果脫落的話，馬上就要停止肥皂的作用，而用手或用过濾紙把肥皂除去，以后用蒸气把肥皂的殘余除掉。肥皂要用中性的——兒童用的或化粧用的，根本不要用富于游离鹼类的普通洗衣用的肥皂。最好用絕对沒有鹼类的肥皂根（Saponaria officinalis）。

可以推荐用为溶剂的最好手段，就是剛剛介紹过在机械地排除所附着的泥、土、灰塵时所使用的水蒸气。水蒸气与液体狀态下的水相反的地方是：水蒸气能不牽涉到織物的顏色而作为某些复雜污染的溶剂。例如，用水蒸气可以排除溶解性鹽类、某些膠凝物質、醣类物質、酸类和鹼类的溶液。但是蒸气也要非常小心地使用，因为应当知道，我們有时对于物品着色的工藝技術、对于这些色彩在目前的完整程度还是完全不清楚的。如果沒有在物品的不重要的一小塊上試驗过某些溶剂对于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絕对不可以在任何一件物品上加工。

如果水蒸气是不起作用的話，那么就要使用二氧化炭之类的化学反应剂來排除油类和樹脂。这类溶剂之中最適用和最有力的乃是汽油（更有力的是苯），当然是要純的汽油。汽油能非常有效地溶解各种油类的和樹脂的污染，而不能破坏許多織物上既經保存得正常的色彩。虽然如此，我們在博物館实踐中必須拒用汽油，因为它具有很大的發火性能，而它的气体和空气的混合就同时能得出强烈的爆炸。

这样看來，虽然这一工作似乎很簡單并且極有趣，而我們在博物館的条件下必須完全拒絕这样工作，或者必須离火很远在露天地來進行这种工作。

此外，古代織物被减退变淡了的色彩能够被汽油洗掉，所以必需事先作試驗。

从而，应当选擇一种不能具有那么强發火性能的溶剂。我所試驗过的一切方法中，我認为最好的是四氯化炭CCL_4。这是一种完全不可燃燒的物質，并且，它的蒸气还能消火。四氯化炭能够極其有效地溶解油类和樹脂。我个人在排除污垢上所進行的大多数工作，其中包括清洗有名的帶有軍人头部的綉像，——这些工作都是在用蒸气加工之后，用四氯化炭來進行的，而得到的結果是非常良好的。

四氯化炭的优点是：它对色彩絕对不起作用。織物色彩仍能保持完全未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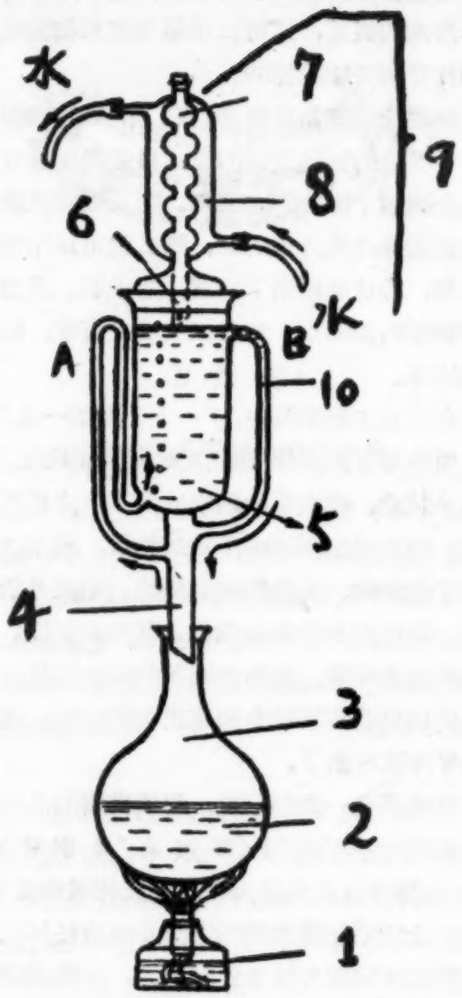
但是任何一种溶剂、任何一个化学物質，都是帶有一定的否定性質（缺点）。很遺憾，这些否定的性質，也是四氯化炭所固有的：如果四氯化炭处于接触水的情况下，而水又永远含有着（既使是微量的）氫的積極离子H^{+}，那么从溶解中就能够分离出氯（CL）的負离子，能够与H^{0}化合，而結果得出鹽酸HCL。因此，应当采取办法以便使这种情况不致發生。氯离子的这种游离是在光下發生的，所以应当保存四氯化炭不在光下，并且尽可能不在鉄桶中，因为如果稍微形成了鹽酸，那么鉄就会迅速破坏，并且以其自己的氧化物使纖維染上色。这种过程發生的很緩慢，并且我在我的实踐中还沒曾看到过这种現象，但是在理論上这种游离是可能的，所以需要事先防止它。

有一些物質，在其作用上以及在其性質上都極其近于四氯化炭。可以用來代替四氯化炭的物質有二氯化乙烷。因为这兩种物質現在廣泛地用于工業上，所以得到它們不是很困难的事。必須預先警告：大量使用二氯化乙烷是对健康有害的。

需要在你用水蒸气把織物加工完了并把它們干燥以后，才能使用化学溶剂。根本不应当在如四氯化炭或者二氯化乙烷之类物質中進行很長时間的洗滌，特别是当我們处理毛的时候，因为溶剂在很長时間工作下則能从毛纖維中把保持毛纖維彈力所必須含有的纖維的羊毛脂給抽出來。在古代織物中常常几乎都有羊毛脂的，因此就是保存少量羊毛脂的痕迹也是特别重要的。

应当記住：博物館工作者平常所接触的并不是好的、完整的、直接从活的植物上或动物上取來的

附圖：



說明：

1. 酒精灯
2. 在燒瓶中的溶剂
3. 溶剂的蒸气昇到A管去
4. 蒸气通到有物品的气筒去
5. 气筒，其中放有加工物，从冷却器流來冷却了的溶剂也落入这气筒中
6. 蒸气的入口，冷却器的出口，变成了液体的溶剂蒸气从这里流下來
7. 蒸气凝縮器，用來使溶剂蒸气冷却
8. 蓄水器，水管的水从这里通進去，由其上端流出
9. 冷却器：由蒸气凝縮器（7）与蓄水器（8）組成
10. 从气筒的这个B管中，多余的溶剂又流回到燒瓶里去

附注：原圖上和原說明上关于气筒的兩个管子并沒有"A管"和"B管"的名称，这是譯者为了更便于說明而加上的。——譯者。

那种纖維，而是已經朽旧了的纖維。織物越老旧，那就越应当極謹愼地使用溶剂，因为毛纖維中的油脂量如同在老旧的織物中耐久力的潛力一样，是極少的。

为了吸出污垢（樹脂和油类），我們有时用苏克斯列特(Сокслет)氏器械。这器械的裝置如圖。

这構造的主要部分是气筒，其下部有蒸气入口的小孔，其上部有往冷却器中去的蒸气排出口。

把应当加工的物品放到气筒里。这个气筒在下面以管子与注入溶解液的燒瓶相連接。当在灯上或在水槽上使液体加热时，溶剂的蒸气就从燒瓶升上來。進入气筒之后，这些蒸气就对放在那里的物品進行加工，而進一步通到冷却器中去，而在冷却器中又变成液体回到燒瓶來。用这种加工方法，一滴溶剂也不能消失到空气中去，这在節約的意义上当然是非常適当的。

这种加工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物品受到蒸气加工，而不是浸在液体中來加工。在这件織物上的所有污垢，都能聚到燒瓶來，对这些污垢还能够進行化驗。这一点是極珍貴的，因为重要的是我們常常需要知道这件或那件織物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污垢存在着。从我自己的实踐中可以举以下一个例子。

不久以前，我們曾对几件帶有秘魯產黑褐色瀝青油的（перуанская мумия）衣服。这些衣服是我們苏联博物館中这一类物品中独一無二的。它們的情况是嚴重得可怕。在用蒸气加工之后，这些衣服逐漸柔軟起來了。但是在溶解污染物的时候，擴散出一种很强的香蘭草（学名：Vanilla Planifilia）油香味。至于这肯定是香蘭草油的問題，我們还不能确定，但無論如何香味是非常相似的。如果这种加工是在苏克斯列特氏裝置中進行，而污染剂也能聚集到燒瓶中的話，那么詳細的化学分析也就能够断定出我們是实在是接触到香蘭草油呢，或者是别种另外的物質。香蘭草油的存在是能証明着一种葬仪的資料。在这种情形下，当时是不可能用苏克斯列特式裝置的，因为物件是非常龐大的，而我們試驗所这一类型的巨大設备当时又不曾有；这样有趣的葬仪細節問題就沒經过研究而放过了。

因为樹脂和油脂物質的本性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它們对这些溶剂的反应也是極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最好不用一种溶剂，而用旨在其能有多方面作用的各种混合物。

例如，不久以前在我們試驗所內曾清洗了大批炮兵博物館的古代旗帜。这些旗帜（克里米亞战爭时代的）是包在油布套子內，而保存在某些潮湿的地方。在这里，油布完全分解了，并且旗帜的絲織

物被黑色粘着性物質几乎浸到了旗杆。任何个别取來使用的溶剂也沒能把透明油布所变成的物質溶解掉。当我提議用一系列溶剂的混合物之后，則得到了优秀的結果。这种混合物包括着：乙醇酒精和戊醚酒精、乙醚、醋化酵素、丙酮、苯和氯仿。这些溶剂都是取同量的。

有时候尽管用蒸气和二氧化炭类溶剂進行了許多工作，但是織物仍然繼續保持着晦暗。在这些情况下，織物最常有的原因是由于鉄的氧化物和橡膠类物質所污染。至于把織物掩盖上了的鉄的氧化物，当然是有可以用來能够把它們溶解的方法，但是大部分这些方法对織物本身都是起着極有害的作用。例如，草酸就能够極好地溶解鉄的氧化物，但是草酸对于纖維的作用是强的。因此，对于排除因鉄而發生的褐色或黑色污染物的工作，就必須非常謹慎。

对于排除鉄的氧化物这一工作，我曾進行了大量的試驗。曾進行了約三千次观察，原來当我們用檸檬酸進行加工时，效果最大而同时对大多数古代色彩的作用又最小。檸檬酸使鉄的氧化物变为可溶于水的檸檬酸鉄，所以它就能被蒸气流从織物上驅除掉。但是在这里也应当記住：必要从弱濃度（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來开始这个工作。

至于橡膠物質，那么它們密切与鉄的氧化物联系着的某一部分，是能够与鉄的氧化物同时脫落的，但是到如今我們还沒有那么一种方法能够把橡膠物質排除而又不能破坏織物的。因此，一部分橡膠質的污染就要保留在織物上。

当織物被清洗好了的时候，它一定要弄掉所有化学溶剂的痕迹，这可以用蒸气流來細致地把反应剂的殘存部分驅除掉的。

如果能把經常見到極朽旧了的織物加固，那該是合乎希望的。而遺憾的是：目前还不能介紹出一些完全適用于織物的加固剂。如果願意使織物丧失其色彩而保持其外貌的話，那么就可以用精制膠的加固剂，即曾介紹用于陶器，用于石、及金屬的那种精制膠的加固剂。如果把它噴成霧狀，則能得出較薄的層。

在考古工藝学院中，于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曾对用溶解了的絲使纖維物質進行加固的工作進行了許多試驗。絲在苛性鈉中溶解了，之后用醋酸中和了，結果得出來可溶于水的物質。就用这种物質浸漬了絲織物、毛織物和麻織物。結果是很令人滿意的：織物沒有改变其顏色、改变其表面、也沒有改变其触覚印象。但是加固剂的耐久性还沒有試驗出，所以目前还不能介紹这类加固方法。这些試驗曾过早地被打断了。

常常遇見一些指示說：用纖維素制品使織物加固不是絕对不可能的（原句是"是相对地可能的"——譯注）。但是因为纖維素能使織物变成硬的，所以它比用精制膠加固的方法是沒有任何优点的。况且精制膠的耐久性也曾試驗过，而纖維素的耐久性我們却是不明的。关于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不明的那些商品加固剂，我不認为有必要來提及的。

（上接第64頁）單以济南区言，我們最初即走了第二条道路，因而和荆先生的看法不同。

荆先生在朗公寺的千佛崖，介紹了一些著錄的唐代石窟造像，若向南五里，就可以找到隋唐时期的九塔寺，塔尚存在，山崖也有石窟造像。这些都屬后期，如南过泰山，便出現了北朝有名的四山摩崖。它們一般鐫刻佛經，为一种新的傳播佛教方式。在柳埠以西，除灵巖以外，还有五峰山。其釣魚台有东魏武定五年一百三十四人造像記，清光緒十六年，还掘出殘缺佛像。蓮花洞有北齐乾明元年弥勒像造像題名，并有大佛主鐘崔等五十四人造像題名，时代略同。这些遺存，从山左金石志以至漢魏六朝貞石目諸書，著錄都不完备，或有謬誤，最好的是五峰山志。泰山的刻經在泰安，五峰山在長清，圍繞着柳埠，早期都是朗公的封邑，在他們刻經雕像时，柳埠仍然是这些地帶的佛教中心区。

以上是我們对济南区早期佛教發展的看法，而把各种造像、刻經，都从屬于它。但是佛教發展是多方面的，單从一个中心区來机械的看它，未必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而在这个小的区域以內，只要中心区还存在，無論在南、在北、在西，最低限度也和它有一定的联系。这一看法，过去我們并未肯定，因而在上次荆先生文章中，只用不肯定的語意來說明。

文物工作報導

·山西省·

山西省寧武縣重視保护文物

据山西寧武縣文化館报導：近三年來，該縣畢副縣長对于保护祖國文化遺產，非常重視，經常利用各种会議时間，適当地布置和宣傳中央的和省的保护文物政策法令，并將家藏的南北朝石刻、樹化石、銅佛等捐献國家，因而引起群众对文物的重視，并積極地進行捐献，对于保护文物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該縣陽方口建筑运送救济灾粮公路时，从土內挖出了漢代的灰色陶壺、陶瓶、陶灯各一件，在地面上撿得漢代陶器殘片三塊，还有古脊椎骨动物蚩龍角化石一部分（原是一个整的角，挖时打碎）。

这些征集的、捐献的以及發掘的古物都陈列在文化館的陈列室內，以便向廣大群众進行宣傳教育。

山西省博物館接受朱賁如先生捐献名拓片

山西省博物館去年八月接受了朱賁如先生捐献給該館的拓片一部分。

这部分拓片包括从周代石鼓、壇山大篆起到秦、漢、魏、吳、晋的篆隸碑刻，刘宋、蕭梁、北朝（北魏、东魏、北周）的正書碑刻及造像，隋代的正書碑刻造像，唐代虞世南、欧陽詢、褚遂良及徐、李、顏、柳等正書、行書碑刻，宋代苏軾、金代王庭筠、元代趙孟頫等以及明、清兩代的碑刻。另外彙帖有汝帖、淳化帖、宝賢堂碑等。

朱賁如先生不但捐贈給該館这批拓片，并每逢星期三，利用自己的休息日，到館协助整理和鑒別。朱賁如先生这种爱护祖國文物的精神是值得表揚的。（梁宗和）

·遼寧省·

遼陽市大林子村發現遼寿昌二年石棺

1955年10月間，东北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在遼陽市郊大林子村清理了一座遼代石棺墓，經过的情况如下：

9月中旬，村內農民开垦耕地，在村东一条灌溉水渠堤岸旁，地表以下約70厘米处，發現了一座周圍砌有磚槨的石棺墓。遼陽市人民委員会文化科聞訊后，即会同东北博物館文物工作隊人員前往查看，其时磚槨已被拆坏，但壁外的土槽却还保留原样。壙槽作長方形，長1米，寬1.13米，方向为西南向。槨底平鋪長方磚兩行共6塊，磚形厚大，色深灰，胎質坚硬，素面無紋。据磚的尺寸与棺的大小來看，槨壁之厚为一層砌磚。

槨內放一略呈長方形的石棺，棺盖与棺身都是用一塊整的青白色石灰岩石鑿成，上下扣合。棺通高65厘米，長84厘米，寬62厘米。棺盖外視如一方墓志盖，四角斜直作四阿形，即所謂盝頂式；棺盖里平面中心鑿成一个直徑30厘米、深入12厘米的圓窠。棺身像一个小石槽，深13厘米，平底，中心也有一个和盖上圓窠相对的圓窠。这兩个圓窠是为着容納骨灰瓷罐用的（圖1）。棺身和棺盖的口边，作有"子母口"盖合極为嚴密（石棺的外形見圖5）。

棺盖內，圓窠兩旁，刻有字迹。窠右边起，为漢文楷書墓志五行（圖2），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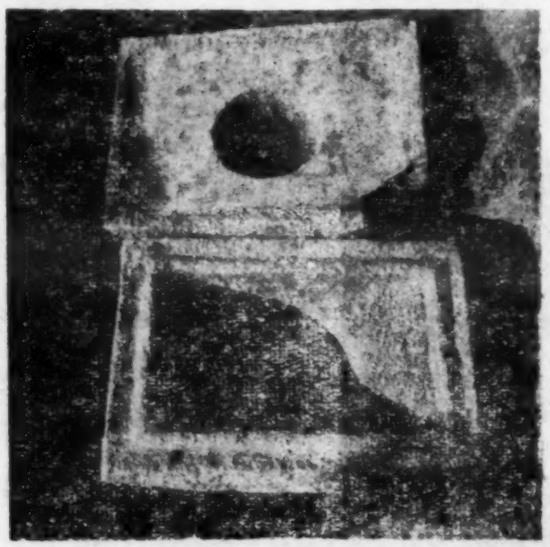


圖1 石棺的內部

大遼國东京府內省判官文林郎試
太子正字王翥妻故高氏墓志氏譜
河西口夫是太原人也翁曾任中作
副使氏稟性正直容口端正和雅長
慕慈善寿及五十有三因宿啾而逝
歲次丙子九月戊戌朔十四庚子日
葬之翁婆先已逝之今則偕焉留世
有兒子四女一　　維寿昌二年歲
次丙子九月戊戌朔十四庚子日坤
时葬

（按：遼史曆象志，寿昌二年九月为丁亥朔，十四日方为庚子，志文"戊戌朔"，誤。——著者）

志文左边有五行梵文。圓窠左边，又有梵文五行，而以漢字"警觉陁罗尼"一行为标題。

清理时，在棺內与棺的口緣部分發見很多石灰渣屑，估計此棺原为石灰固封。

棺內圓窠中放有骨灰罐，已被打碎，經斗合复原，为一白釉瓷碗与一黑釉瓷罐。碗原來应当是翻扣在罐口上的。瓷碗（圖3）大口圈足，胎質細膩，半瓷化，火候較高，露胎处呈稍淡的粉紅色，胎上挂粉衣，外挂牙黃色釉。碗內全釉，外部半釉。高6.6厘米，口徑18厘米，壁厚0.3厘米。

圖3　白瓷碗

圖4　黑瓷罐

瓷罐（圖4）大口短頸鼓腹圈足，胎質較粗，不瓷化，火候稍差，露胎处灰色，不挂粉衣，罐內壁滿塗赭褐色釉，外面塗漆黑色釉，圈足部分無釉。高24.5厘米，口徑12厘米，腹徑22.4厘米

骨灰大部还存留罐內，为極小的碎塊，色牙白与灰白，質堅硬，系經高温度的火燒煉过的。

火葬在遼金时期是东北一帶頗为流行的葬制。据已發見的情况看，其葬法有下列几种；一种是直接把火骨葬于墓室內；一种是以罐盛骨灰，罐上复碗，埋在地下；另一种是還以骨灰置石棺內。但像这具石棺內置骨灰罐，而且棺盖与棺身間鑿出容罐的窠洞的情况，尚屬創見。（易青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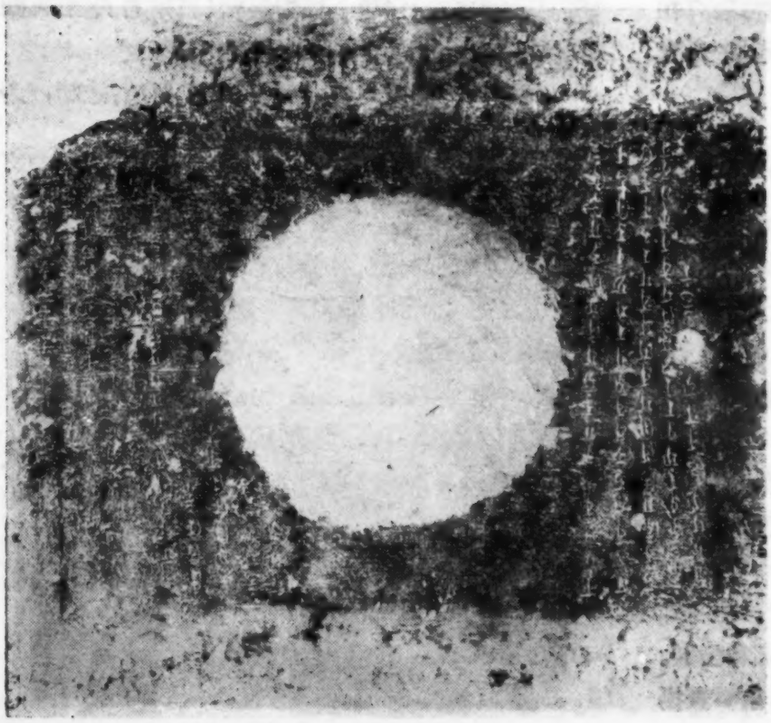


圖2　石棺的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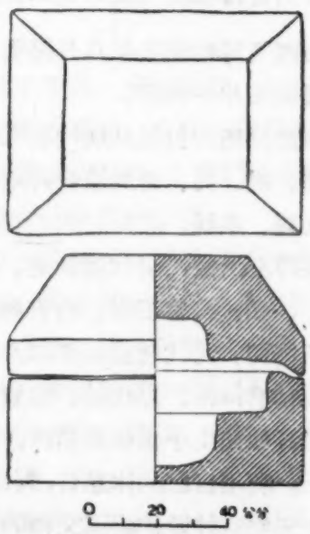


圖5　石棺外形

遼陽縣亮甲区發現很多漢墓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

东北博物館文物工作隊于1955年11、12月間在遼陽縣亮甲区二道河、鷄鳴寺一帶灌溉水渠工程中，清理了一批墓葬和遺址，同时并了解到附近一些墓葬、城址和遺物。在十二天的工作当中共清理了必要清理的墓葬7座，灶址1处，灰坑兩个。發掘所得石、陶、鉄器和各种陶片等共1149件。

亮甲山位于遼陽縣城东南80里，是湯河上流的一个山嶽地区。遺址和墓的分布地点多在亮甲山的湯河兩岸及其附近东西10余里的范圍之內，尤以兩岸为多。現將清理情况和發現的遺迹簡介如下：

在灌溉水渠工程中進行了兩处發掘清理工作，一处在粉土崖子村北山东脚下，正当水渠的中段。在19座石墓中重点的搶救清理了5座，墓室为長方形和丁字形兩式。墓壁多用石板叠砌，其上部多向內傾斜，采取了磚墓起券的手法。底盖皆以大石鋪搭。方向多为南北向。墓中出土陶器有：方的和圓的陶灶、陶屋、井、竈、甑、長頸瓶、罐、俎、盆、盤等陶器。貨幣有五銖和貨泉兩种。这些漢墓虽和遼陽市郊的墓葬基本相似，但它也有一些地方特点。

另外一处是二道河子村东新石器时代遺址。清理土坑墓兩座，墓室皆長方形，方向一为南北，一为东西。墓中各葬一人，一个头向南，一个头向东。头南的似乎是側面伸展，兩脚拼攏，兩手交叉在胸前，左手压在右手之上。头东的仰面側身（向北）屈肢葬。墓中陶器都只一壺、一罐。

調查了解未加清理的遺址和墓葬：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遺址1处。北距亮甲山村約5里，在二道河村东湯河的西岸。地势較平，地表以下1米皆为文化土，其下是礫石層，再下是黃土，分布面積約200米上下。水渠正从其中南北穿过很顯明的露出了圓灰坑、爐灶、散石和墓葬多处。發掘采集有磨石斧、石矛、石鏃、陶紡輪、墜、手制小口長頸平底罐、陶鬲足、帶狀耳粗灰陶器片，高圈足粗灰陶豆殘段等多件。

二、漢城址1处。位于亮甲山村西湯河右岸，距亮甲山1里。远望为一高大方形土丘，高約4米，上面現已垦为耕地。南北長存約135米，北面寬存40米，南面寬存15米，西面已被湯河流水冲去。从其臨河的崖面看，文化層厚約4米。在此处采集有蓆紋磚、繩紋瓦、細泥輪制和粗陶模制陶器片，鉄鏃和双十錢四出云紋瓦当等。这些东西都充分的可以看出是漢代的遺存。

三、駱駝山壁画墓及石室墓。均位于亮甲山村南約1里的駱駝山北坡。石室墓墓室長方形，方向为南北向，底盖皆用石板鋪盖，壁用石塊叠砌。东面的北山坡下壁画墓1座，墓室長方形，为南北向，門向北开。墓壁滿塗石灰，灰面上繪有彩画。东壁画二人像，一正一背，西面繪有一亭，亭下有水。亭中一人，手持有类似釣桿之类的东西。画面比較清楚。南壁只具彩色，但看不清画面的輪廓。此墓还未清理，僅僅是初步調查的情况。

四、大兴屯东山咀子，石墓36座。位于亮甲山村正西約8里。露出的这些墓葬都分布在山頂和东坡上。墓室底、盖一般用大石板鋪盖（有的因被破坏不知原狀），墓壁皆用石板塊叠砌。墓室多長方形，方向多南北向。有的墓室已被当地農民取做石材之用了。

五、屈家崴子南山——白砬子，石墓5座。位于亮甲山村北約2里。墓室为長方形和丁字形，墓壁亦为石板塊叠砌。現在露出的5墓多受破坏，有的墓室石已被農民集中成堆，等待取运。

六、大甸子南山石墓5座。位于亮甲山西北約3里，在山的东坡上。墓多被破坏，只有一座墓室盖石尚在，墓室結構与大兴屯石墓大体相同。

七、耿家屯墓群。位于亮甲之北約40里，在公路兩側水渠工程中已掘出石墓45座。分布在長达約有500米的范圍之內。墓多長方形，方向多南北向，墓壁多用石板立支。絕大部分已被掘坏。

八、銅鉄群出土地点孤家子——东碡头。位于亮甲山村西約3里（漢城址的河西）。山东麓深約1米多的一个地点出土有各式長鉄梃銅鉄368支。銅鉄都是三稜式，有的有三翼，有的有鋒溝，有的尾部成鈎狀，有的尾部稜角被磨平，鉄梃皆圓形，大的全長13.2厘米，头寬1.1厘米，小的全長5.35厘米，头寬0.85厘米。

九、鷄鳴寺村北山石墓兩座。东距亮甲山3里，中隔湯河。墓在水渠西岸，盖石微露，因未被水渠工程破坏，所以采取了保护方針，未加清理。

十、疙疸寺村西川山石墓7座。位于亮甲山村西南18里，在山的南坡上。墓室相距都較远，多

石筑長方墓室。有3座保存原样，4座已遭部分破坏。（陈大为）

•陕西省•

西安汗城遺址附近發現汗代銅錠十塊

西安市建設局最近由西郊皂河岸修筑皂河明渠，向东繞过漢城遺址北注渭河在距漢城遺址西南角約300米的地方，挖出長方形紫銅質銅錠十塊，形式大小相同，長約38厘米寬約20厘米，厚約7厘米，每塊中間都有一孔，直徑約6.5厘米(可能是移动时拴繩或穿槓用的)，錠上有的刻"百三十斤"，也有刻"百二十九斤"或"百二十八斤"的，其中只有一塊在边緣上还刻有"汝南富波宛里田戍賣"十个字。(見圖)

陝西省文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員到現場了解。在該銅塊出土的地方并發現有漢代磚瓦片及瓦当水道等遺物，距地表面僅2米許，再向下挖即为沙子，也沒有陶片及殉葬器物的發現，不可能是一墓葬所出。因为有磚瓦及水道等物，可能是一个建筑物庫房。这些形式大小相同的銅塊，可能是庫存材料。根据文字來研究，汝南是漢置的郡，富波是漢置的縣，据李氏五种所載及商务印書館所出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所載："富波縣，漢置、后漢为侯國，尋廢，后复置……晋省，故城在今安徽阜陽縣南。"由上証明富波是漢代的縣名至晋已廢，再从銅塊的質量上看，与漢代貨幣的質量完全相同，因此，我們推断这十塊銅錠是漢代的遺物。

出土的銅錠

这些銅錠的發現，在西安还是第一次，为我們提供了研究漢代的生產情况及当时社会經济情况的材料：

第一，这些銅錠經化驗后，含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銅質，这說明当时的冶金技術已达到了高度的成就。

第二，是研究漢代度量衡的最好的証据，如其中一塊上刻有"百三十斤"四字，合現在的称只有68市斤半，这就說明漢代的斤兩几乎小于現在的一倍。（賀梓城）

西安西郊大土門村附近發現漢唐墓群

1955年9月間，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会配合着西安西郊某工地的施工，在大土門村附近發現有漢唐墓群。截止目前共清理墓70余座、其中漢墓10余座、唐墓50余座。

漢墓：都是長斜坡墓道，有前后室。个别較大的墓道長达25米。除有前后室外，还有左右耳室。其結構有土洞与磚砌（卷）兩种，土洞居多，出土物玉器有夾肘、鼻塞等。銅器有鏡、灯、五銖錢等。陶器多是罐、碗、杓、圓盤、羽觴、灶、案、甑、鷄、鴨、豬、狗（个别的鷄、鴨、豬、狗还帶綠釉）其中有一个墓發現人骨6具，前室放置4具，后室放置2具。出土物分上下兩層，下層除同以上漢墓出土物相同外，在第2号人骨（清理时的編号）部头的右边有一鉄鏡，左臂处有鉄剑一把，長达120厘米。胸部及头部的兩旁放置着大量的五銖銅錢、銅錢上保存着繩索的朽痕。第4号人骨的头部右边及第6号人骨头部右边都放置小銅鏡一个，上層的出土物有陶罐及兩个壺、和鴨蛋形壺各一个，器形上則顯然有所不同，也可能在时代上有早晚之分。

唐墓：在清理的50余座中，絕大多数为刀形土洞墓，方向大多数也为南北，出土物計有武士俑、俑、女俑等，动物俑有馬、駝、牛等，銅器有鏡、簪，及小裝飾品，瓷器有罐（大小有所不同）、盒、碗等，陶器多是旋紋的紅小陶罐，其中有一个墓出土有一"开元通宝"銅錢，背有"藍"字一个、藍字的右上端有新月形凸紋一道，同时出土的还有白瓷小盒，乳紋瓷盒，白瓷小盂（帶盖、下有三足），小銅鏡各一件。

最近又在一个不足3,000平方米的范圍里探出古墓120余座，有的墓道長达30米，从地面上看大部分为唐代墓葬，較大型的墓現正繼續工作着，估計將有更多的發現。

（陝西省文化局通訊小組陈有旺）

陝西省文管会在基建工地和農村举办小型文物展覽会

陝西省文管会为進一步对基建工地的职工和廣大的農民進行愛國主义教育及保护文物政策法令的宣傳，派了一个展覽小組于1955年9月12日起至11月8日止先后在西安市的壩桥、郭家灘、韓森寨、紅庙坡、土門和長安縣的斗門鎮等七处地方举办文物圖片展覽，观众有二万余人。在宣傳时收到当地群众送交的各时代的文物有102件，展覽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管会三年來在西安附近及咸陽、宝鷄、鳳縣等工地的古遺址和古墓葬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西周、战國、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的生產工具、瓷器、陶器、鉄器、銅器、陶俑等照片，第二部分是各时代的代表性实物，計有石斧、刀、紡輪、卜骨、彩陶、陶鬲、罐、銅鼎、貨幣、倉、灶、鉄剪、瓷罐、碗、玉器等，展覽会除通过照片与实物介紹了我國自新石器时代以來的劳动人民在生產上、文化藝術上的不断的發明創造以外，并宣傳党和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說明保护文物的意义，提高了群众对文物的認識和对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的重視，如紅庙坡工地工人張道升同志把他存放的銅鏡、陶鐘、罐、盒、灶等10余件文物当場交給展覽小組，工人孟志强同志在工会小組長会議上动員了其他工人同志把流散在工地的文物集中起來交給領導，然后再轉交文管会保存。

为進一步动員農村廣大群众來共同保护祖國的歷史文物，文管会还准备选定適当的縣、市、鄉、鎮，分别举办小型的圖片实物展覽繼續加强此項宣傳工作。（陝西省文化局通訊小組邵景璧）

·江 苏 省·

江苏省文管会配合414工地清理一批古墓

去年4月份，江苏省文管会聞知414工地即將施工，立即派員前往調查，配合發掘。为了發动廣大工人保护古代文物，在工地党委的直接領導下，运用有綫廣播、張貼标語、工人座談会等方法，对工人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教育工作。由于工地党政領導的重視，和工人群众的積極支持，古墓清理工作獲得順利的开展，前后僅5个月时間，就清理了战國土坑墓2座，漢代磚坑墓1座、土坑墓2座，六朝磚坑墓5座，明代澆漿石板結構墓28座。清理出古文物达一千余件。其中陶器有：罐、罐、壺、甕、缽、碗、盂、豆等。鉄器中有：劍、刀、戈。銅器中有：盂、洗、碗及五銖、貨泉、莽布等貨幣。明代盛行金銀飾品殉葬，各墓所出金銀飾品如：手鐲、戒子、耳环、压髮、飾花、八宝金边梳等400余件。

第28号战國土坑墓，因工人不能辨别墓葬形制，取土时將墓坑挖毀，僅保留了器物。出土器物計16件，以罐、甕居多，器身頗大，器表滿飾几何印文，陶質坚硬性脆，多备瓦盖，器物較大的口徑0.25米，底徑0.14米，腹寬0.34米，通高0.3米。其中有兩器，陶色白如瓷，器外飾窗格紋，是少見之物。在墓葬以下深約0.8米至1米，發現一塊黑色土層，似有机物窩蝕所形成，內夾灰燼，炭屑等，深0.36至0.39米不等。在此層內發現許多印紋硬陶、夾砂細紅陶、繩紋陶等殘片，和小塊燒土。陶質与无錫仙蠡墩石器文化遺址所出陶片相似。其中繩紋陶和夾砂陶片表部，并有烟燻痕迹，尚可辨出是炊器殘片，这些应屬战國以前的文化遺存。

江苏省文管会已于1955年11月將这批文物撥交江苏省博物館筹备处接收保管。（石祚華）

淮安縣青蓮崗發現漢代銅印三方

1955年4、5月間，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員会派我到淮安掌握青蓮崗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農民春耕取土積肥保护文物工作，在青蓮崗村（今改名为祖華村，因原名較顯著，暫仍旧称）內，为着配合農民掘土，清理了漢代土坑墓3座，其中有一个为高胡墓，掘獲有完整的銅印一方，印文是"高胡信印"，紐的形狀如复瓦，篆書，長1.8厘米，闊1.8厘米，高1.5厘米（連紐計，下同），原印以有包綢，經整洗，印文仍看不清楚，現在僅僅約略辨出都是白文。复次，于开展征集文物工作中，在村內又收得了兩顆銅印，一为"犢臨信印"，紐同前印，惟殘缺过甚，也是篆書，三白文一朱文，朱白相間，長1.4厘米，闊1.4厘米，殘高0.7厘米。另一顆銅印，印文为"高光"二字，也是瓦紐，并亦殘缺，篆字，全系白文，長1.5厘米，寬1.5厘米，殘高1.3厘米，上述二方銅印，据本地農民談，都是去年取土时挖出

的。再，这三顆銅印，均經商承祚先生看过，并說都是漢印，是可以相信的。

总之，此三方漢印制作，材質和形制相同，而文字与章法互异，但所有的書体，都还精美，与漢兩京官体印信的文字，多以"簡直方正"者略别。这可以說明时代的先后，及考見我國書法衍变之迹象，給研究印章学添补了新的实物材料。（李鑑昭）

·浙 江 省·

良渚長坟黑陶遺址清理工作概况

杭縣良渚荀山西北的長坟黑陶遺址，經朱村塊的農民在塘中取土發現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会立即派員將散佚在各处的黑陶收集起來，并作了报導，接着又派汪济英、朱伯謙二人会同浙江博物館党華同志，于1955年12月7日至15日把这一塘內被破坏的遺址清理完畢。

遺址發現在長坟东側的水塘底部。塘南北長17米，东西寬8米，深2米。为了弄清遺址的地層关系，便在塘的北端开了一条長8米、寬2米、东西方向的探溝。地層不甚复雜：表土呈青灰色，厚30—59厘米；其下为紅斑土和紅斑灰膠泥土，兩層的厚度共1.79—2.06米，土質坚硬，黏性很大，因系二次堆積土，沒有顯明的分界綫，这兩層都包含有黑陶片和木炭末，黑陶片与黑陶層出土陶片無区別；再下为黑陶層，厚28—72厘米，深2.04至2.86米，全是黑陶和木炭末堆積而成，偶有少量紅燒土。黑陶層在探溝內顯示的部分，东西兩端不相連接，中間被深灰色冲積層土丘所隔断。深灰色冲積層下面是淺灰色冲積層，俗称小粉土，無包含物。

塘底即屬黑陶文化層，已大部被翻乱，于探溝清理完畢后，把翻乱的塘底文化層中的包含物全部采集。在塘的西南角并發現有木樁建筑，用处不明，原狀保存，有待以后作全面發掘研究。

出土遺物極为丰富，陶器以黑陶为最多，紅陶及陶鼎足所占数量較少，獸骨、石器等也有發現。黑陶完整的和可以复原的有二百多件；器形有壺、豆、罐、皿、杯、簋、碗、尊、盤、盆、甑、敦、網墜、漏斗（？）等10余类。黑陶殘片达40余筐。遺物中一件制作精巧的黑陶網墜和一件色澤鮮艷的朱繪黑陶圈足殘片，是首次發現，增加了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資料。

此外，我們还調查了良渚附近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的分布情况。除在过去所知的茅庵前、古京坟、棋盤坟等地采集到石斧、石碎、黑陶片、圓椎式和双目式陶鼎足等外，还在荀山西北鸕山茶花發現黑陶遺址一处；在安溪鄉窑家墩和長命鄉黃泥塢采集到石器、陶鼎足和黑陶片。后兩地在过去曾成批的出土过玉器和精制磨光石器。

据过去和現在的調查，良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分布范圍相当廣闊，东起良渚鎮，西达黃泥塢，縱横綿延达六公里以上。（汪济英、党華）

杭州九曜山發掘出大量古动物化石

杭州西湖玉皇山西北的九曜山中，蘊藏着富丰的古生代無脊椎动物化石。由于石料場在此开山采石，使埋藏在地層中已歷二億五千万年至三億年（石炭二叠紀）的化石得以發掘出來。初步地整理一下，計有原生动物紡錘虫、貨幣虫、各种有孔虫等十余种；腔腸动物多射珊瑚、蜂巢珊瑚等十余种；苔蘚动物網格虫等数种；棘皮动物海百合等十余种；腕足动物長身貝、石燕、五房貝，正形貝等六十余种；節肢动物三叶虫等十余种；軟体动物瓣鰓类各种蛤数种；腹足类各种螺十余种；头足类拟菊石、直角石数种；及海綿动物針骨等全部共計約一百数十种，此外尚有各种类型化石标本，如：碳化、礦化、硐化、矽化、方解石化、孔痕、印痕、互相重叠嵌入、寄生、变形及假化石等标本十余种，該場为了適应教学的需要，特將上述各种标本标名选制，以供各学校采用，自1955年10月至年底有各地六十一个学校向該場配購了化石标本达1,100余件。（鐘公佩）

·福 建 省·

厦門大学人类博物館在長汀縣發現新石器时代遺址及漢代鉄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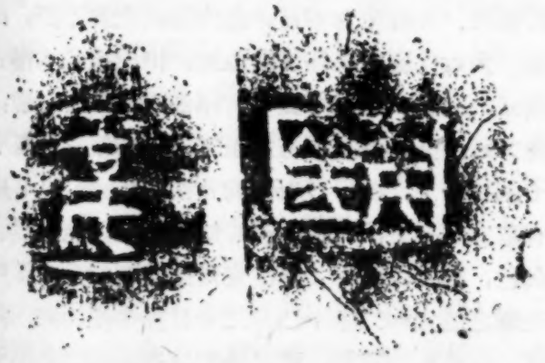
厦門大学人类博物館館長林惠祥于1955年12月在長汀縣，根据苗圃工友和河田鎮中学学生报告的綫索，在河田鎮周圍20余座山上發現有許多新石器时代的遺物，經过20天的探尋，共獲得石器1,310件、陶印模19件、陶紡輪7件、缺口陶壺1件、陶片1,630片。石器的种类也很多。陶器屬印紋陶，和石器同在一处，除一个略完整外，都是破片。陶器花紋有十余种，器形也多，大小不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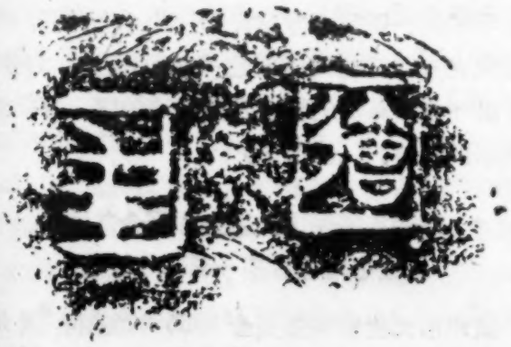
概遺物散布最多的山頂和山坡，便是当时人类住居的处所，共有七八处，其中以鳥石峽为最大，其他有竹子山、黃屋山、兪屋山、鄭屋山、牙背山、火焰山等。山上除上举的石器陶片外，并沒有發現后代的陶瓷磚瓦及銅鉄器等。估計当时可能有一个部落住在这一帶地方。河田之外，在長汀城郊西南山上也發現同样古物，但为数很少。在河田竹子山上又發現鉄鼎鉄剪鉄刀各一件，已露出土面，都已滿生鉄銹。鼎是实用物；剪的脚不分开，中腰無釘眼。这三件应是漢初之物。在同一座山另一处又發現小瓷甕五个，俗名五谷甕，陶硯一件可能是殉葬物，但不見墓葬痕迹。附近又發現似明代德化窰制的白瓷小碟二件。以上的古物將由該博物館整理后公开展覽。（厦門大学人类博物館）

•河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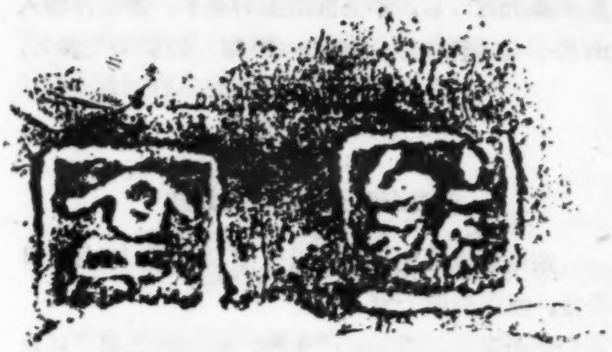
鄭州金水河南岸工地發現許多帶字的战國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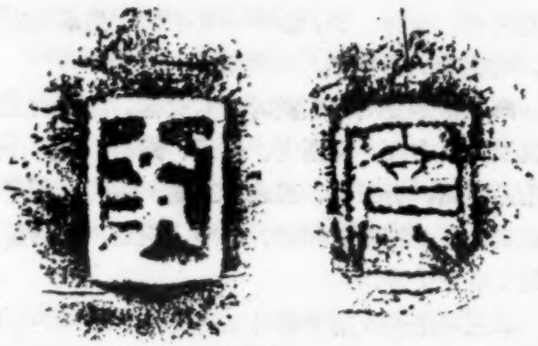
据本刊讀者刘文奐同志报導：鄭州市行政区內金水河南岸，合作总社建筑工地的北面約20米处有一大坑，坑徑約5.6米，深度不及2米，有許多工人在那里附近高地，取土填坑，挖出來很多陶器的大塊殘片：有些片子是新的破裂痕迹，有些是已





陶器上的印章 1.





陶器上的印章 2.

經打破了入土的，都是有繩紋的紅陶和灰陶。据說：前几天挖出很多一節一節的圓段子，有的有字，有的沒字，都填到坑底去了。

在已經填平的坑面上，發現了豆的握柄，沒有上面的托盤和下面的圈足。因为托盤和圈足，是入土时已經与握手分离。

这些長短不齐的握柄留在地面上的就有二、三百个，最長而完整的，約15厘米，最短的3—5厘米，都是在入土前已經打掉托盤和圈足，并且已被折为数段。握柄虽然是空心，中間已被填進沙土，但是經过洗滌，發現它的中空并不是一般的管狀，而是螺旋式的。

在地面上散布着的豆的握柄，均經揀选，發見有文字的，共計七段，后來在附近起土地方又找到八段，其中在字旁刻划斜紋綫条的僅一枚，朱文的一枚，一章双字的一枚，一柄双章的三枚，其余都是一柄一章。

这些被揀到的战國时代的帶有文字的陶豆，虽然器皿不可复原，但是它的文字却是完整無缺，据填土工人說：前三四天，填到坑里去的殘段，每土車內就有二、三十段，說明在这一地区內埋藏的陶豆的数量，相当龐大，由此判断，这里不是墓葬里的随葬品，可能是一个堆積陶器的处所。

战國时期的文字，存留在陶器上的比較少。这

些陶器上的印章，不是窯業主的名字，便是作器人的名字，我們特拓出一部分（見圖），提供研究參考。

·湖北省·

武昌东湖文物陈列館开放

东湖風景区文物陈列館已于1955年12月4日开放。館內有四个室：

第一室是新石器时代文物。陈列的生產工具及兵器方面，有斧、磚、鏃……等石器；生活用品方面，有完整的彩陶甕、和陶鬲。

第二室是殷周到战國时期的文物。陈列的生產工具及兵器方面，有銅戈、銅矛、銅劍、銅鏃；生活用品方面，有玉环、玉玦、玉璧、銅爵、銅簋、銅提梁卣、銅牺尊、銅鏡、銅鼎、銅豆、漆羽觴、珧貝及甲骨文等。

第三室是漢及南北朝时期的文物。陈列的生產工具及兵器方面有弩机；貨幣方面有半兩錢、五銖錢、貨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及錢范的陶模；生活用品及其他方面有銅制的洗、薰爐、羽觴、鍾（方壺）、鏡、印；陶制的鼎、壺、彩繪罐、綠釉倉、井、牛車、冥屋、帶厠猪圈、瓦当等。

第四室陈列的是隋唐到明清的文物，以陶瓷为主。有著名的唐代三彩女俑、三彩武士俑、三彩駱駝和三彩馬以及宋到清代的精美瓷器。

該館的陈列品，均系前中南文化局（部）几年來所蒐集的珍貴文物。（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会　程欣人　張曉霞）

·廣东省·

廣州市北郊横枝岡發現古墓三十余座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会于1955年12月在东北郊横枝岡療养院工地配合平土工程，清理了古墓28座。其中屬于西漢年間的有木槨墓3座，土坑墓1座；东漢的有木槨墓和土坑墓各一；六朝磚墓5座；唐墓17座。西漢墓中以第25号木槨墓为重要，該墓長5.96、寬3.68、深5.16米。墓室是長方形的竪坑，有斜坡墓道，填土是黃色的細砂，槨外填土是原坑的砂礫土。墓內棺槨已全朽，只留板灰。墓底有縱列的枕木溝兩条，根据随葬物的布置情况來看，槨室原是分作上下兩層的，上为兩棺合葬，下層置随葬品。出土器物有銅鏡兩面，劍、环首刀、灯、鍾壺、鼎、奩、勺、帶鈎、印等銅器13件，滑石璧1件，滑石鼎兩个，陶器則有瓮、罐、屋、倉等52件，另外还有水晶、瑪瑙等珠飾。在槨室口的兩旁發現有銅矛、銅戟各一，斜置于距墓底86厘米之上，可知原是竪于槨室前端的左右兩边，以作护衛之意。出土的銅劍，劍身較短而寬，劍首圓形內凹，圓莖，中有突稜兩条，和長沙战國墓出土的一些銅劍的式样極为相似。根据墓制和出土陶器推断，这座墓是屬于西漢晚期的，兩座东漢墓所發現的除了大部分是陶器之外，还有銅鏡和五銖錢。六朝磚墓則和以往所發現的情况大致相同。此外，經过清理的17座唐墓都是小型磚室墓（还有十余座，因破坏太甚，沒有清理。），墓磚特小，長28—30、寬14、厚2—3厘米，作灰黑色，素身，磚質較松軟。墓室平面为長方形，一般長約3.3米，寬約1.04米，高約1.1米左右。从結構的不同，可以分为兩种类型：第一种，墓壁为單隅牆，左、右、后壁各有像"凸"字形的小龕，墓底分前后兩級，后級陈棺，当中砌有兩个磚高的棺床，前級有方形小坑，以排洩積水。墓門作一横一竪封砌。第二种，墓壁有作單隅或双隅的，墓底不分級，無棺床，壁上也有"凸"字形小龕，但封門磚牆是在距墓底高20—30余厘米起封砌的。墓內人架和棺具已朽，但有鉄棺釘發現，可知原为木棺。因为墓的埋葬不深，故多数已为近代墓所破坏或被盜擾。出土遺物大部分是陶器，有罐、碗、灯盞等，銅器有菱花鏡（殘），素身方鏡，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錢。在第23号墓中出土陶枕一个，器形与現代的瓦枕相仿。第10号墓还有墓志磚一方，磚長、寬34，厚5厘米，磚質松軟，青灰色，刻字，文为："唐故宣州南陵縣尉范公諱琮字全節之墓元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仲弟全古記"共31字。从墓志的記載，可以确定这些墓葬都是屬于晚唐年間的。同时，像这样形制的小型磚墓，我們过去只在东郊紅花岡清理过一座，因而这次的發現，对于廣州晚唐墓葬的情况及其分布地区，都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麥英豪）

1955年廣州市文管会在配合基建工程中清理古墓一百四十余座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会1955年在配合廣州市內各項建設工程中清理古墓145座，獲得出土文物

2880余件。墓葬的年代包括由西漢至明代，其中西漢墓60座，东漢墓28座，六朝墓31座，（內有5座是晋墓）唐墓20座，宋、明墓共6座。西漢墓以东郊華侨新村和華南医学院兩工地所發現的为重要。在華侨新村清理的45座墓中有38座木槨墓是屬于西漢初期的，墓室都是一个長方形竪穴，有的沒有墓道，壙土大多数是用細沙，出土的陶器絕大部份是硬陶，器物的造型和花紋都很精美，器外挂一層很薄的黃褐色或青黃色釉。这个發現進一步地說明了在西漢时期廣东的陶器制作技術已有很大的成就，而且在器物的外表也普遍挂釉。出土的銅器有蟠螭紋鏡、素鏡、鍾、勺、盆、鼎、印、半兩錢等。另外还有瑪瑙、玉、石、鉄等質类的器物。在華南医学院共清理18座墓，其中有7座是西漢后期的木槨墓，槨木保存得較好，結構也很特殊。槨室左、右、后三壁是用大木壘叠而成，槨口由七根直竪的大木柱封閉，槨內分上下兩層，上層陈棺，下層分为数格，放置随葬物。以前我們曾經清理过一些由于木材窳朽过甚，因而結構形制不明的木槨墓，現在从这几座墓葬的發現，可以得到解决。东漢的磚室墓以东郊19路軍坟場后面的第3号双室墓为重要，出土有陶車、船、舞俑、乐俑、侍俑等。（見本刊1955第年6期廣州东郊东漢磚室墓清理紀略一文）木槨墓則以在南郊大元岡所清理的第4号墓形制最突出。墓內分前、中、后三室，平面成丁字形狀。前室最高，中室最低，后室分上下兩層，上層左边陈棺，右边是边箱。随葬物大部份置于边箱和前室之內。出土物有保存完好的有銘文的銅鏡和屋、倉、井、灶、簋、鼎、壺、罐、碗、盆、虎子等陶制的模型及日常生活用具。这一座墓葬是廣州市三年來清理的木槨葬中所首見的一种結構形制。有文字紀年的晋墓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及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二座。出土物有青釉的半陶瓷器和金銀、漆、石等器物。六朝后期的磚室墓，墓室的結構比东漢磚墓更为复雜，墓頂是多重券栱，墓后壁砌有假柱，前室有磚砌的台。小北横枝岡第19号墓的前室和后室的券牆上砌有直欞假窗。出土有氓石猪和罐、盆、碗、碟、天鷄壺等青釉器物。所清理的唐墓多为晚唐时期的小型磚墓，墓室狹小，結構簡單，随葬物只有罐、碗等四、五件陶器而已。明代的墓葬中，墓室有全用灰砂構筑的或墓壁是用灰砂筑成再用等腰梯形磚結砌券頂。大多数都沒有随葬物。

廣州市文管会目前正在着手把一年來清理的地下材料分批整理，編寫初步的發掘簡报，以便能够及早將發掘的資料介紹出來。（黎　金）

•四川省•

前西康省博物館筹备处將藏品移交四川省博物館

随着西康省建制的撤銷，前西康省博物館筹备处也同时合并于四川省博物館。

1955年12月22日起四川省博物館派出黃自敬、刘廷璽二人赴雅安市接收原西康省博物館筹备处的館藏文物、圖書、仪器及参考資料。同时將其中既無歷史价值又無藝術价值的以及不能供陈列及研究参考用的部份非文物，就地移交給雅安市人民委員会。

移交四川省博物館的文物包括下列几部份：

（一）石器：雅安市河北鄉斗胆村及河北鄉沙漠村出土，多系石鋤、体積較大。一般在20厘米上下；分有肩（多寬肩）的和無肩的兩种。刃部大都成半圓形，部份因使用时間較長而殘缺不全。石器的質料都用雅安附近羌江中出產的青灰砂石制成，少部份是紅砂石。制作方法是利用天然的石塊將其半面保持自然光滑狀态，將另一半面經人工打击制成，表面很粗糙，經过磨制的很少。由于这批石器沒有出土紀錄，也無其他伴随出土的器物，因此，我們暫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待今后在雅安附近有更多的發現和詳細的紀錄才能作詳細的研究。

（二）石刻：雅安市河北鄉一号漢墓出土，計有玄武座，天祿辟邪座，力士座等。刻工極生动，与川西地区出土的漢墓石刻很相似，其中最好的一件要算根据民間故事傳說雕刻的玄武座，刻工精致，且富有大胆的想像力，是一般漢墓石刻中不可多得的一件；另一件力士座的姿态与雅安城外姚桥的高頤闕上所刻的支撐斗栱的力士几完全一致。在这一座殘漢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只陶豬和一件陶俑首。

（三）革命文物：其中有丁佑君烈士生前的遺物，还有太平天國革命領導人物之一杜文秀的文房用具。丁佑君烈士的遺物有軍裝、鋼筆、被單、被盖，給同学們的題字及其他有关資料。这些物品是原

西康党校贈送的，也曾在党校展出过，参观过后的人都很感动，接收的紀念品中就有党校出版的紀念專号。杜文秀的遺物有玉筆洗、玉墨床等。

（四）民族文物、錢幣、拓片及其他文物。包括藏族、夷族等兄弟民族用的木勺、戒指、衣服、馬鞍、藏經等；有自漢代至清代的銅幣，还有人民幣的样标，紅軍布幣等；以及王暉墓拓片、高頤闕朱拓与墨拓、泰山銘拓本等。

以上各項屬于文物的共計八百余件，均于11月份由雅安运回成都，并進行了分別整理。（黃自敬）

成都白馬寺工地清理了明墓九座

成都市北門外白馬寺于1955年11月底在拆土窖中發現了明代墓葬。四川省建筑工程局工程处發現后立即通知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前往清理。文管会在一个月时間內計共清理了明墓九座、东漢殘墓一座。墓大多被擾乱，只有第6、8号兩座墓相当完整。其中第6号墓的形制及墓內殉葬品都是很典型的。像这样完整的明墓，解放后四川还是第一次發現。九座明墓共出土器物248件，其中第6号墓殉葬品特別多，有器物138件，現將該墓清理情况作一簡略的报導：

墓分前后二室，全是用長方形大石板砌成，墓門兩旁立着八字形牆壁，門用磚和石封閉，墓室兩壁有彩繪紋飾，墓室頂上有彩繪藻井，鮮艷的顏色还看得很清楚。

前室祭台上置銅香爐、香筒及瓷的帶彩色的武士俑、獅，台下置瓷的帶彩色的小馬六匹。兩旁排列着瓷的帶彩色的羊、虎、麒麟和手执各式乐器的瓷俑、藍色大瓷罈等，前室左右龕上也排列着瓷俑。祭台后立着墓志銘一合、并盖上一層錫壳。

后室（即棺室）有一棺台，台上放置一帶槨的紅漆棺材，槨已朽，棺保存尚好。棺前置瓷俑及轎椅。棺台兩側排列有陶質黑釉谷倉，瓷馬、俑若干。俑有的手中执圓盒、盤、傘，还有背棹子的、背挂包的，大多象征僕侍。后壁龕內放銅鏡和買地券各一。

棺頂上置絹。棺內人架一具，人架上盖緞被，下垫緞毯，虽已朽爛，仍可清楚看到原來位置。死者四周殉葬品也不少，有銅髮飾一套、腰帶一根、瑚珠一串、玉杯一个、銀錠二錠、衣上金飾銀飾若干。棺底还有上彫有鏤孔的花板。据墓志銘記載，墓主人名魏存敬，成都德陽縣荣華鄉安乐院人，生于正統乙丑年二月十一日，死于正德庚午年四月初六。官职明典服正魏公，职务是專为蜀王侍衣服。

清理后为了配合基建工程進行文物保护的宣傳，并解除群众的傳說和誤会，特在工地举办了一天半臨时展覽，参观人数約17,000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余德章）

綿陽北外何家山嘴發現漢墓

据本刊讀者鄭灵生报導：綿陽北外宝成鉄路綿陽車站西側何家山嘴，因綿陽城关区磚瓦生產合作社第三工务段工人在該山嘴取土时，發現漢代磚室墓三座，前兩座已被破坏，随泥土塌陷，后一座墓葬整在砂石崖層內，亦系磚室墓，保存尚屬完好。發現后，該段工人即报知該縣文教科，并將墓堵塞，靜候处理。刻該縣文教科已轉报四川省文管会，該会已派人前往勘查清理。

該墓的室底及室壁，均系一面有方格錢紋的長方形磚鋪砌而成。墓室頂系由三塊石質雕刻雷飛式筒瓦脊造成，室脊四隅尽头处的鴟吻和脊頂正中部的宝鼎，造型生动，可以看見漢代建筑藝術的民族形式。屍骨已朽，僅存头骨一具。墓室門外置有陶狗一只、陶馬一匹、鉄釜一口，釜內有銅質搖錢樹殘形及五銖錢十余枚。陶狗四足直立，卷尾上翹，兩目注視前方。陶馬很大，高約1米，長約7.5厘米，四蹄竪立，仰首平視，鬃鬣直竪，筋肉肥碩有力。馬的兩耳和尾已不存在，就現存燒造时的接口看來，像是活动的，是否随墓口陷泥埋在土中，以及墓中有無其他遺物，尚待繼續清理發現。

·云南省·

雲南陸良縣發現古生物遺骸

去年在云南省陸良縣南盤江壩岩上修建麥子河水庫工程中發現了一个已經鉄化了的較大的螺蛳遺体和已經石化了的兩只馬鹿角。这兩件东西出土以后，形体还是完美無缺的。

当时住在昆明的地質工作人員听到这一消息后，于11月間赴該地实际了解，經他們鑒定，这个螺蛳的遺骸和这对馬鹿角已在地下埋藏了一百多万年了。

上述生物遺骸的發現，对研究云南地区的古代生物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刘紹南）

陶人像　高 9.6 厘米
南京黃家营六朝墓出土

陶武士俑　高 31.5 厘米
南京石門坎六朝墓出土

陶女俑高 34.1 厘米，陶男俑高 35.7 厘米
南京石子岡六朝墓出土

陶人像　高 7.7 厘米
南京黃家营六朝墓出土

Lc 6101

中國古典及民間造形藝術書目

彩　陶	中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繪圖室編	0.84元
*長沙出土古代漆器圖案选集	北京歷史博物館編	2.20元
輝縣出土器物圖案	中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繪圖室編	1.10元
漢代繪画选集	常任侠編	2.60元
*八十七神仙卷	徐悲鴻藏	10.00元
*中國古代彫塑选集	刘开渠編 精平	5.10元 3.80元
*敦煌藻井圖案	中央美術学院実用美術系研究室編	10.00元
敦煌圖案	东北美術專科学校圖案系教研室編	3.60元
唐代彫塑选集	王子云編	2.70元
宋代北方民間瓷器	陈万里編	0.84元
陶　枕	陈万里編	1.00元
中國年画發展史略	阿　英著	3.00元
明代瓷器工藝	傅振倫編	1.50元
*明　錦	李杏南編	2.70元
*中國錦緞圖案	中央美術学院実用美術系編	6.00元
*中國建筑彩画圖案	北京文物整理委員会(現改为古代建筑修整所)編	50.00元
*西南少数民族圖案集	西南美術專科学校実用美術系編	4.30元
*北京皮影	中央美術学院編 精平	10.00元 8.00元
*中國民間剪紙	人民美術出版社編	2.00元
*民間窗花	佟坡、慈旭、華迦編	3.10元
王老賞的窗花藝術	傅　揚編	0.66元
叢琳窗花集	叢　琳作	0.50元
浙东戲曲窗花	蔣　風編	0.75元
*民間藍印花布圖案	林漢傑編 精平	5.00元 2.00元
*民間彩印花布圖案	林漢傑編	1.20元
民間彫塑工藝	中央美術学院工藝美術研究室編	1.40元
民間染織刺繡工藝	中央美術学院工藝美術研究室編	1.45元
*小品織繡圖案	李杏南編	2.50元

書前有*的为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其余为朝花美術出版社出版

人民美術出版社　朝花美術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文物参攷資料

（月刊）

第三期（总67号）

1956年3月27日

编輯者　文物参攷資料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四头条5号
电話4局1440

出版者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北京灯市口37号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預訂处　全國各地邮局
代售处　各地新華書店

定价每册0.5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1.50元
半年六期	3.00元
全年十二期	6.00元

平邮在内　掛号費另加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023号　　輯号：0175　　印数：1—7,180

$ 1.60

FAR EASTERN LIBRARY